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 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洛林	厉以宁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克崱	朱 民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国宝	张晓强
张卓元	陈 元	林毅夫	周文重	海 闻	钱颖一	郭树清
楼继伟	聂振邦	樊 纲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 / Henry Kissinger
傅强恩 / John Frisbie
欧伦斯 / Stephen A. Orlins
约翰·桑顿 / John Thornton
郑永年

康睿哲 / Richard Constant
约翰·奈斯比特 / John Naisbitt
杰弗里·萨克斯 / Jeffrey Sachs
马克·乌赞 / Marc Uzan

编委会

主 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晓红	牛铁航	吕 政	谷源洋	朱晓明	李晓西
李向阳	陈永杰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裴长洪	霍建国	

主 编：郑新立

副主编：王晓红 牛铁航

• 高层论坛 •

当前全球经贸形势发展展望 李德水(005)

在转方式、扩内需中实现稳增长 郑新立(009)

• 宏观经济 •

对经济周期的再认识 林兆木(017)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重大战略选择 王一鸣(028)

• 国际经济 •

科学把握国际形势 努力提高开放水平 霍建国(036)

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战略思考 李勇坚(044)

借鉴国际经验 完善我国企业“走出去”政策 陈金明 汪 平(059)

美日发行市政债券为城市化建设融资的经验及启示 陈峥嵘(070)

• 产业发展 •

全球第三方供应链革命和中国的实践 王子先 邓 娜(084)

摆脱固守静态比较优势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王岳平(096)

• 理论前沿 •

全球化中的新科技变革 刘琦岩(110)

• 名人观察 •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 高尚全(121)

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智库的责任 卢中原(123)

• 英文摘要(ABSTRACTS) • (125)

欢迎订阅《红旗文摘》 (封三)

CONTENTS

Pro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Economy and Trade	<i>Li Deshui</i> (005)
Achieve Steady Growth through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Mode and Expansion of Domestic Demand	<i>Zheng Xinli</i> (009)
Recognition of Business Cycles	<i>Lin Zhaomu</i> (017)
Forging an Updated Version of Chinese Economy Becomes a Major Strategic Choice	<i>Wang Yiming</i> (028)
Grasp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scientifically and Widen Opening-up actively	<i>Huo Jianguo</i> (036)
Strategic Thinking on How to Attract FDI in Chinese Service Sector	<i>Li Yongjian</i> (044)
Research on the Perfection of Policy System of Chinese Enterprises “Going out” from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Experience of the Worldwide Enterprises	<i>Chen Jinming & Wang Ping</i> (059)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from Issuance of Municipal Bonds for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Financing in America and Japan	<i>Chen Zhengrong</i> (070)
Revolution of the Global Third Party Supply Chain and Practice in China	<i>Wang Zixian & Deng Na</i> (084)
No Longer Stick to Stat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Wang Yueping</i> (096)
New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s in Globalization	<i>Liu Qiyan</i> (110)
Speed up the Building of New-type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Gao Shangquan</i> (121)
Change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ink Tanks	<i>Lu Zhongyuan</i> (123)

当前全球经贸形势发展展望

李德水

摘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同舟共济、紧密合作，遏制住了危机的恶化趋势，世界经济形势已出现好转；但主要发达国家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世界经济形势仍错综复杂。此次危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重要启示。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 全球经济 国际贸易

作者简介：李德水，国家统计局原局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回顾与思考

以 2008 年 9 月 15 日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为标志爆发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整整五年了，它给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造成巨大冲击和深重伤害。2009 年世界经济总产出比上年下跌 0.7%，其中美国负增长 3.5%，欧元区负增长 4.3%，日本负增长 5.5%。世界货物进出口总额比上年下降 22.66%，国际航运也一落千丈，世界经济陷入衰退。正当这场危机迅速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从金融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的关键时刻，在美国总统小布

什倡议下，于 2008 年 11 月在华盛顿召开了 G20 会议。占全球经济总量 80% 以上的 20 个国家，共商应对危机之策，同舟共济，紧密合作。这与上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的局面相比有着根本的区别。当年胡佛政府对内无所作为，过分相信市场自我调节和修复的能力；对外则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对从欧洲国家进口商品征收 60% 税率的高关税，欧洲国家则以牙还牙，也对美国商品征收 60% 的关税，导致两败俱伤。这一次不仅主要发达国家，而且主要发展中国家都能联起手来，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实施同舟共济方针，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小布什总统任内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果然，到 2010 年就基本遏制住危机恶化的趋势，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也明显回升。从此，整个世界经济进入了深度转型调整期。几年来，全球经济处于时好时坏、总体低迷的发展阶段，而且这个调整过程还远没有完成，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

为应对危机、拯救金融机构，主要发达国家政府都投入大量财政资金，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于是，又出现了美国国债危机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美国国债余额在小布什任内翻了一番，2009-2010 年又大幅上升，到 2011 年 5 月 16 日达到法定上限 14.29 万亿美元，引发了国会与政府的激烈斗争。去年底又出现“财政悬崖”问题，今年 3 月 1 日强行启动了财政减支机制。人们不要把国债问题的争论简单地看作是民主、共和两党选战的需要。美国第二任总统、建国先父约翰·亚当斯曾说过：“要征服和奴役一个国家有两种方式：剑和债。”没有哪一个伟大的国家能靠长期大量举债保持他的伟大。防止美国国债过多增长是关乎美国核心利益甚至兴衰安危的大事。欧元区 2007 年末主权债务余额与 GDP 之比仅为 66.2%，很正常。从 2008 年 10 月到 2010 年 10 月两年内，欧盟各国政府为金融机构注资、承诺担保、补助等规模达 4.5 万亿欧元。2012 年末欧元区政府债务余额与 GDP 之比上升到 87.2%。南欧一些国家负债率更高，有的国家可能出现债务违约，于是爆发了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从而把欧元区内部原先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也暴露出来了。

二、当前全球经贸形势的基本判断

经过这几年的艰苦调整，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出现不少积极因素。从美国看，随着家庭债务下降，家庭部门负债额与其收入之比回归到长期趋势水平，说明美国家庭去杠杆化过程已基本完成；房地产市场从去年 2 月开始回升，一年多来新房开工量、房屋销售量和价格都上升 10% 以上。据美国《侨报》报导，从去年 3 月至今年 3 月的一年里，中国富人在美购房总值达 123 亿美元，占同期外国人在美购房总额的 18%，仅次于加拿大人，且都是一次性现金支付。美国 7 月末消费者对经济的信心指数升至 85.1%，为 2007

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8月份失业率降为7.3%，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减少至32.3万人，为2007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美国经济环比折年率一季度增长1.1%，二季度增长2.5%。美联储在适当时候淡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必然趋势，也不致于对世界经济造成太大的冲击。再如欧元区，已经渡过了去年最艰难的阶段。

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IMF三驾马车与各国人民共同努力，取得了重大成效，欧元不会崩溃、欧元区不会解体。相反，利用危机的倒逼机制，他们正有板有眼、艰难而卓有成效地推进联合和创新，金融、财政、经济、政治等四大联盟正在加强，拉脱维亚7月1日正式加入欧元区，罗马尼亚等几个国家也排着队要求加入欧元区。2012年12月10日，欧盟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有着深远意义。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孕育出希特勒法西斯，欧洲人以战争的办法去解决经济危机，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欧洲死亡数千万人，满目疮痍，一片废墟。而这一次，欧盟是用联合协作、共渡难关的办法应对经济危机。他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之无愧。德国将于本月大选，我看默克尔很可能连任，她是顾全大局、外柔内刚、有大智慧的政治领袖。欧盟和欧元区只要按既定方针坚持下去，并不断深化改革、体制创新，人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更团结、更强大的欧洲一定会展示在世人面前。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欧元区经济景气指数7月份为92.5，8月份达95.2，乐观情绪创两年新高。一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负增长0.2%，但第二季度环比增长0.3%，二季度环比折年率更是增长1.2%。其中德国增长2.9%，法国增长1.9%。欧元区结束了连续六个季度的萎缩局面。英国环比折年率一季度也达1.1%，二季度达2.9%。

尽管国际上对安倍经济学的可持续性深表质疑，但日本今年一、二季度GDP环比折年率还是分别增长3.8%和2.6%。

今年全球货物贸易额经季节调整后，一、二季度环比分别增长0.8%和0.3%，波罗的海干散货运指数9月4日升至1215点，比8月1日的1066点回升了14%，比今年初的706点升高了72.1%。全球制造业出口新订单指数连续两个月处于景气区间，持平于50.5，其中欧元区和英国分别升至53.6和54.4。以上反映了今年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有明显回暖趋势。

但也不可过于乐观。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5月份以来，印度、巴西、南非货币汇率累计跌幅都超过10%，美欧市场利率水平上升，新兴经济体资本持续外流，俄罗斯经济部上月也将2013年经济增长率预期值由原先的2.4%降低为1.8%。美国新一轮国债法定上限的修正问题躲不过去，10月份就要提上议事日程，一场激烈的争论不可避免。欧元区主权债务问题的全面解决更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总之，世界经济形势已出现好转，但仍然是错综复杂的。

三、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启示

中国改革开放 35 年来，我们抓住了宝贵的战略机遇期，实现经济年均增长 9.8% 的辉煌成就。特别是加入 WTO 后，更是赢得了 10 年黄金发展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传统发展方式的矛盾也不断显露出来，中国正处于必须依靠经济转型升级才能持续健康发展的阶段，也可以说是关键时刻。我们必须改变经济高速扩展时期的思维模式和风险偏好，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在发展中转型升级，以转型升级推动新的更好发展，着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开幕式演讲中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他对这个判断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总之，中国还处在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具备比较雄厚的基础，科技创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有巨大发展潜力。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13.5 亿人民的消费潜能是巨大的。中国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也完全可以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虽然还存在不少矛盾和困难，但完全在可控之内。从 1-8 月的经济运行情况看，今年经济增长率达到 7.5% 或略高一些应该是有把握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 8% 左右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国际金融危机已经爆发五周年，它为我们留下的重要启示是：发展实体经济永远是立国之本、治世之道。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实体经济的血液。血液不健康，机体必然出大毛病。一定要处理好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经济必须坚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正确方向。如果过度发展虚拟经济、大搞金融衍生品、制造泡沫，那么，金融就会变为引发现代经济危机的祸端。这便是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留给全世界的重要遗产。

应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伟大实践也启示人们：世界各国只要坚持同舟共济，加强合作，就一定能化险为夷，实现共同发展。尽管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还面临着无穷无尽的困难和曲折，但只要地球还在转动，只要大家都在共同努力，不断走向新的经济繁荣和文明进步的历史趋势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责任编辑：刘英奎

在转方式、扩内需中实现稳增长

郑新立

摘要：我们应以党的十八大报告作为分析和把握当前经济形势的指导思想，作为统一对经济形势认识的基础；应针对阻碍发展的体制性弊端加快改革，释放发展潜力，支持未来一个较长时期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把银行贷款和社会资金引导到有利于促进结构优化的投资领域，尤其应把加快城际高铁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扩大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等领域作为引导投资的重点。

关键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扩大内需 深化改革

作者简介：郑新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整体平稳、稳中有进。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6%，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2.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0.1%，出口增长 10.4%，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 6.5%，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 9.2%。由于第一、二季度经济增速分别比上一季度下降 0.2 个百分点，而且在去年第四季度出现脆弱回升之前，经济增速已连续 11 个季度下降。因此，关于经济形势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和不同预测，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又起。全面认识和把握当前经济走势，应按照 7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有为，努力在转变发展方式和扩大内需中实现稳增长。

一、用党的十八大精神分析和把握当前经济形势

党的十八大报告正确总结了过去五年的经验，分析了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到 2020 年的奋斗目标和战略部署，应当作为分析和把握当前经济形势的指导思想。

特别是以下四点，应作为统一对经济形势认识的基础。

（一）十八大提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

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经历了 35 年，但是，增长潜力依然巨大。去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6090 美元，远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再经过 10 年的努力，使人均 GDP 翻一番，达到 1.2 万美元，将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等经验证明，人均 GDP 达到 1.7 万美元之前，都属于快速增长期；超过 1.7 万美元，速度才明显下降。同样，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人均 GDP 达到 5000 美元左右比较容易，但要进入高收入国家，则比较困难。在上世纪中叶，世界上有 100 多个国家人均 GDP 达到 3000 美元以上，但最终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为数不多。目前，我国正处于向高收入国家冲击的艰难的爬坡阶段。从国外来看，全球经济危机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困难，但只要善于趋利避害，就能化挑战为机遇。在上世纪 90 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由于我们应对得当，曾成功地把挑战变成了扩大内需的机遇。正是由于上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开始的大规模基础设施、能源建设和大学扩招，才为进入新世纪以来长达 10 年的黄金增长期奠定了基础。

（二）十八大提出，发展仍然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

目前，我们面临的环境污染严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城乡和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只能通过科学发展来解决。只有通过加强宏观政策的引导，把社会资金引导到生态环境治理、引导到中西部和农村发展上，通过发展来提供更多、更高收入的就业机会，加快公用事业的发展，才能使目前面临的各类矛盾得到缓解，并通过进一步发展最终得到解决。把眼前出现的问题归结为过去经济增长速度过快所带来的，是偏颇和不公正的。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换一个角度来看，解决问题的需求本身，就是投资发展的机遇。

（三）十八大提出，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为基点

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用李克强总理的话讲，就是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要按照十八大的要求，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局面，建立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第二产业拉动的局面，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实现第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改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状况，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增长；改变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的状况，加大对改善生态、治理环境的投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改变区域差距、特别是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状况，鼓励各类资金投向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努力实现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四）十八大提出了“双倍增”的目标，即到 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

这两个指标是密切相关的。为了实现第二个目标，要求经济增长必须保持相应的速度。10 年翻一番要求年均增长速度不能低于 7.3%。由于前两年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比较快，后八年平均每年增长 7%，即可实现 10 年翻番的目标。经济增长速度必须比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略快一些，因为经济增量中的一部分要用于公共积累等社会扣除，还要考虑人口增长因素。1978-2012 年的 35 年间，我国 GDP 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9.9%，城乡居民人均增长速度为 7.4%，前者比后者快 2.5 个百分点。今后八年，考虑到调整国内生产总值的使用结构，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经济增长速度比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至少要高 1 个百分点以上，即今后八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能低于 8%，否则，后一个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果在一两年内速度略低一些，通过结构调整以积蓄力量，也是必要的。但以后的速度就必须高于 8%。十八大提出的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向全党全国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并已向全世界宣布，必须说到做到。

二、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我国经济仍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只要针对阻碍发展的体制性弊端加快改革，把潜力释放出来，足以支持未来一个较长时期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释放消费需求的巨大潜力，亟待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2012 年，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只有 33.8%，比“六五”时期 53%的水平下降了 19 个百分点，比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低 20 个百分点以上，比发达国家低 30 多个百分点。提高居民消费率，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潜力巨大。关键在于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当前扩大消费的重点仍然是住房和汽车，这是其他领域的消费难以替代的。扩大住房消费必须从增加供给入手，而不能限制购房需求。抑制城镇住房价格上涨，应当增加住房建设用地供给，打破城市与周边地区之间、城区与郊区之间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状态，并通过大容量的快速轨道交通，把城市与周边地区、市区与郊区连接起来。以北京为例，市区房价高达每平米几万元，而郊区房价只有几千元，再从市区驱车半小时到临近北京的河北省各县，房价一下子降到 4000 元以下。只有用改革的办法才能找到抑制房价、扩大住房消费的良方，同时也能有效拉动城乡和区域一体化发展。我国仍处于汽车进入家庭的黄金发展期。去年，我国每百户汽车拥有量仅为 19 辆，发达国家为 150 辆左右，即我国平均每 18 个人只有 1 辆车，而发达国家平均每 3 个人 2 辆车。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他们的中国梦就是轿车梦、住房梦。政府要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不要视为难题。要为扩大住房、汽车消费创造条件，

而不是设置障碍。我国居民消费正处于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升级的阶段，处理好这一过程中面临的各种新矛盾、新问题，从而扫除经济增长的各种障碍，就能为经济增长不断注入新动力。

（二）释放就业需求的巨大潜力，亟待全面推开“营改增”的税制改革，为第三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仅为 36%，全球平均水平为 62%，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 50%。如果能将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提高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可新增就业岗位 1.1 亿个。释放第三产业就业需求的巨大潜力，必须加快全面推开“营改增”的税制改革。同时，在用地、用电、用水价格上，对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要一视同仁。第三产业集中了大量的小型微型企业和个体户，目前对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的税收起征点为月销售额 2 万元。如果按销售利润率 10%来计算，月纯收入仅 2000 元，比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月收入 3500 元还要低 1500 元。显然对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的税收起征点偏低，这对鼓励创业、放水养鱼、培植财源是不利的。应当继续深化改革，从而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三）释放劳动力供给的巨大潜力，亟待改革城乡管理体制，推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我国农业劳动力尚有 2.8 亿人，耕种着 18 亿亩耕地，平均每个劳动力仅能种 6.4 亩地。以现在的机械化条件，平原旱作粮食种植，一个劳动力可以种几千亩；水田稻谷种植，一个劳动力能种几百亩。通过土地经营权有偿转让，使之向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业公司集中，发展集约化、社会化、现代化大农业，不仅可以吸引高素质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且可以进一步把大批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为发展第二、三产业提供劳动力资源。未来 10 多年，如果能够再转移出 1 亿多农业劳动力，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起到重要作用。

（四）释放自主创新的巨大潜力，亟待深化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建立创新激励机制和成果转化机制

从党的十七大提出把自主创新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以来，科研投入大幅度增加，科研成果开始成批涌现，形势喜人。民营企业申请的技术专利已占全部专利申请量的 67%，成为自主创新的主力军。目前，仍有两个领域创新的潜力有待发挥。一是国有企业，二是大学。国资委前年下发了《关于发挥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骨干和带动作用的若干意见》，第一次提出将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的价值列入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的范围之内，将会对建立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产生重要影响，期待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成果大量涌现。美国的大学（主要是理工科大学）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基地，如硅

谷的主要技术来源地是斯坦福大学的电子系。2011 年，全球大学按申请专利数量排名，美国有 30 所大学入围，我国竟无一所。美国把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度作为衡量办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大学站在各个行业技术进步的最前沿。我国大学拥有科技创新的大量优质资源，应当通过建立优胜劣汰机制，努力使其成为科技创新和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基地。

（五）释放资本的巨大潜力，亟待改革金融体制，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和投入产出率

我国资本存量已经很大，M2 已超过 100 万亿元，银行金融资产已超过 160 万亿元，外汇储备已超过 3.3 万亿美元。由于金融体制改革滞后，资本流动性差，资金供给主要集中在大企业、大中城市、沿海地区和国家重点项目，小微企业、农村、中西部地区和民营经济获得资金支持比较困难，严重制约了经济活力的释放和协调发展。据调查，前几年温州地区民营企业获得贷款的利率平均为 25% 左右。如此高的利率，搞实体经济的企业是无法承受的。一边是大量资金因找不到投资出路而闲置，一边是大量急需资金的企业因找不到钱而不得不求助于民间高利借贷。根源在于金融领域尚未形成充分竞争的市场，缺乏足够多的民营竞争主体的参与。据统计，我国 256 个最大的制造业企业的利润总和仅相当于 5 家银行的 57%。银行业的资本利润率远远高于社会平均资本利润率，原因也在于银行业竞争不充分。所以，金融体制改革应当从放宽准入入手。与此相应，必须建立地方性金融监管机构，建立存款保险和贷款担保制度。在这三项改革任务完成之后，才能实行利率的市场化。如果在没有推出前三项改革的条件下，率先推出利率市场化改革，必然出现垄断企业的寻租行为。近一年多来，非银行贷款融资在全社会融资总规模中的比重迅速上升，银行表外业务规模膨胀，孕育着一定的金融风险。要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规范和扩大直接融资。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提高外汇储备使用效益，积极稳妥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六）释放土地利用的巨大潜力，亟待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使农户对土地的用益物权成为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

我国城乡建设占用土地共 22 万平方公里。其中城市包括县城关镇占地约 5 万平方公里，村庄和小城镇占地 17 万平方公里。城市人均占地高于发达国家，通过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化水平，城市土地利用尚有较大潜力。然而，最大的潜力在于村庄建设用地。就人均占有建设用地面积来看，农村是城市的 3.5 倍。特别是改革以来，由于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形成大量空心村。经验证明，结合新农村建设，进行宅基地整理，可节约土地 50% 以上。这项工作进行得好，既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居住条件，又能满足城市化对建设用地的需要，增加耕地。关键在于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落实农户对宅基地的用益物权。

释放以上结构转换和生产要素的巨大潜力，不仅对近期稳增长能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对未来 20 年经济的持续增长、从而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将起到强有力的支撑作用。

其前提条件就是全面深化改革，不改革或改革不到位，经济增长就会出现停滞。

三、近期应以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实现稳增长

由于美国、日本先后连续实施货币宽松政策，经济开始出现复苏。欧盟在加强对困难国家金融救助同时，在财政政策上也加强了统一协调，整个经济趋于稳定并向好的方向转化。与此相反，新兴经济体由于资金流出，经济增速出现下滑。我们要积极运筹、抓住机遇、趋利避害，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把银行贷款和社会资金引导到有利于促进结构优化的投资领域，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在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中实现稳增长。以下领域应作为引导投资的重点。

（一）加快城际高铁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铁路是绿色运输方式，与公路、航空运输相比，单位运输量的成本仅为其 1/10 到 1/100。高铁的出现，在 300 公里为半径的距离内可形成一小时商务圈，将促进城市群的发展，改变现代城市和生产布局。我国人多地少，发展高铁适合国情。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赶上美国，但铁路通车里程不到美国的 1/2。高铁技术作为国人的骄傲，可成为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如果说上世纪 90 年代我们能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把挑战变为机遇，一个标志性的举措就是大规模地进行了高速公路建设，那么，这次能不能把全球经济危机的挑战变为机遇，主要就看能不能加快高铁建设。铁路建设现在有 2 万亿元债务，不必过于担忧。只要把铁路资产重新评估一下，债务率即可大幅下降。而且在铁路快速建设阶段，出现一些债务是正常的。应当通过股权多元化、发行长期建设债券和增加贷款以及贷款证券化等措施，为铁路建设筹集资金，尽快形成高铁网络，从而使国民经济发展跨上一个新平台。发展城市轨道交通是破解交通拥堵难题的有效途径。我国拥有 200 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即达 42 个，大部分都没有地铁和轨道交通，这是造成城市交通拥堵的重要原因。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采取限制购车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这是一个消极的办法。发展公共交通特别是轨道交通，才是积极措施。加快城际高铁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可产生巨大需求，使闲置生产能力得以发挥，并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优良资产。

（二）扩大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实施整洁农村、美丽中国工程。根据河南新乡和许多地区的经验，适应农民改善居住质量和环境的愿望，选择经济比较发达的乡镇或中心村，集中建设新型农村社区，配套提供各种公共服务设施，以建筑成本价卖给农民，与农民原有的宅基地相交换，节省的宅基地可作为新增建设用地或耕地。采用这一办法，把农户改善住房的需求、开发商的利益与政府发展规划有机结合在一起，把新型农村社区、工业园区和农业耕作区有机

结合在一起，形成联动机制。用吸引而不是强制的办法进行农村居住与产业空间布局的优化调整，实践证明深受农民欢迎，对发掘农村巨大潜在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将发挥重要作用。应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城镇社区建设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实行一体化的制度和政策，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三）加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重点解决进养老院难、入幼儿园难、停车难等问题。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空巢老人越来越多，发展养老产业面临着机遇。应当把居家养老和集中养老结合起来，提供多层次的服务。随着家庭对儿童学前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幼儿园设施不足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矛盾。应当加快养老院、幼儿园设施建设和护工、幼儿教师的培养，以满足社会新增长的需求。随着轿车普及率的提高，城市停车成为日益严重的难题。建设立体和地下停车场，已迫在眉睫。此外，城市要把为农民工提供公租房纳入保障房建设范围。特别是那些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城市，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他们提供公租房，有利于稳定职工队伍，提高城市的整体竞争力。政府对于这些新增的需求应当十分敏感，及时为群众排忧解难。要采取特许经营权的方式，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到公共服务发展上来。应当说，解决这些问题并不难，关键在于政策到位。各级政府应当把解决这些群众关心的问题作为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举措。干好这项工作，既能拉动投资，又能启动消费，更能扩大就业，是一举多得的好事，亟待摆上政府重要议事日程。

（四）把环保产业作为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

今年年初我国出现的大面积雾霾天气，不是偶然发生的现象，而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国务院最近推出治理大气污染的十条措施，应当以此为契机，加大对环保产业投入。生态环保产业所提供的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等公共产品，具有共享性的特点，其投入的成本不可能像一般商品那样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价值补偿，必须通过改革生态体制，建立共享性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机制。政府应颁布强制性污染物排放标准并严格监督实施。对脱硫脱硝除尘等任务，必须由独立于排放方、具有特许经营权的第三方来执行。环境治理成本由企业、政府和居民三方合理分担。如果说过去我们发展水平比较低，忽略了产品的环境成本，那么，现在人均 GDP 已达到 6000 美元的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已经完全能够承受环境成本。即使有少量困难家庭承受不了，政府可以采取困难补助的方式予以解决。如果能够建立起这种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机制，使投资环保产业同样能够盈利，同样能够创造 GDP，同样能够增加就业，就能吸引大量社会资金投入，生态环保产业就能成为新的投资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目前治理污染的技术已成熟，而且相当部分设备国内都能制造。发展环保产业可有力地拉动经济增长。目前，造成大气污染的主要行业包括煤电、钢铁、水泥、化工等，全部

采取污染治理措施，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治理汽车尾气污染，可通过提高油品质量的措施加以解决，其技术是现成的，关键也在于需要用户承受一些成本提高的负担。在普遍采取环保措施之后，由于环保设备和环保产品生产规模扩大，会降低一些成本，减轻用户负担。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抓紧建立鼓励社会资金投资环保产业的机制。国外一些大城市治理空气污染曾用了二、三十年时间，我们发挥后发优势和制度优势，调动全社会力量，有可能在三五年内取得明显成效。

（五）针对大宗进口物资实行以产顶进

去年，我国进口总额超过 1.8 万亿美元，其中，石油和化工产品达 4000 多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产品可以在国内组织生产。我国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有成熟的煤炭直接液化和间接液化技术，煤制烯烃、芳烃的技术也已取得突破，成本均低于进口。发展煤制油和煤化工，既能降低对进口的依赖，又能增加就业，应当果断决策，放开手来干。特别是作为重要化工中间原料的对二甲苯（PX），由于近几年耽搁建设，没有投产项目，已造成对进口的过度依赖，去年进口超过 700 万吨，占国内消费量的 62%，进口额达 8000 亿元。日本、韩国 PX 产量的 2/3 向我国出口，价格不断提升，整个石化产业链的利润迅速向 PX 集中。选择人烟稀少的荒岛，集中建设大规模、现代化 PX 生产项目，以解决国内市场的紧缺，已成为当务之急。我国集成电路的进口用汇已超过石油进口。围绕集成电路的技术攻关，组织产业联盟，把科研机构、生产企业、使用企业和大学的力量联合在一起，在财政的适当支持下由各方出资，成果共享，力争攻克难关。我国大豆进口量已超过 5000 万吨。在新疆北疆等地区，还有 1000 万亩可耕地和淡水资源，适宜种植大豆。政府有关部门应制定规划，支持企业与地方扩大生产，以降低进口比重。

（六）把淮河经济带建成我国第四增长极

淮河流域地处我国腹心地带，有 1.8 亿人口，27 万多平方公里，土地肥沃、资源丰富、雨量充沛，发展现代产业得天独厚。但是，由于降雨集中在每年 7、8 月份，雨季常常发生洪涝灾害；雨季一过，又无水可用，常常出现干旱，沦为豫、皖、苏三省经济发展的洼地。应抓住扩大内需的机遇，制定淮河流域发展总体规划，把加快淮河经济带建设作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扩大内需的战略支点，可把淮河打造为我国第三条出海黄金通道，使淮河流域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之后的第四增长极。淮河经济带建设以其投资规模之大、受益人数之多、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之好，将成为新时期扩大内需、建设美丽中国的重大工程。

责任编辑：刘英奎

对经济周期的再认识^{*}

林兆木

摘要：本文从经济周期的规律研究当前经济问题，从经济周期的客观进程来观察和分析经济现象，密切联系近几年国内外经济形势，总结了经济周期规律和历史经验的启示，并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周期的成因和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

关键词：经济周期 中国经济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作者简介：林兆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

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符合经济规律

2012 年中国 GDP 比上年增长 7.8%，是近 13 年最慢的一年，其中，第三季度降到 7.4% 的低点之后，第四季度反弹至 7.9%。国外媒体和市场普遍希望中国经济今年继续回升，拉动全球增长。4 月初公布一季度中国 GDP 同比增长 7.7%，低于市场预期，也是自 2012 年二季度起连续 4 个季度增速低于 8%，再次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关注。IMF、OECD 等国际机构相继调低了中国经济今明两年增长率的预期，国外一些评论对中国经济前景表示担忧。但也有不少评论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件好事，如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认为，增速放缓“反映出这个全球最富活力的经济体正在进行长久以来人们

^{*} 本文完成于 2013 年 6 月中旬。

所期待的结构转型”。俄罗斯媒体评论认为，“增速放缓并不能说明中国经济遭遇了严重问题。相反，完全有理由认为，它正步入有别于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的新发展阶段”。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认为，“预计中国经济今年仍将增长 7.5%，比全球五大经济体中其他任何经济体都要快得多，由于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样的增速仍意味着增添巨大的产能和需求”。“事实上，中国将迎来一段增长较慢的时期是可喜的消息——无论对中国本身还是对全球经济都是如此”。显然，这些评论是客观和中肯的。

实际上，任何国家经济增长都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的。1979-2012 年中国 GDP 累计增长 23.3 倍，年均增长 9.8%，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即便如此，在这 34 年间中国经济由于外部冲击和内部调整等原因，也同样经历过几次不同幅度的升降起落，年均增长率并不是每年都保持均速的增长率。

如图 2、图 3 所示，1981 年因经济调整，GDP 增长率降到 5.2%；1984 年上升到周期峰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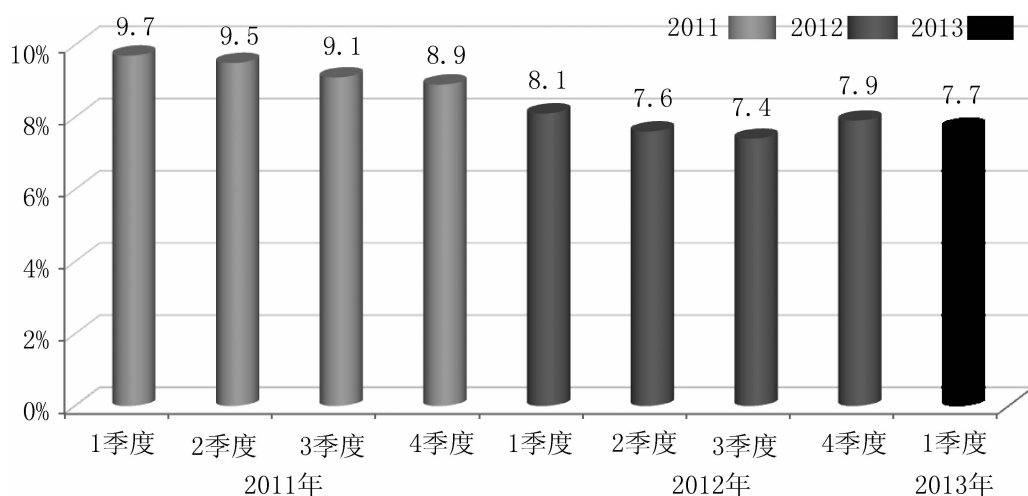


图 1 近年来中国经济走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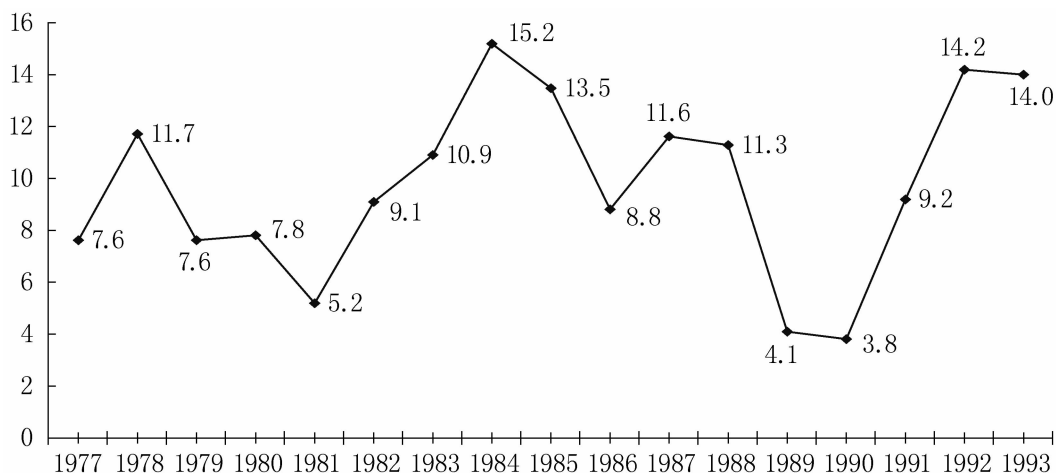


图 2 1977-1993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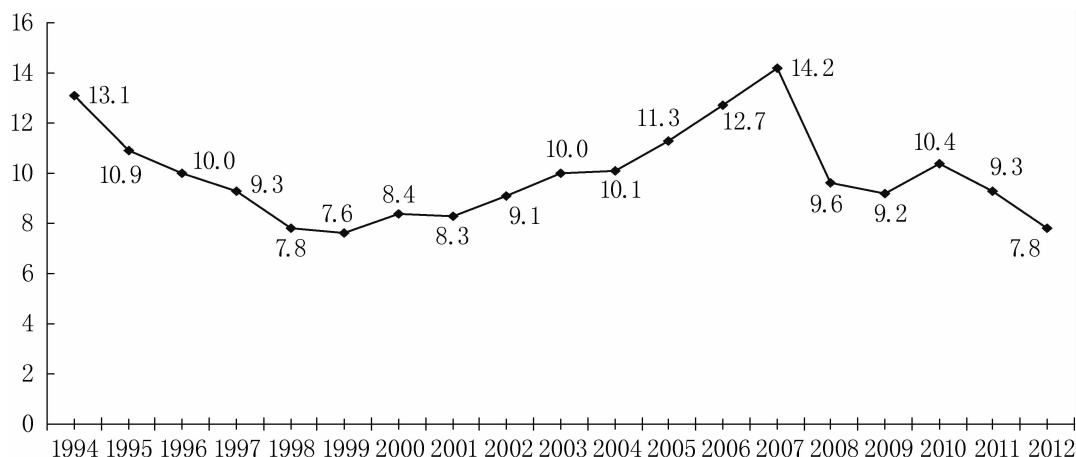


图3 1994-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15.2%，1986年回落到8.8%；1988年开始的调整，更使1989年、1990年GDP增速降到4.1%和3.8%。1992年再次升到新一轮周期峰顶14.2%，而后因治理高通胀，增速逐年回落；1998、1999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增速降到7.8%和7.6%。2000年以后进入新一轮周期，受中国加入WTO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以及2003-2007年世界经济处于上升期等有利影响，2007年中国增速升到周期峰顶14.2%。但与此同时，由于2003-2007年连续5年10%以上的高速增长，也加剧了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失衡等结构性矛盾，以及资源消耗过多、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中国经济必然要经历一次大的周期性调整，经济下行和潜在经济增长率回落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事实说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同样存在周期性波动，只是具有周期较长，扩展期长达七、八年，下降期较短，没有出现负增长等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经济周期的特征。

2009年6月，我在《危机对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格局的影响》一文中曾提出：“研究GDP潜在增长率，除了要考虑新增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两个基本要素，还要考虑国内外市场需求容量以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随着能源、资源、土地、环境以及资金、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依靠低要素成本、低资源成本、低环境成本的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已不可能再继续下去，必然导致经济由扩张转为收缩的周期性调整。”“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过后，我国经济增长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像前些年那样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不仅在危机中已经改变，而且在危机后也不可能恢复。”我在论文中还指出：“GDP增长速度和GDP总量有密切关系。GDP总量越大，每增长1个百分点所含的绝对量就越多”，“随着我国经济总量越来越大，GDP潜在增长率逐步下降是正常的，符合经济规律。”“综合这些因素，我国今后中长期GDP潜在增长率为7%-8%的判断比较符合实际。”“总之，至关重要的是在适当降低经济增长率的同时，通过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每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的就业容量、科技含量和投入产

出效益，并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成本。这正是我国应对危机带来的经济增长格局重大变化的出路所在。”^①现在看来，四年前的这些判断，是符合实际的，对分析当前正在经历的增速放缓，仍然有现实的针对性。

二、经济周期规律和历史经验的启示

（一）防止经济大起大落，首先要防止大起

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大起都带来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和结构失衡等严重问题。第一次是 1984 年增速冲到 15.2% 的峰顶，造成投资信贷增长过快、结构失调、通胀率上升，最终导致 1989 年和 1990 年的大落，速度降到 4.1% 和 3.8%。第二次是 1992 年再次加快速度，冲到 14.2% 的峰顶，紧接着就出现严重通胀，CPI 升到 20% 以上，被迫进行多年的治理通货膨胀。第三次是在 2003-2005 年连续三年 10% 高速增长之后，2006 年和 2007 年冲到 12.7% 和 14.2% 的峰顶。这次冲刺同样付出了很大代价：货币信贷过量投放，引起物价上涨和资产泡沫以及结构失衡和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等问题。历史经验一再证明，经济大起之后必有大落，经济剧烈振荡造成了资源大量浪费和损失，一年或几年的过高速度所加剧的结构性矛盾和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往往是多少年也难以解决和弥补的。因此，当经济处于周期上升阶段时，不应当急功近利、人为地去加快速度。明智之举是应当采取措施“削峰”，减缓上冲速度，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引导到优化结构、提高效益上来。

（二）防止大落，应把着力点放在深化改革、调整结构上

经济冲到峰顶之后，由于通货膨胀和结构性矛盾的积累，随之而来的经济调整和增速放缓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时由于刚刚经历高速增长，各方面对经济的预期仍然看涨，因而往往下不了决心调整和减速。例如，为解决 1984 年过高速度造成的货币信贷过度扩张问题，中央在 1985 年召开了四次省长会议，但由于认识不统一，1986 年经济尚未“软着陆”，1987 年、1988 年又加快到 11.6% 和 11.3%，终于被迫在 1989-1990 年进行力度大得多的调整。又如，前几年在经历五年 10% 以上高速增长（其中 2007 年上冲到 14.2%）之后，又遇到国际金融危机猛烈冲击的情况下，对中国经济进行一次大的调整并降低增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但是，当时各方面追求高速度的惯性仍然很强，对经济刺激政策的期望值过高，导致财政、货币政策双宽松，货币信贷投放过量，使 2008 年、2009 年保持了 9.6% 和 9.2% 的增速，并在 2010 年反弹到 10.4%。这给人们一种印象，似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仍在 10% 左右。其实，这并非客观的潜在增长率使其然，而主要是财政、货币

^①《人民日报》2009 年 7 月 6 日理论版。

政策的作用和政府主导投资的结果。为获得超过 7%—8% 的 2、3 个百分点的增长，不仅成本高、代价大，加剧了结构性矛盾和资源环境等问题，而且是不可持续的，随着政策刺激力度减弱，增速仍然要掉下来。1998 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虽然也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但货币政策并没有扩张；而且国债资金都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用于扩大制造业产能，相反，通过改革和调整，压缩了过剩产能，改善了产业结构。与此同时，通过“债转股”等措施，剥离银行不良资产，减轻企业债务负担，为企业脱困和防范金融风险创造了条件。历史经验说明，当经济下行不可避免时，应当利用需求增速减缓、市场竞争加剧的压力，加大改革和结构调整力度，推动企业和整个经济转型升级。为防止经济过度下滑而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应当适时适度，避免违背经济规律而人为地去推高速度。

（三）保持投资适度规模和加强农业

这是防止经济周期大幅波动的两个重点。固定资产投资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增强发展后劲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投资过度又是通货膨胀、经济关系失调的主要动因。建国以来几次经济调整和治理通货膨胀，都是由于投资过度、粮食生产下降“双碰头”引起的。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投资仍然是决定经济周期的重要因素。关键是保持投资的适当增速和适度规模，既要充分利用经济增长的潜力，又不能导致严重通货膨胀和资源过度消耗。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仍然是不应忽视的薄弱环节，如果产量持续下降，不仅会影响供给，而且会影响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需求。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客观上存在着耕地减少的趋势，种粮收益又比较低，始终要注意因粮食生产的波动导致经济全局的不稳。

（四）扩大消费需求和加快发展服务业

这是增强经济发展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基础。中国消费率持续偏低，投资率居高不下，经济发展过多地依赖投资和工业带动，既是资源消耗强化、环境压力加大、增长可持续性减弱的重要原因，也是形成大量低效重复建设和银行呆坏账的重要根源。逐步改变这种经济增长格局，转向主要依靠消费和服务业带动，才能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扩大消费需求，最重要是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合理分配国民收入。当前要着力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着力增加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使全社会具有适度的消费需求。这既是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也是增强经济持续发展动力的要求。

（五）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的关系

防止经济周期性大幅波动，维护宏观经济大环境的稳定，从根本上说有利于各地方、

各行业的发展和利益，但从当前看，同某一个局部利益也很可能产生矛盾和冲突。而且宏观的、全局的问题，从各个行业、企业和各个地方的角度，是不好把握、难以完全看清楚的。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一般情况是政府更关注经济增长和就业；而货币当局负责稳定币值，抑制通货膨胀，因而更关注宏观经济稳定。中国中央政府一身两任，既要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又要稳定币值，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而地方政府较多地介入经济活动（这一点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所以同宏观、全局的决策也就有可能产生矛盾。因此，为减少经济周期性大幅波动，必须防止由各个局部推动发展而导致全局性结构严重失衡和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防止由于政府换届周期所产生的只顾短期政绩而透支未来发展条件的做法。

（六）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社会的管理无所不包，高度集中，市场取向的改革就是要从政府直接配置资源转向由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政府通过经济、法律手段和财政、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间接调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与 30 年前相比，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都还没有到位，政府仍然管了许多不该管的经济事务，主导投资项目、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情况仍很普遍，宏观调控过多使用行政手段，也往往导致对市场主体积极性、主动性的束缚。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将过多时间和精力用在直接干预经济事务上，也导致政府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工作不到位。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和宏观调控部门的改革，才能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减少因政府干预不当或宏观调控失误对经济周期波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三、深化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周期成因和影响的认识

2008 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未来全球经济的影响极为深远。其中之一，就是深化了对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周期的成因和影响的认识。从国内来看，危机冲击和应对危机的经验教训，也深化了对在新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进入新阶段背景下经济周期之复杂性的认识。因此，联系五年来新的实践和新的认识，进一步对经济周期的成因、影响和对策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一）经济周期的成因

1. 机器大工业是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机器大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投资和生产规模都很大，上下游的产业链条又很长，一旦需求扩大、价格上涨就会带动生产和投资

扩张，并进一步带动中间需求和最终需求扩张；而一旦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扩张的链条断裂，价格下跌，就会导致投资萎缩，需求大幅减少，产品和生产能力过剩的矛盾就会导致经济危机或衰退。经过危机或衰退，一方面淘汰了落后的企业和技术；另一方面刺激了新技术的采用，并催生新的产业，成为结构优化和大规模投资的起点，从而促进经济走向复苏。正是机器大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使生产规模具有巨大的、突然跳跃式的膨胀力和收缩力，并使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产生扩张与收缩相交替的周期运动。

2. 市场经济是经济周期的体制原因。市场经济是为卖而买、为获取利润而生产的经济，企业追求利润的动机使得繁荣时期的投资决策受利益冲动和盲目乐观情绪所驱动，激烈的市场竞争也驱使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并尽力扩大投资和产能；而信用制度、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也为投资与生产扩张提供资金和市场条件。以上几个方面因素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投资和生产的扩张与收缩交替运动的体制基础。

3. 资本主义的占有和分配制度是经济周期的制度根源。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地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不仅在一国之内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少数人占有大部分国民收入和社会财富，而收入越高，其边际消费倾向越低；同时，占国民大多数的劳动者收入偏低，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不足，并与投资和生产的不断扩张形成尖锐矛盾，最终导致周期性危机或衰退。

（二）影响当代经济周期的三个因素

以上三个成因主要是从分析传统形态的经济周期得出的，对于分析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经济周期，虽然也仍然适用，但又是不够的。我认为，有三个因素对当代经济周期产生了重大影响。

1. 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对经济周期有深刻影响。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制造业持续大规模向国外转移，伴随这种转移的是跨国公司主导的跨国贸易和投资迅猛发展。从此，国际贸易、国际价格变动、跨国投资、国际金融流动、国际资源转移等，都越来越成为各国经济周期的重要影响因素。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经济发生周期性波动时，都会透过贸易与资金的连锁关系影响到别的国家或地区；而任何国家、地区所发生的波动，也不再局限于从单行道的方式影响别国，而是会回过头来使自己受惠或受害。尤其是由于发达国家制造业比重过于降低和实体经济空心化，大量资金进入虚拟经济投机套利，导致资产泡沫持续积累，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就必然引发全球性的经济衰退。这时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溢出效应也就转变为负面的溢出效应。

2. 虚拟经济的高度发展对经济周期的上下波动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近二、三十年来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品超常发展，吸引大量资金进入虚拟经济领域，本来以对冲和规避风险为目的的金融衍生品，由于它本身的复杂性和难以监管，结果走向了反面，成了

表 1 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变动情况 (%)

	美国			日本			德国			法国			英国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1970	3.5	35.2	61.2	6.4	46.0	47.6	3.7	48.1	48.2	8.1	34.9	57.0	2.9	42.1	55.0
1980	2.9	33.5	63.6	3.8	41.3	54.9	2.4	41.1	56.5	4.9	31.8	63.3	2.1	40.7	57.2
1990	2.1	27.9	70.1	2.6	39.7	57.8	1.5	37.3	61.2	4.2	27.1	68.7	1.8	34.1	64.1
2000	1.2	24.2	74.6	1.8	32.4	65.8	1.3	30.3	68.5	2.8	22.9	74.3	1.0	27.3	71.7
2007	1.3	21.8	76.9	1.4	29.3	69.3	0.9	30.4	68.7	2.2	20.4	77.4	0.6	23.0	76.3

数据来源：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 (2002)；世界发展指标 (2010)。

诱发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导火线。从亚洲金融危机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可以看出，由于虚拟经济出了问题而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冲击力、破坏力，远远大于实体经济本身出了问题所造成的后果。

3. 发达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失误加大了全球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本来应以熨平周期为目的的宏观经济政策也走向了反面，成了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重要杠杆。例如，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前，美国货币当局在 2001 年经济衰退之后，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将联邦基金利率从 2000 年 6.5% 的高点，连续 13 次下调到 2003 年 6 月至 2004 年 6 月间的 1%，这就使得美国金融机构杠杆率大幅提高，金融机构、企业、政府和居民的债务大量增加。美国政府每年新增债务占 GDP 的比重，由 2001 年的 0.39% 逐年上升到 2008 年 5.9%。政府债务余额占 GDP 的比重，由 2001 年的 58.6% 逐年上升到 2008 年的 75%。私人也是大量借债消费。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按照国民经济核算的美国经济透支率（私人 and 政府总支出与 GDP 的差值占 GDP 的比重）2000-2008 年平均超过 4.7%，次贷危机爆发前的 2006 年美国的经济透支率达到 5.7%。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也是由于财政政策失误，长期“寅吃卯粮”、债台高筑所致。

（三）近几年经济发达体货币政策的效果

现在值得严重关注的是，自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为刺激经济复苏，又故伎重演，实施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发行国债，增加基础货币供给，造成了多方面的不良后果。

1. 政府债务大幅攀升。据 IMF 统计，2012 年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例已升到 110%，为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

以增加政府债务为代价拯救金融体系免于崩溃，虽然避免了更大的危机，但也增加了新的矛盾和问题。因为债务总要偿还，何况是以牺牲全社会资源和福利为代价，必然

导致新的失衡。发达国家为应对本轮危机和衰退，虽然用尽财政、货币政策手段，但至今仍然失业率高企，经济复苏艰难，已经证明扬汤止沸不仅不能治本，还会为下一轮周期性衰退埋下祸根。

2. 导致全球金融体系的流动性不断积累。根据 IMF 对 1929 年以来全球 14 轮经济周期的研究，2008 年以来这一轮全球经济复苏是最缓慢的，但信贷反弹是最快的。全球流

表 2 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 (%)

年份 国别	2007	2012	2012 年比 2007 年上升
美国	64.00	101.60	37.6
日本	183.00	236.56	53.0
德国	65.36	83.04	18.0
法国	64.22	89.97	25.0
英国	43.71	88.68	45.0
意大利	103.08	126.33	23.0

数据来源：根据各国统计局、IMF 数据计算而得。

表 3 2008-2012 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 (%)

年份 国别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08-2012 5 年累计
美国	0.36	-3.53	3.01	1.70	2.21	3.66
日本	-1.04	-5.53	4.40	-0.7	2.00	-1.26
德国	1.08	-5.13	4.16	3.03	0.87	3.74
法国	-0.08	-3.15	1.66	1.70	0.03	0.08
英国	-0.97	-3.97	1.80	0.76	0.17	-2.29
意大利	-1.16	-5.49	1.81	0.44	-2.37	-6.74

注：按 IMF 国内生产总值（不变价）计算。

表 4 发达国家央行资产负债规模及增长率

项目 年份	美国		欧元区		日本	
	亿美元	%	亿欧元	%	亿日元	%
2007	8938	100.00	15112	100.00	1112845	100.00
2008	22409	250.73	20767	137.42	1227709	110.32
2009	22373	250.32	18525	122.58	1225337	110.11
2010	24235	271.15	20044	132.63	1287105	115.66
2011	29285	327.66	27356	181.02	1430219	128.52
2012	29089	325.46	30182	199.72	1583627	142.30

数据来源：根据各国央行、IMF 数据计算而得。

表 5 发达国家基础货币及增长率

项目 年份	美国		欧元区		日本	
	亿美元	%	亿欧元	%	亿日元	%
2007	8248	100.00	8419	100.00	907835	100.00
2008	16550	200.65	11507	136.68	924351	101.82
2009	20192	244.81	10523	125.00	972143	107.08
2010	20111	243.82	10731	127.46	1040238	114.58
2011	26121	316.69	13353	158.61	1180195	130.00
2012	26726	324.02	16310	193.73	1319837	145.38

数据来源:根据各国央行、IMF 数据计算而得。

表 6 发达国家银行信贷及增长率

项目 年份	美国		欧元区		日本	
	亿美元	%	亿欧元	%	亿日元	%
2007	89296	100.00	145001	100.00	4133287	100.00
2008	93037	104.19	155347	107.14	4329570	104.75
2009	89818	100.58	159791	110.20	4259806	103.06
2010	91767	102.77	164574	113.50	4178937	101.10
2011	94220	105.51	164440	113.41	4234275	102.44
2012	99800	111.76	164640	113.54	4315933	104.42

数据来源:根据各国央行、IMF 数据计算而得。

表 7 发达国家货币供应量 M2 及增长率

项目 年份	美国		欧元区		日本	
	亿美元	%	亿欧元	%	亿日元	%
2007	74745	100.00	74369	100.00	7285588	100.00
2008	82048	109.77	81031	108.96	7420000	101.84
2009	85113	113.87	82751	111.27	7644352	104.92
2010	88225	118.03	84713	113.91	7822875	107.37
2011	96900	129.64	86702	116.58	8069882	110.77
2012	104826	140.24	90510	121.70	8278247	113.63

数据来源:根据各国央行、IMF 数据计算而得。

动性泛滥，导致大量套利投机资本在全球乱窜，刺激全球股市和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增加实体经济成本，特别是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带来资产泡沫等溢出风险；一旦巨大的流动性最终被迫收回，又将对金融、经济稳定造成冲击，因此很可能成为下

一轮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

从表 3 与表 4、5 的比较可以看出，2008-2012 年发达国家经济持续低迷，如美国 5 年累计 GDP 仅增长 3.66%，但是美联储资产负债规模和基础货币却都增长 2.2 倍。日本经济 5 年累计负增长 1.26%，而日本央行资产负债规模和基础货币 5 年累计也增长 40% 以上。欧元区经济同样持续低迷，而欧洲央行资产负债规模和基础货币也增长近 1 倍。央行基础货币是高能量的货币，央行放出的基础货币会在商业银行产生数倍的乘数效应，引起信贷大规模扩张。虽然从表 6、表 7 看，发达国家的银行信贷和广义货币 M2 供应量增长率，比其央行基础货币增长率低得多，其主要原因：一是危机前美国等发达国家商业银行杠杆率太高，危机发生后资金链条断裂，急需央行救助才能免于破产，因此，央行投放的基础货币被用于填补原来的窟窿，没有都用于新的信贷投放。二是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经济低迷，投资热点少，贷款风险高，商业银行贷款行为谨慎。但这并不是说，发达国家央行资产负债规模和基础货币前所未有的扩张不存在风险。央行放出去的这些高能量货币实际上已经存在于金融体系之中，一旦经济回暖仍然会产生乘数效应，成为巨大的信贷资金流，既可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也可能成为脱缰之马，再次冲击世界经济。获得 197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哈耶克曾论证了美国政府在 1927-1929 年间因担心经济景气趋缓，为了延长繁荣期而使用扩张货币政策，由此导致过度投资，虽然将繁荣延长了两年，但当后来美国政府无法再使用经济政策来维持消费和生产扩张时，就将本来相对自然而平稳的不景气，最终演变成为历史上永难忘怀的“大萧条”。哈耶克认为，信用贷款突然注入经济体系，会改变商品的相对价格，由此产生无法维持的过度投资，资源将被误引至原本不会被引进的领域，而信贷的增加刺激投资，但此种投资无法持续维持，以至发生经济波动。不幸的是，哈耶克早已指出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产生的这些弊端，近几十年又一再重复出现。

近几年，发达国家在实行超低利率的同时，推出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现在这种政策只有对经济复苏的效果不佳这一点是清楚的，其他都不清楚。例如，对发达国家经济和全球经济将产生什么危害，不清楚；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会产生怎样的冲击，不清楚；今后如何退出收场，一旦退出又会产生什么冲击，不清楚。

在上述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世界经济走势的大背景下，我们不仅要关注短期问题，即对中国近期外贸、外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且要研究对中国中长期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尤其要防范国际虚拟经济、投机资本的冲击，坚持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留有足够的回旋余地，以避免发生财政、金融的系统性风险。

责任编辑：刘英奎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重大战略选择

王一鸣

摘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保持当前经济平稳增长和增强中长期发展动力的重大战略选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根本在于深化改革，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必须增强创新活力。城镇化是中国最大内需潜力所在，也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战略重点。

关键词：中国经济升级版 改革红利 城镇化 创新驱动

作者简介：王一鸣，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错综复杂，积极因素和隐忧并存。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应对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保持当前经济平稳增长和增强中长期发展动力的重大战略选择。

一、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内涵和特征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从根本上说，就是要适应国际环境深刻调整和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对既有发展版本进行升级，使中国经济发展有更高质量、更具活力、更富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相比较于既有版本，“中国经济升级版”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和特征：

第一，升级版的发展形态是数量和质量的统一。升级版不是不要数量和速度，没有

数量和速度，质量和效益也无从谈起，但升级版要求的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是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的速度。相比较于既有版本，升级版更加强调质量和效益，这是因为今后一个时期，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已经由生产能力的大规模扩张，转向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科技进步和体制变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就要求将经济工作的重心，切实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第二，升级版的根本动力在于释放改革红利。升级版要求明确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进一步向市场放权，为企业松绑，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取消不合理的政策和制度规定，清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加快落实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并及时推出改革新举措，让市场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使经济发展潜能进一步释放出来。

第三，升级版的需求动力来自于挖掘城镇化潜力。城镇化是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相比较于既有版本，升级版更加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通过对包括户籍、土地、财税在内的制度改革，以及加强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发挥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第四，升级版的供给动力来自于增强创新活力。充分利用市场的倒逼机制，推进市场导向的科技创新，促进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加快科技创新、产品创新、品牌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提升产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通过改革构建创新生态，建立有利于创新潜能充分释放的体制环境，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培育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大动力。

第五，升级版的重要保障是社会公正。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必须守护社会公正的底线，政府要当好社会公正的守护者，努力使人人享有平等参与、公平竞争的机会。升级版更加强调要消除身份歧视，不论是来自城市还是农村，不论是来自怎样的家庭，只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就可以取得应有的回报；不论是怎样的财富创造者，是国企、民企还是个体经营者，只要靠诚信公平竞争，都可以获得应有的成功。

第六，升级版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民生。升级版强调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持续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重点保障基本民生，编织一张包括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基本养老、保障房等覆盖全民的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网，坚守网底不破，保障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利和人格尊严；强调更加主动地采取措施，解决突出问题，力推绿色发展，让人民群众呼吸洁净空气、喝干净水、吃安全食品。

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重大战略选择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既有发展版本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带有当时发展阶段难以克服的矛盾和问题，比如经济增长过多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发展不协调特征比较突出；依靠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支撑发展，发展效率总体不高；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发展成果共享不足；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发展代价过高过大。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矛盾趋于突出，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步减弱，创新能力不足日趋显现，能源资源约束持续强化，既有发展版本的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地暴露出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既有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部需求收缩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动力趋于减弱，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越来越不适应外部环境和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必须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可以说，再按原有版本运行下去，发展中面临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风险将不断加大，必须加快发展版本的升级。

从国际经验看，中国也正处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世界银行 2006 年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其基本涵义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高收入的门槛。从二战以后的情况看，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既有利益格局制约，体制调整变革难以有效推进。

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 30 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后，2012 年人均国民收入突破 6000 美元，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这个阶段往往是矛盾和风险凸显的阶段，劳动力成本进入上升期，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自主创新能力难以大幅提升，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积极主动地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使之更加适应外部环境和增长阶段的变化，从而避免原有发展版本的制约，最大程度地化解各种矛盾，才能充分利用发展版本升级创造的新的增长空间，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既定的发展目标迈进。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应对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保持当前经济平稳增长和增强中长期发展动力的重大战略选择。今后一个时期，我们既要化解过去高增长时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又要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着力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增强可持续发展动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凸显。

第一，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释放改革红利的战略要求。深化改革，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把应该由市场承担的功能交给市场，发挥企业的市场经济主体作用，强化政府为市场主体服务的职能，通过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就能释放经济发展的巨大潜能，激活经济发展的动力。

第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挖掘内需潜力的战略要求。过去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程度较高。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市场扩张速度明显放慢，贸易保护主义有增无减，外部需求明显收缩。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进程，特别是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可以形成巨大的消费需求，进而吸纳过剩的生产能力，并继续创造基础设施和住宅等投资需求，使经济增长由过去过多地依靠外需转向内外需协调拉动，实现经济新的平衡。

第三，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增强创新活力的战略要求。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科技投入大幅增长，自主创新能力有所提升，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开始显现。但总体上看，企业创新能力不强，技术转移和转化水平低，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不完善，与经济发展结合还不紧密，但这也为增强创新活力留出了空间，只要加快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倒逼市场主体强化创新，推进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转变，就可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综上所述，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既十分紧迫，又有必要的空间，改革红利尚未完全释放出来，国内市场潜力尚未充分挖掘，创新尚未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只要我们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就完全可以打造具有更高质量、更有活力、更富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升级版。

三、打造升级版关键在于释放改革红利

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但经济转型客观上受到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制约。中国人口众多，但劳动力素质偏低，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城乡地区差异大，生产方式呈现多层次特征，增大了经济转型的难度。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经济结构加快变动，重化工业比重提高，能源消耗总量增大，资源环境矛盾加剧。与此同时，社会结构深刻调整，利益关系更趋复杂，各种矛盾集中显现，进入了矛盾多发期。

从根本上说，经济转型迟缓主要是受到体制条件的制约。这主要表现在：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资源配置权过多过大，越位、错位、缺位现象仍较为普遍。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非公经济发展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财税、金融

和土地制度改革滞后，资源要素价格扭曲，资源环境压力没有完全通过价格信号传递给市场主体。特别是现行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使地方政府重规模速度、轻质量效益，更多依靠行政手段推动发展，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使经济发展付出了较大的成本和代价。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根本在于深化改革，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无论是挖掘内需潜力，还是增强创新活力，关键都在于深化改革，塑造新的体制机制和利益分配格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制机制引导市场主体行为，形成相关利益格局，决定对发展版本的选择。虽然相对于以往时期，推进改革受到“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样”的牵制，但不突破原有体制机制，不冲破既有利益格局，既有发展版本就很难升级。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主要就是比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方面，渐进推进市场化改革，不断扩大和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和功能；另一方面，有效发挥政府动员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驱动为主，逐步转向由创新驱动发展和提高效率为主的阶段，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要进行相应调整。过去在成熟产业领域，技术路线明确，市场前景较为明朗，政府通过组织资源进行大规模投入，可以达到预期目标。但在新兴产业领域，技术路线不明确，市场前景也不明朗，再像以往那样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就会造成资源低效配置，甚至浪费和错配。这就要求政府从直接抓发展，转变为营造创新创业的良好环境。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政府应该是创造环境的主体。政府的职能主要是为市场主体服务，通过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改革的基本方向，应该是更加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把应该由市场承担的功能交给市场。

第一，加快行政体制改革。以简政放权为核心，下决心减少审批事项，抓紧清理、分批取消和下放投资项目审批、生产经营活动和资质资格许可等事项，严格控制新增审批项目，把市场和社会能够承担的职能交还给市场和社会。政府管理重心要逐步后移，由“前置”的审批环节转向“后置”的服务和监管，并且对“后置”严格依法进行规范。创新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推动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

第二，加快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明晰产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合法财产权益，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更好地发挥中国资源要素潜力和综合配置优势。

第三，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环境。加快国有大型企业改革，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促进产业升级、参与国际竞争、提升综合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鼓励、支持和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消除各种制度性障碍，打破事实上存在的“玻璃门”和“弹簧门”，强化产权保护，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第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财政预算制度，建立公开、透明、规范、完整的预算体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减少、合并一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建立健全覆盖全部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分享制度；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机制，提高基层政府财力。

第五，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建立健全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充分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放宽金融业准入，加快和规范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和面向小微企业、“三农”的中小金融机构，健全现代金融体系。

第六，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改革个人所得税制，从高收入人群开始试点包括工资和财产性收入在内的综合个人所得税，建立政府高级公务员公布财产制度并纳入综合个人所得税。提高国企利润上缴比例，并划拨政府持有的上市国企股份到社保体系，成为社保可持续收入来源。形成更加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制度，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第七，全面提高开放水平。加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力度，激发服务企业创新活力和竞争力，进一步推进各个领域的开放合作。加快形成和完善一整套有利于培育中国竞争新优势的制度安排，引导企业由价格竞争转向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竞争。

四、打造升级版要求挖掘需求潜力

城镇化是中国最大内需潜力所在，也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战略重点。本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持续加快，城镇化率年均提高 1.36 个百分点，2012 年城镇化率达到 52.6%，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城镇化进程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滞后于城镇化发展要求，以及大中城市与小城镇发展不协调、城镇化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协调。特别是全国 7.1 亿城镇人口中，仍有约 2.6 亿农业转移人口没有完全市民化，享受不了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以有效挖掘城镇化带来的内需潜力，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城镇化，要从以城镇规模扩张为主的阶段向以提升质量为主的阶段转换，由以城镇建设为主向以人为本、城乡融合、绿色低碳的模式转变，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优化城市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实现生产方式

和生活方式变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第一，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大约为农村居民现金性消费支出的 3.2 倍。大量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之后，消费倾向和消费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购买能力和对工业品的需求将大幅提升，进而对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为此，要把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点，积极稳妥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农村产权确权、登记、颁证制度。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统筹推进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将基本公共服务逐步覆盖到符合条件的常住人口。

第二，积极发展城市群和大都市圈。进一步优化发展“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促进形成以上海、北京、广州等一批国际大都市为核心的开放型国际化城市体系，加快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海峡西岸城市群发展，积极培育北部湾、长江中游、成渝地区、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等一批基础条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的新兴城市群，增强这些城市群吸纳农村转移人口的能力，使越来越多有能力和符合条件的转移人口就地落户，逐步融入迁入地并实现市民化。

第三，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提高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加快完善小城镇发展的财税、投融资等配套政策，增强其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和人口集聚功能，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就业和转化为城镇人口。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的政策，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同等权益。

第四，增强城镇可持续发展能力。合理规划城镇人口规模，从严控制对耕地的占用，建立节约利用土地、水、能源资源的体制机制，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镇。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统筹中心城区改造和新城新区建设，有效预防和治理“城市病”。促进城市规模与布局与当地水土资源、环境容量、地质构造等自然承载力相适应。创新城市管理方式，完善城市治理结构，提高城市综合管理水平。

第五，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式，把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统一规划和通盘考虑，把城市和农村存在的问题及其相互因果关系综合起来统筹加以解决，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促进城乡规划一体化，加强城乡交通、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建设，建立城乡统一和均衡发展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

五、打造升级版必须增强创新活力

近年来，中国推动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科技投入大幅增长，自主

创新能力有所提升，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开始显现。但总体上看，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驱动，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高，推进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转变仍面临一些制约因素，主要是企业创新能力薄弱，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仅有不到 10%有研发活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平均仅为 0.71%，远低于发达国家 2.5%-4%的水平，技术转移和转化水平低，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不适应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要求。

今后一个时期，推进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转变，必须加快形成推动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通过为市场所需要、有利于提高市场竞争力的不同层次的技术创新，不断创造新的供给，从而满足和创造新的需求、新的市场，培育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

第一，推进企业主导市场导向的科技创新。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鼓励科技要素向企业流动，引导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加强研发平台建设，加大对中小企业、微型企业技术创新的扶持力度，加快建立高校、科研院所技术成果向企业转移机制，推进传统制造向以研发为基础的制造转型。

第二，把科技创新与完善现代产业体系结合起来。中国正在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能源，市场潜力非常大。要把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结合起来，力求掌握核心技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发应用，加强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

第三，构建科技创新的动力机制。加快生产要素和资源性产品的市场化改革，深化垄断性行业和国有企业改革，增强企业创新发展的动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and 执行力度。

第四，强化科技创新的教育和人才基础。推动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转变，对深化中国教育和人才培养制度改革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建立“宽进严出”的教育体制，积极探索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激励机制，造就高素质人才队伍。

第五，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立有利于创新潜能充分发挥的体制环境，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使全社会创新潜能充分迸发出来。

责任编辑：刘英奎

· 国际经济 ·

科学把握国际形势 努力提高开放水平

霍建国

摘要：目前，发达国家经济正处于不均衡复苏状态，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日益凸显，世界经济中长期的震荡和调整不可避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矛盾，我国应继续推进重点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坚持对外开放，通过深化改革释放增长的红利，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

关键词：世界经济 国际经济格局 对外开放 开放型经济

作者简介：霍建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一直处于震荡调整期。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相互交织，宏观调控与结构失衡相互抵消，多边协调机制影响力下降同区域协作加强形成强力反差，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日益凸显，全球治理充满矛盾。鉴于此，世界经济中长期的震荡和调整是不可避免的。发达国家经济目前正处于不均衡复苏状态，总体仍未摆脱衰退迹象。虽然发展中国家也普遍受到金融危机蔓延的影响，但新兴经济体仍保持了较好的增长势头，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和经济格局已发生明显变化。这种变化对我国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关键在于我们能否科学地把握形势，趋利避害，谋划未来。

一、如何看待当前的国际形势

（一）国际经济格局深刻变化，欧美主导仍未根本改变

自然法则是宇宙间一切事物存在和运动的基本法则，经济发展存在着内在规律性的变化法则，协调与均衡是维系自然法则的核心内容。任何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增长以及

任何强加于自然规律之上的规则，都是不可持续的。此轮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源于发达国家内部经济结构的长期失衡，此为内部失衡；另一方面则是世界经济长期发展环境的不公平性凸显，表现为外部失衡。因此，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面临着新的平衡发展的内在要求及加强全球治理的外部呼声。

发达国家经济基本呈现负增长或低增长，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则表现为较高的增长速度，世界经济格局相应呈现出新的变化。美、欧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分别从2009年的25%和28%下降到2012年的21%和23%，占全球经济份额持续下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世界GDP中的比重在2013年将超越发达国家，达到50%以上（2012年为49.92%），其中金砖国家的出口贸易占世界的比重从2007年的13.5%扩大至2012年的17%，进口贸易占世界的比重从2007年的10.7%上升至15.3%，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超过50%。

经济总量的变化导致新兴经济体的作用日益凸显，从全球经济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国际生产、贸易和投资的重要力量，在全球金融监管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重大经济、金融事务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的群体性崛起，已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并将严重影响到世界经济现有版图、格局和秩序的改变。但需要强调的是，从总体上看，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首推行的经济政策，一方面通过注入资金稳定了金融系统；另一方面又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大大缓解了其经济发展矛盾。但其政策的效果以及量化宽松政策给世界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不仅加剧了国际市场的动荡，更值得令人警惕的是，从中长期看其转嫁经济危机的意图十分明显，不但增添了全球经济的复杂性，同时也给发展中国家增添了新的挑战 and 压力。种种迹象表明，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格局的状况仍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为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及协调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若不能尽快形成有效的协调机制和全球治理模式，全球经济将难以最终走向全面复苏。

（二）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经济全球化受阻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呈扩大之势，贸易争端不断增多，贸易摩擦从产品延伸到产业，从贸易政策发展到经济政策，从境外竞争环境发展到境内的政策环境。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风潮中，除原有的反倾销反补贴这一传统手段外，也增添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如加强进口许可管理、金融信贷政策、国企政策、产业政策、国家安全审查、放任本币贬值、逼迫顺差国汇率升值等。一些发达国家还进一步通过贸易救济措施，强化对绿色、新能源产业和电子信息产品的贸易保护，致使全球各类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影响较大的最新案例就是中国光伏产品在欧盟遭遇的反倾销调查，年涉案

金额超过 100 多亿美元。这是欧盟对中国发起的规模最大的一宗贸易诉讼案，致使中国光伏产业及所涉及企业面临生存危机。

尽管首次 G20 首脑会议已就抵制贸易保护主义达成共识，但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头仍未得到有效遏制，且更为隐蔽化、多样化。如美国倡导的出口倍增计划，其本质也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数字显示，从 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6 月，20 国集团国家颁布的贸易限制措施多达 124 项。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球经济的复苏和稳定增长。世界贸易组织的报告显示，2009 年，全球货物贸易额下降 12.2%，货物贸易量下降 23%，国际直接投资下降了 39%。之后，虽有所恢复，但到 2012 年仍未达到危机前水平，而贸易、投资作为支撑全球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在其严重受阻的情况下，全球经济是不可能实现全面复苏的。

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矛盾进一步上升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过去 20 年，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全球化的利润过多地流向大型跨国公司，二是全球化发展中的协调和规范机制明显滞后。目前，各国对全球经济的关注重点正在转向气候变化、环境、环境产品、信息化与投资规则等更宽泛的议题。短期看，未来 3-5 年，由于统一的全球贸易规则难以形成，全球化仍将处于低潮，贸易与投资的发展将受到一定的限制；但长期来看，随着多边贸易投资规则的形成并发挥作用，随着全球治理的加强及国际秩序的形成，全球化的大趋势仍不会逆转。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充分认识到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化的不利影响，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应进一步发挥其在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的积极作用，并在推动形成国际多边投资体制方面有所突破。

（三）多边贸易体制协调难度上升，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

从 2001 年启动至今，致力于从多边角度推动全球贸易的多哈回合谈判已经断断续续进行了 12 年，早期在工业品关税、市场开放方面也曾取得一些成果，包括给予最不发达国家 97% 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的承诺框架、贸易便利化以及放宽公共健康领域的知识产权规定等，但自 2008 年以来，谈判一直被搁置，难有新进展。美国金融海啸引发的经济危机，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断陷入其中。时至今日，金融海啸尚未平息，债务危机此起彼伏，加深了经济危机的深度和广度，全球进入经济震荡和调整的国家名单越拉越长。经济危机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升级，使得多边贸易体制协调难度进一步增加。

与此同时，美国、欧盟、东盟等国家和地区都纷纷展开了广泛的自贸区谈判并取得较快进展，各经济体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和区域贸易协定（RTA）上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在已经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的 489 个区贸协定中，297 个正在有效实施，自贸协定和局部协议占 90%，关税同盟占 10%。其中，美国正在实施的区贸协定达 17 个，已

经签署尚待国会批准的有 3 个。欧盟作为整体参与正在实施的区贸协定有 30 个，已经通报世界贸易组织但尚未实施的有 4 个。我国正与 28 个国家和地区涉及 15 个自贸区谈判，其中，已经签署了 11 个自贸协定，正在商建的自贸区有 4 个。同时，我国已经完成了与印度的区域贸易安排联合研究，正在开展与韩国和日本的中韩 FTA 谈判和中日韩 FTA 谈判。

当前，以 WTO 为主的多哈发展议程谈判仍困难重重，难以落幕。与此同时，各区域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日益活跃，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当前多边贸易体制已构成了新的挑战。特别是以美国为首推动的 TPP 和 TTIP 自贸区谈判，以及以中国—东盟自贸区为主推动的 RCEP 谈判，影响深远。事实证明，目前的自贸区谈判已超越了区域贸易投资合作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讲，已显现了区域贸易壁垒的苗头及主导未来全球贸易规则的势头，这种趋势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但不管形成何种新规则，一旦拿到多边贸易体制，仍需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安排上做出平衡，而从目前形势判断，这种平衡难度仍然很大。

（四）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竞争形式不断变化

与金融危机相交织的欧债危机是冷战后欧洲经济发展遇到的最严峻挑战，正成为世界经济下行的主要风险来源。舆论普遍认为，欧债危机暴露了欧洲经济结构失衡、金融市场失控、福利水平失真、一体化建设失序等深层次问题。欧洲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发展体制已经较为成熟，按理市场经济内生调节理论可以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自行调节修复，但由于统一的欧洲在欧共体政策的驱动下，其市场的活力和纠错平衡能力已受到制约，加之欧共体长期实行排他性的对外经贸政策，贸易保护主义上升，限制了市场的活力和流动性，从而导致市场已经难以通过资源的自由流动来实现调节功能。欧洲国家长期依靠债务透支来支撑其经济社会发展，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技术进步停滞，这也是导致欧洲经济增长低迷的原因之一。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改革正在逐步加快，市场的活力和增长的动能进一步上升，从而激活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加之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进展又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进一步上升，并支撑了其经济增长，所以没有出现欧美式的危机。而欧美高福利社会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的提升日趋缓慢，难以支撑其经济的有效增长。因此，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也可以归结为欧美在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上丧失优势地位，导致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

如果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资源配置危机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必然导致全球经济危机的蔓延，并使得国际竞争更趋激烈。从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来看，国际竞争的主要形式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多哈回合谈判、哥本哈根气候大会、G20 会议之争，中美矛盾、中日矛盾等都表现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日益凸显。二是大国间的竞争。西方发达国家间的主导权之争、话语权之争、对核心资源的占

有权之争等都已全面展开，美国在亚太推行的 TPP 战略、在欧美之间启动的 TTIP 谈判，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美国新的全球战略布局及争夺主导权的意图。三是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竞争。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其发展模式等具有同质性，在国际市场需求增长乏力、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间的竞争也更为激烈。这种竞争主要体现的是发展的能力和影响力的竞争。与此同时，在国际事务方面，发展中国家则体现了更多的共同诉求，并存在着更强烈的合作意向。

适度竞争有助于社会发展，但在全球资源短缺的形势下，如果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不能有效发挥协调作用，将很可能导致过度竞争和不公平竞争，从而制约世界经济的发展。解决此问题需要重点把握两个方面，一是形成新的有影响力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协调机制。20 国集团的兴起客观上起到了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作用，所以应进一步加强 20 国集团的国际协调机制。二是发达国家经济再平衡的理念需要调整。发达国家认为，全球经济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新兴经济体大规模的出口导致贸易顺差剧增，国内消费不足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而真正的原因恰在发达国家自身内部结构的失衡，以及发达国家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未形成有效的平衡机制。

（五）发展理念的调整决定未来全球经济发展格局

此轮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美国雷曼兄弟银行倒闭所引起的，但从根源上可追溯至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形成的经济发展方面的新自由主义，其具体表现为：对金融监管的不断放松，导致金融资本同产业资本脱离，投资同投机混淆，在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扩张中，欧美社会又形成了高额的政府主权债务。在金融市场开放的形势下，银行的投资功能不断减弱，投机行为不断上升，对银行衍生品的过度发展形成依赖，金融风险持续上升。其根源是制度设置和监管能力存在问题，经营理念和竞争目的不纯。这些问题导致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交替影响，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金融危机暴露出了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所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目前，发达国家一些学者已开始对政府过度干预、高福利社会、透支消费、实体经济空心化及银行业和大宗商品市场价值失控等现象正在进行反思。危机后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将 0-0.25% 超低利率维持期限延长到 2015 年，2012 年再次加大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这一切刺激政策短期内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均属不可持续且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虽然 2013 年 6 月伯南克提出要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但目前来看，现行经济政策及主流的经济发展理念仍未发生改变。其完全退出的可能性并不大。若继续实施量化宽松，其结果很可能加剧美元的全球流动和泛滥，引致石油等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和农产品价格波动，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引发新一轮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问题。而其中发展中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更大的影响。

理论界对经济发展理念的反思还包括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与刺激政策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以及政府的社会责任和职能定位等。欧美等发达国家长期奉行市场经济体制，但其实施的市场经济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机制。现实情况是市场主导和政府干预共同发挥作用，其关键在于二者如何达到一种平衡，处理好哪些应是市场决定的，哪些应是政府必须干预的，否则，宏观调控和经济治理效果难以奏效。反之则矛盾积累，失衡和扭曲并存，经济将难以进入稳定的增长期。

政府替代市场的结果会导致企业增长的动能不足，而政府的缺位会导致过度的利益倾向并造成社会不公，从而影响社会稳定。欧美国家要想实现市场主导和政府干预的平衡发展，首先，要解决发展理念问题，形成可以集聚增长动能的新发展模式；其次，要重视发展实体经济，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积累社会财富，而不能完全依靠资本市场的交易游戏；第三，要重新确立金融资本同产业资本的协调发展模式，改革金融市场运行模式，由投机为主的经营转变为投资获利的发展模式，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总体来看，未来的世界经济将呈现两大趋势，一是新兴经济体将逐步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主体，其制造业综合竞争力将逐步提升；二是全球的技术进步和创新仍将控制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一边，发达经济体部分关键技术和零部件制造业的回归将有所加快，但不可能实现制造业的全面回归。期间，跨国公司仍将发挥巨大的作用，产业内贸易和全价值链的经营管理模式以及新型的商业模式的推广，都离不开跨国公司的推动与影响。因此，全球经济的复苏需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形成包容增长、协调发展的理念，发达国家必须从发展理念到经济理论上进行深刻反省，形成东西方相互包容与合作的和谐增长理念，世界经济才可能逐步集聚动能，重现发展生机，再次步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并形成合作、开放、共同发展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二、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我国经济社会总体运行良好，经济显现稳中有进的积极变化，但高增长所积累的矛盾进一步显现，历史上高投入所形成的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已严重制约了投资的发展，结构调整由于受到市场竞争环境的影响，仍处于艰难的转换过程中。以上矛盾应视为我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必然挑战。而克服上述矛盾的关键，是继续推进重点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和坚持对外开放，通过深化改革释放增长的红利，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

（一）扩大对外开放的总体要求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新一轮的改革开放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谈到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部分，提出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其

中主要涉及三层含义：一是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和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三是要创新开放模式，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益、加快走出去步伐、统筹多双边、区域和次区域开放合作，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

（二）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具体要求

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是对开放型经济的具体要求。过去，我国在开放过程中过多强调互利共赢的理念，这作为开放的基本要求从微观上看已深入人心，但从长期发展进程看，只追求微观上的互利共赢，有时会导致局部或整个开放体系的不平衡，而多元平衡的要求则体现了对整体开放格局的把握。多元平衡可以理解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平衡、财税金融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平衡、外需内需的平衡、不同地区与不同产业的平衡以及国际市场方面不同国别和地区的平衡。这种平衡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的一种平衡，是一种宏观的大平衡。在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中，这种平衡显得尤为重要，实际上是将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纳入到国民经济整体发展之中予以考虑，在国家整体经济进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阶段，努力实现外向型经济的多元平衡发展，可以使开放型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从而可以有效避免局部或部分产业的过度开放，导致国民经济产生新的结构性矛盾，最终确保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而安全高效则是这种平衡的落脚点。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引入竞争机制，通过有效的竞争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改革开放 30 多年，我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今天的开放更是为了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实现全球优化配置资源的目的，以在更高的层面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开放同我国经济的竞争力和风险防控能力是密切相关的，而安全高效则是指一切开放都应纳入可控的范围。在积极主动的开放过程中，安全高效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上述三个基本概念构成了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总体要求。

（三）处理好扩大开放与转变发展方式的关系

扩大开放同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相结合，开放应有利于优化结构，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我国对外经济发展中大量投资集中在中低端制造业，虽然已成为制造业出口大国，但仍不是强国，整体经济结构仍不够优化，中高端产业竞争力较弱。在原材料、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国际市场需求下降、竞争激烈之际，优化对外经济结构，特别是优化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已迫在眉睫。没有结构的优化就无法拓展开放的深度，难以提高开放型经济的效益，更无法提高开放型经济的水平。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关门搞战略性新兴产业或高端制造业是不现实的，必须在扩大开放、深化合作

中才能加快发展，才能逐步实现结构的优化。所以，解决好扩大开放与优化结构的关系，是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要求，要努力发挥好开放型经济在促进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在扩大开放深度的同时，要特别注意解决好经济发展活力和国民福利问题。

（四）在开放经济发展中不断实现创新

创新开放模式的要求中涉及到如下一些开放内容，如进出口、利用外资、走出去及多双边关系。从上述几项内容看，在新形势下都面临着创新发展模式的要求。从进出口贸易看，关键是如何实现进出平衡，单一的扩大出口模式现阶段已难以为继，不少国家和地区对贸易失衡都在采取抵制措施，并引发了更多的贸易摩擦和制裁。当然，进出口平衡绝不是指单一国别贸易的平衡，因为不同国家之间的资源配置和不同产品间的劳动生产率是不同的，而通过贸易的交换恰恰可以达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效果是积极的。但一个国家总体贸易的失衡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们在扩大出口的同时，更应注意积极扩大进口，通过扩大进口进一步支持国内的产业发展和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以实现进出口贸易乃至内部经济同外部经济的基本平衡。

在利用外资方面，关键是要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空间和领域的过程中，处理好综合优势和走出去的效益问题，这实际上是对扩大开放和利用外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企业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对外贸易公司发展成制造业与贸易一体化的集团公司，由进口原材料和零配件加工组装出口发展成拥有独立制造能力的出口大国。今天摆在我国公司面前的重要任务是，要学会全球配置资源，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扩大海外投资，形成我国自己的跨国公司，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客观需要，这是发展的必然。所以，在公司治理、投资风险防范方面，必须学会不断地适应国际竞争模式，不断地创新发展。走出去肯定会面临着模式的创新，一味追求走出去而忽略了走出去的潜在风险是不可取的，应该在走出去的业务方式和管理模式上不断创新，在防范风险的过程中形成我国跨国公司的发展模式，并实现海外投资效益的最大化，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拓展更大的空间，为国民财富的积累和国民福利的提高做出更大的贡献。而在上述不同对外经济发展模式中，特别要以新的理念和创新的方式、方法保持多边和双边、区域和次区域的友好合作关系，通过深化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加强同主要大国的合作，创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在防范国际经济风险的同时，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和创新发展模式来提高我国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树立国际市场良好形象，保持经济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最终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

责任编辑：刘英奎

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战略思考

李勇坚

摘要：2012 年，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再次超过制造业。本文从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现状、趋势出发，结合全球服务业 FDI 发展趋势，提出了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战略调整方向，并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现有的外资政策主要建立在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基础上，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因此，要在明确服务业利用外资的目的与意义基础上，根据服务业各个行业的特征，制订灵活、透明、动态的服务业引资政策框架。

关键词：服务业 外商直接投资 政策

作者简介：李勇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商务部发布的外商投资统计数据，2012 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出现下降，为 1117.16 亿美元，其中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538.4 亿美元，同比下降 2.6%，占我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 48.2%。自 2011 年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金额首次超过制造业以来，服务业利用外资连续两年超过制造业，成为了我国吸引外资的主力军。

从总体上看，我国关于 FDI 的学术研究与政策的重点，仍然是制造业，对服务业 FDI 的研究比较薄弱；我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也是在 FDI 以制造业为主导的背景下制订的^①。

^①例如，作为我国利用外资的基础性文件之一，《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 年修订）》中，关于服务业的篇幅只有制造业篇幅的 1/10。

我们的研究表明，服务业 FDI 与制造业 FDI 有着明显的区别。这导致我国有必要对现有以制造业为基础的服务业 FDI 战略与政策进行重构。因此，如何根据外商投资这一变化特点，对相关政策及利用外资的战略进行调整，是一个必须加以重视的问题。

本文从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现状、趋势出发，结合全球服务业 FDI 发展趋势，提出了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战略调整方向，并进一步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二、全球服务业利用外资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全球利用外资也呈现出了一些明显特征，具体表现在向发展中国家集中、向服务业集中、向重点行业集中、服务业 FDI 的政策环境日趋复杂。

（一）全球 FDI 仍将保持平稳增长，服务业在 FDI 的份额将持续上升

2012 年，受制于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不明朗^①，全球 FDI 出乎意料地下降了 18.3%，仅为 1.3 万亿美元。根据 A.T.Kearney 的调查，2012 年全球 FDI 的下降，其根本原因在于全球经济前景看淡，而非缺乏现金流，这一点与 2009 年因现金流制约而产生的 FDI 下降有着本质的区别。随着全球经济开始走出低谷，FDI 也将进入平稳增长阶段。联合国贸发会议（2013）指出，预计全球 FDI 在未来几年将保持平稳增长（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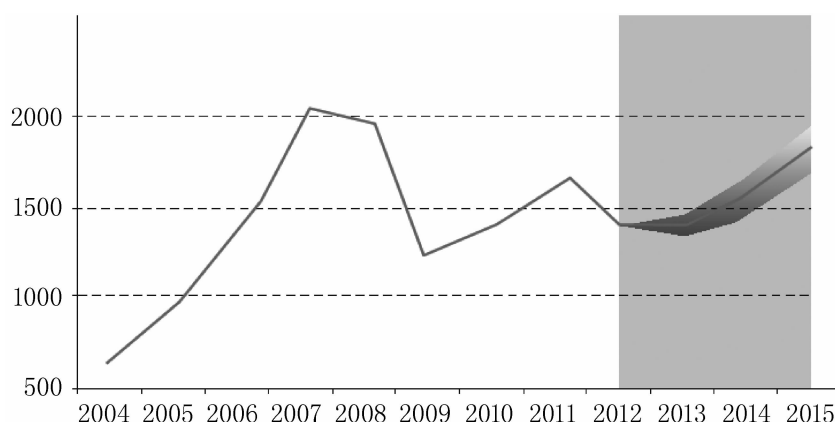


图 1 全球 FDI 的走势

资料来源：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3：Global Value Chains：Investment and Trade for Development，（finger 1）。

从全球 FDI 的部门结构看，服务业 FDI 在全部 FDI 中所占比重呈平稳增长趋势。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表的《2004 年度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趋势是转向服务业。2001-2002 年间，服务业 FDI 流量占到整体 FDI 流入总量的

^①2013 科尔尼外商投资信心指数（A.T. Kearne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Confidence Index）报告指出，全球经济前景不明朗是导致 2012 年 FDI 下降的重要原因。

2/3，服务业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中的比重由 1970 年代初期的 1/4、90 年代的不到一半发展到 2002 年的 60%。之后一段时间内，虽然在 2009 年、2010 年间，因金融危机的冲击，主要服务产业（商业服务、金融、运输、通讯和公用事业）的直接外资流量都在下降（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但是，从更长时段看，服务业 FDI 的份额一直是在稳步上升，其存量占比仍保持了上升趋势，全球服务业 FDI 存量占比持续上升，到 2011 年时，达到了 64%左右（见表 1）。服务业 FDI 流量在每年绿地投资中的份额也保持着上升势头（见图 2）。

表 1 全球内向 FDI 存量（1990、2011）（百万美元、%）

	1990			2011			
	发达经济体	发展中经济体	全球	发达经济体	发展中经济体	转型经济体	全球
一产	160692	32139	192831	921833	555837	59840	1537510
制造业	686408	167308	853716	3519872	1604786	94898	5219557
服务业	833462	179211	1012673	9192542	3854442	241106	13288090
占比							
一产	9.48	8.37	9.28	6.40	9.15	15.03	7.37
制造业	40.51	43.57	41.08	24.44	26.42	23.84	25.01
服务业	49.19	46.67	48.73	63.83	63.47	60.57	63.66

资料来源：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3: Global Value Chains: Investment and Trade for Develop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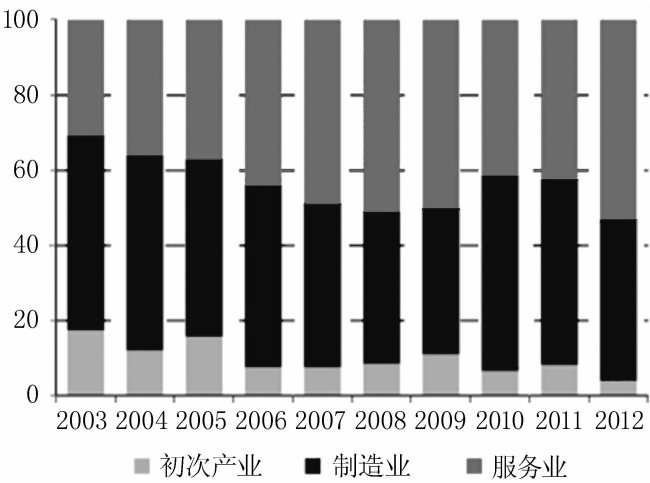


图 2 全球绿地投资项目投资额的部门分布（2003-2012）

资料来源：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3: Global Value Chains: Investment and Trade for Development, （finger I.10）。

（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 FDI 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从全球 FDI 的发展趋势看，近 20 年来，发展中国家吸收了越来越多的 FDI 流入。到

2012 年，发展中国家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 52%，首次超过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吸引 FDI 的主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发展中国家吸收的 FDI 一直稳步增长，而发达国家吸引 FDI 的总额波动非常大（见图 3）；二是随着流入发展中国家的 FDI 保持稳步增长，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将受益于这一增长过程；三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直接投资也将保持着快速增长。到 2012 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向型直接投资已占据了全球外向 FDI 的 35%。而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更是达到了 840 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三。因此，如何适应 FDI 转向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与探讨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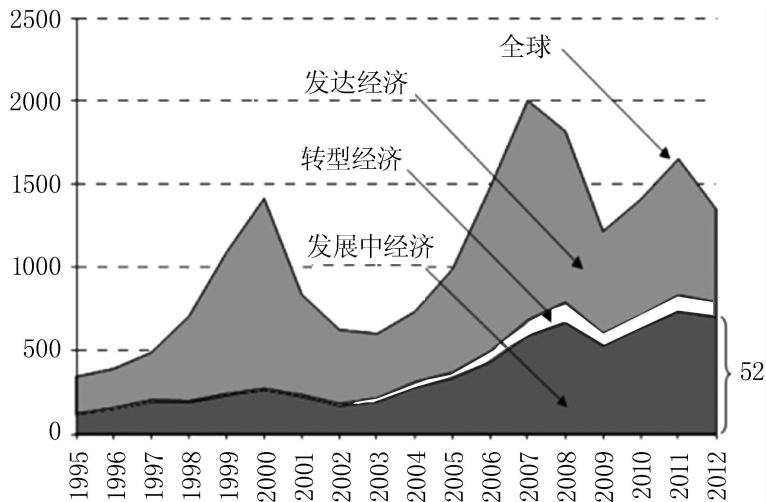


图 3 分经济体的 FDI 流入（1997-2012）

资料来源：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3：Global Value Chains：Investment and Trade for Development，（finger I.1）。

（三）全球服务业 FDI 的行业集中趋势非常明显

在过去的 20 多年，全球服务业 FDI 一直向贸易、金融、商务活动^①三大行业集中的趋势日益明显。在 1990 年，这三个行业占据了全球 FDI 的近 39%，而到 2011 年，超过了一半（见表 2）。也就是说，85%以上的服务业 FDI 集中于贸易、金融与商务活动。

服务业 FDI 集中于这些行业，也说明制造部门不再是服务部门 FDI 的基础，FDI 转向服务部门的长期趋势得到了强化。

（四）服务业 FDI 的政策环境日益复杂

与制造业 FDI 不同的是，服务业 FDI 需要一个更为稳定的投资环境。因为服务业 FDI

^①贸易（trade）包括批发零售等，金融（finance）包括房地产（real estate），商务活动（business activities）包括商务服务、总部经济等。

表 2 服务业重点行业内向 FDI 存量占全部内向 FDI 存量的比重 (%)

	1990			2011			
	发达经济体	发展中经济体	全球	发达经济体	发展中经济体	转型经济体	全球
贸易	12.83	7.13	11.77	10.36	7.96	8.59	9.63
金融	18.15	26.28	19.65	25.90	20.45	13.34	24.07
商务活动	7.88	4.60	7.27	14.10	22.01	27.72	16.66
合计	38.86	38.01	38.69	50.36	50.42	49.65	50.36

资料来源：根据 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所提供的统计数据整理计算。

涉及到大量的无形资产交易、更为灵活的资金流动、更为复杂的监管体系。但是，从现实情况看，全球服务业 FDI 的政策框架仍然是以双方投资协议（BITs）为主导。这种庞大的双方协议体系（目前签署了超过 3000 项协议）^①，使跨国投资的全球法律框架陷入了困境。全球投资报告指出（联合国贸发会议 2011），“该制度已逐渐接近这样的局面：其庞大和复杂程度令政府和投资者都难以应对，然而又不足以涵盖所有可能出现的双边投资关系（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再缔结 14100 项双边条约）。”

从另一个层面看，近年来，新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持续减少（见图 4）。这是因为进入到服务业投资领域之后，各个国家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制度差异等，导致达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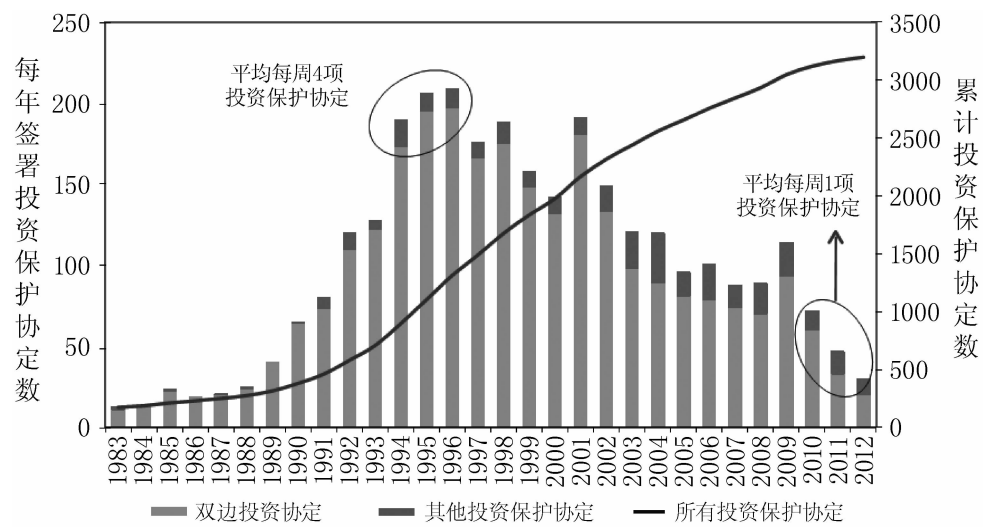


图 4 全球投资协定签署情况（1983-2012）

资料来源：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3；Global Value Chains：Investment and Trade for Development，（finger 5）。

^①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截至 2012 年末，全球共签署了 3196 项投资保护协定（IIA），其中 2857 件为双方投资协定（BITs），339 件为其他投资保护协定，包括有投资内容的综合性协定。

协议越来越困难。还有一点就是，近些年来，各国对服务业投资（尤其是金融业投资）采取了更严格的 FDI 进入审查程序，趋于保护主义的外资政策比例居高不下（见图 5），这使投资保护主义在未来一段时间还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这将导致服务业 FDI 的政策环境更趋向于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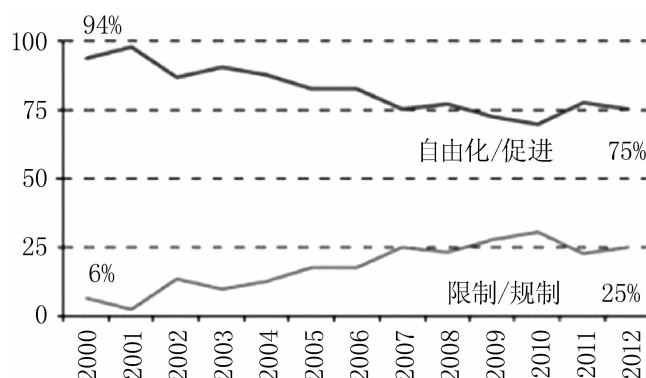


图 5 国家投资政策转向（2000-2012）

资料来源：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3：Global Value Chains：Investment and Trade for Development，（finger 4）。

三、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现状

（一）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总量增长迅速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比重不断提升（见表 3）。从 2000 年开始，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增长迅速，从 2000 年 105 亿美元增长到 2012 年的 538 亿美元，增长了 4 倍多，年均增长率超过 10%，服务业利用外资占全部利用外资额的比重从 25.7% 上升到了 48.19%。2000-2012 年间，我国利用外资绝对额增长了 710 亿美元，而服务业就占了 433 亿美元，占增量的 61%。如果从 2004 年开始计算，则服务业占了利用外资增量的 78%。从存量看，到 2011 年底，服务业外资存量占了全部外资存量的 43.4%。这些事实说明，服务业已成为了我国利用外资的主力军。

（二）服务业利用外资结构不断优化

从服务业利用外资的内部行业结构看，房地产业一直占据了服务业利用外资的大头，一直保持在 45%-55% 之间，但自 2007 年以来，其在服务业内部的占比一直持续下降。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等增长较为明显（参见表 4）。以科学研究为例，据商务部统计，仅 2012 年，外商在我国就新增研发中心接近 200 家，截至年底，外商在华投资的研究机构已达 1800 多家。其中，近 50% 的研发中心从事基础性、先导性技术研究，60% 以上的研发中心将全球市场作为其主要服务目标。麦肯锡

(McKinsey) 2012 年发布的一份关于在华医药研发的报告显示,过去五年跨国医药公司在华研发投资超过了 20 亿美元。报告指出:“在欧美研发中心关闭或者缩减规模的同时,在华研发中心几乎在以同样的速度启动或扩张。”^① 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的目 标,已不是为了适应我国消费者的需求而进行产品的适应性开发,而是利用我国丰富而又相对廉价的研发劳动力资源,打造面向全球的创新资源中心。例如,美国糖果巨头好时公司于 2013 年 5 月宣布,决定在上海设立亚洲第一家也是全球第二大研发中心;百事在上海建立了该公司在海外最大的研发中心。

表 3 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情况 (2000-2012)

年份	服务业利用外资 金额(万美元)	增长率 (%)	服务业利用外资 占比(%)	利用外资总额 (万美元)	增长率 (%)
2000	1046388		25.70	4071481	
2002	1225033		23.23	5274286	
2003	1332464	8.77	24.90	5350467	1.44
2004	1405258	5.46	23.18	6062998	13.32
2005	1491400	6.13	24.72	6032469	-0.50
2006	2060257	38.14	32.69	6302061	4.47
2007	3098277	50.38	41.44	7476789	18.64
2008	3794818	22.48	41.07	9239544	23.58
2009	3852817	1.53	42.79	9003272	-2.56
2010	4996292	29.68	47.25	10573524	17.44
2011	5825342	16.59	50.21	11601100	9.72
2012	5384000	-7.58	48.19	11171600	-3.70

数据来源:2000-2011 年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012 年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外 资统计数据。增长率与占比由作者计算。

(三) 高端服务业利用外资向发达城市集聚趋势明显

随着我国利用外资进入到“服务经济时代”,各个区域在吸引外资方面开始出现了结 构性分工趋势。具体体现在发达城市利用外资以高端服务业为主,而中西部地区仍以制 造业为主。2012 年,我国利用外资金额在总体上下降,但是,以服务业占利用外资绝对主 导的北京、上海等地区,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增长。2012 年上海市实际利用外资 151.8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5%。其中,现代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 126.79 亿美元,同比增长

^①转引自帕提·沃德米尔:《跨国公司纷纷将研发中心移至中国》,英国《金融时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7543>。

表 4 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结构变化（2000-2012）（%）

	占全部 外资存量 的比重	2011 年		2007 年		2000 年	
		占全部 外资比重	占服务业 外资比重	占全部 外资比重	占服务业 外资比重	占全部 外资比重	占服务业 外资比重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45	2.75	5.48	2.68	6.48	2.5	9.67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¹	3.91	2.33	4.63	1.99	4.79		
批发和零售业	4.71	7.26	14.46	3.58	8.64	2.1	8.20
住宿和餐饮业	1.21	0.73	1.45	1.39	3.36		
金融业 ²	2.42	1.65	3.28	0.34	0.83	0.2	0.73
房地产业 ³	15.24	23.17	46.15	22.86	55.16	11.4	44.5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7.84	7.23	14.39	5.38	12.97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3.90	2.12	4.22	1.23	2.96	0.4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64	0.74	1.48	0.36	0.88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0.36	1.62	3.23	0.97	2.33		
教育	0.03	0.00	0.01	0.04	0.10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0.08	0.07	0.13	0.02	0.04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61	0.55	1.09	0.60	1.46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2》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注：1. 计算机应用及软件服务业 2012 年占全部外商投资比重约为 2.83%；2. 金融业 2012 年比重约为 2%；3. 房地产业 2012 年比重约为 22.5%。2012 年其他行业数据，无法从公开资料上获得。

21.6%，占比上升到 83.5%。金融服务、以总部为特色的商务服务等增长最快。截至 2012 年底，上海共吸引投资性公司 265 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403 家。上海已成为我国大陆投资性公司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最集中的城市，95% 以上地区总部具有两种以上的总部功能。而北京 2012 年全市利用外资增长 14%，首次迈上 80 亿美元台阶，达 80.4 亿美元，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占 85.9%。商务服务进一步增长，截至 2012 年底，北京累计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127 家，设立投资性公司 208 家，吸引跨国公司总部企业和研发机构 663 家。

（四）进入方式增加，并购等模式波动较大

近年来，我国利用外资由原有的绿地投资为主的单一模式，向绿地投资、并购、非股权安排（NEM, NON-EQUITY MODES）等多种模式并行进行转变。然而，并购等模式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非常明显，波动较大。据清科研究中心的资料，2012 年外资并购全

年仅完成 42 起，同比下降 36.4%，占案例总数的 4.2%，交易总额为 36.58 亿美元，同比下降 46.7%，占比 7.2%。从行业看，外资并购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在服务业领域主要集中在零售行业。

四、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战略重构

（一）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战略重构的背景

1. 服务业 FDI 不同于制造业的特征，使现有的 FDI 政策并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经济状况

服务业 FDI 与制造业 FDI 有着显著区别，这使我国现有的以制造业为基础的 FDI 战略与政策已不能完全适应服务业 FDI 的发展趋势，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的服务业 FDI 战略进行重构，以更好地发挥 FDI 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第一，服务业 FDI 与制造业 FDI 的随动性。通过对产业发展趋势看，大部分生产型服务业 FDI 与制造业 FDI 具有跟随性。在一些进行全球模块化生产的行业，例如，汽车、医药等产业，与其相关的服务，如研发、销售等，也趋向于全球化。这方面的案例非常多，很多服务行业，如金融、研发、设计、营销、物流等，都会跟随着客户进行海外投资。只是这种投资在市场需求足够大时才会发生，这会使服务业 FDI 与制造业 FDI 可能存在一个时差。Kolstad 和 Villanger（2008）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服务业 FDI 的随动性问题，他们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将分工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串联起来，制造业企业为了整合资源、发挥专长、提高效率，越来越多地出现“服务外包”行为，传统上由企业内部在产前、产中或产后所进行的一些生产、经营甚至管理服务活动（如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物流销售、员工招聘、信息管理等等），均转而由生产性服务业完成。因此，制造业 FDI 与生产性服务业 FDI 呈正相关关系。

第二，服务业跨境配置成本下降，可交易性增强，使服务业 FDI 成为一种成本追求型投资行为。随着国际交通时间与通讯成本的急剧下降，全球高效交通网络与通讯系统的建立，大量以人员流动与信息沟通为特征的现代化服务业能够以极低成本在全球配置。同时，信息交换成本的下降，使服务业不再需要在本地生产与本地消费，可以在一个成本最低的地点生产，而在全球进行消费。这种服务业的“可交易性革命”，使服务业生产能够集中于一个成本最低的地点，尤其是高素质人力资本最低的地点。这导致了服务生产的全球配置，正如制造业所发生的故事一样，这将导致服务业 FDI 的大规模发生。Riedl Aleksandra（2008）研究了欧洲 8 个转型国家从 1999-2004 年的服务业 FDI 情况，其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全球配置生产的速度更快，一般而言，制造业 FDI 的调整时间约为 5 年，而服务业仅为 2 年。因为服务业的资本密集度要低，而且由于 ICT（信息沟通技术）的发展，扩展了服务的可贸易性，成本因素可能会变得更为重要。

第三，服务业 FDI 的不确定性远高于制造业。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 FDI 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服务业 FDI 大部分都与无形资产、东道国的制度、东道国的产业发展水平等有着直接联系，这导致了服务业 FDI 的不确定性。例如，房地产业的 FDI，与东道国房地产市场有着直接关系。而东道国的房地产市场，又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货币政策、政府价值取向、居民消费偏好等诸多因素有着直接联系。这种复杂性，带来了服务业 FDI 的不确定性。又如金融业，与东道国的金融管制政策、投资国的金融政策、制度完善性等多方面直接关联。而版权服务业的 FDI，与东道国的法律执行能力、版权保护制度等直接相关。

第四，服务业 FDI 对东道国产业的影响非常复杂，尤其是溢出效应的途径不同于制造业。与制造业不同的是，服务业 FDI 对东道国相关产业的影响更为复杂。

（1）服务业的很多商业模式、服务流程等，并不受专利法的保护，甚至难以通过专有技术的方式加以保护。这使服务业 FDI 对东道国的示范效用能够很快地发挥出来，这一点不同于受到专利、专有技术等保护的制造业技术溢出。例如，连锁经营这种商业模式，由外资带到我国之后，随着国内企业的模仿，成为了一种商业主流模式（李勇坚等，2012）。金融服务业的很多服务创新，也因外资的进入，给了国内企业模仿的对象，推动了服务水平的提升。

（2）服务业本身所隐含的企业声誉、流程等各种隐含知识，又阻碍了服务业 FDI 对东道国溢出作用的发挥，使服务业 FDI 对东道国的溢出作用受到限制。因此，服务业 FDI 的大规模涌入，有可能造成本土服务企业的市场低端化锁定。外资服务企业的跟随性特征，使其能够跟随制造企业的产业转移，而抢占高端市场。这些企业进入到东道国之后，还可能进一步抢占本土企业的高端市场，而使本土企业因失去高端客户而锁定在低端（胡晓鹏，2012）。以大宗商品交易所为例，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0 年底，我国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已经达到 100 多家，交易产品的种类包括农副产品、大宗原材料和石化产品等。但是，这些交易市场并未能学习到外资企业的运营精髓，不但未能有效发挥开拓市场、发现价格、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反而成为了投机的乐园，放大了商品价格波动。审计服务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李勇坚、夏杰长，2012）。

（3）服务业外资溢出效应发生的主要渠道是人力资源的流动。服务产品具有无形性和异质性的特征，客观上决定了高素质的人才往往是服务技术开发和创新的核心要素，服务业 FDI 的涌入，有利于本国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也有利于形成服务业高端人才集群。

2. 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将受到双重挤压

在全球 FDI 向发展中国家集中、服务业集中、重点行业集中、国际投资环境日趋复

杂的大背景下，对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利用外资方面虽然总量下降，但仍占据了主导地位。在 2013 年，科尔尼发布的外商投资信心指数中，信心指数位居前十名的国家中，发达国家仍占据了六席：美国（1）、加拿大（4）、澳大利亚（6）、德国（7）、英国（8）、新加坡（10）；而发展中国家只占四席：中国（2）、巴西（3）、印度（5）、墨西哥（9）；我国由于劳动力成本增加、运输费用上涨以及人民币升值，导致 FDI 信心指数下降，自 2001 年以来第一次让出第一的排名，而美国凭借其经济复苏而重居第一。在服务业领域，尤其是高端服务业领域，发达国家因其成熟的经济体制、高素质的人才、高度发达的经济水平等，在吸收 FDI 方面仍然具有较大的优势。近几年，由于金融危机，发达国家在吸引外资、留住本国资金、发展本国产业等方面做出不少努力，这些都对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带来高端挤压。

另一方面，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在经济体制、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等方面独具优势，与我国的差距并不是很大。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外资方面也表现活跃。例如，2012 年，全球 FDI 下降明显（18.3%）的情况下，部分国家如柬埔寨、缅甸、菲律宾、泰国和越南获得一定程度增长。这些国家对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带来低端挤压。

（二）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战略

1. 以市场开放引进外资的战略

从本质上看，由于服务大部分是不可贸易的，因此，服务业的 FDI 大部分以市场寻求（market-seeking）为主要目标（Riedl Aleksandra, 2008）。现有的研究表明，至少在短期内，市场规模因素对服务业 FDI 具有很大的影响。联合国贸发会议（2004）通过对服务业跨国公司投资的实证研究发现，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及其增长速度与服务业 FDI 存在正相关关系^①。国内的研究也表明，大部分服务业 FDI 是为了开辟海外新市场。例如，江小涓（2008）指出，寻找海外新市场和新客户是服务业 FDI 的主要驱动力。其中包括国内服务企业拓展国际业务、国外服务企业开拓东道国国内市场。在她的研究中，还有大量的国际案例，包括荷兰邮政（TPG）、法国苏伊士环境集团、法国威立雅环境集团、德国莱茵集团；跨国零售企业在我国的扩张，也属于市场寻求型。

从我国的情况看，中国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制造业国^②，无

^①但是，这一点也受到了很多批评，例如，联合国贸发会议（1993）的研究结果表明，市场规模并不是服务业内所有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最主要决定因素；即使市场规模是服务业内某个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它的重要性也要比对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要小。

^②根据我们的测算，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在 2011 年全面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家。

论在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生活性服务业，都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这一点，正是我国吸引服务业 FDI 的最重要的优势。因此，以市场开放引进服务业 FDI 是我国服务业 FDI 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服务业市场开放是一个有序有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对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文化安全等做出全新的定义与阐释。

2. 服务业产业链构建战略

从整体上看，服务业的对外投资具有产业链特征，这一点与制造业的模块化生产有着本质区别。虽然某一服务行业可以通过前后台分离实现服务外包，但是，不同行业之间的服务，存在较强的互补性。例如，金融业 FDI，与专业服务业（如会计、评估、信用评级、法律等相关服务业）具有明显的互补性，这些服务行业之间，构成了一个互补的服务产业链，如同制造业的产业链一样。因此，在服务业引进外资过程中，需要注意服务产业链的构建，以外资为基础，提升服务能力。同时，通过产业链构建，还能培养东道国的人力资源，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的溢出。

在缺乏产业链战略的情形下，服务业 FDI 的人力资源溢出情况很难实现，因为服务业人才局限于服务业的某一个单一的服务环节，很难为客户提供完全的服务，而导致人力资源溢出无法实现。因此，通过引进外资构建高端服务产业链是服务业利用外资战略的重要方面。

3. 以 FDI 促进技术引进战略

从生产特性看，服务业的技术引进比制造业要复杂。制造业可以通过如设备和工艺流程之类的硬技术引进，以及反向工程等模仿创新方式，而迅速获得技术水平的提升。而服务业的技术主要来源于企业内部的管理、流程、营销、品牌等多种软技术的组合，这些技术知识的转移，与人力资源的流动、企业合作等各方面的因素都有关系。通过 FDI 方式，投资方通过对子公司内部流程的改造、人力资源培训、业务示范等各个方面，带来服务业的技术提升。例如，银行业可以通过外资行的业务创新示范、风险管理模式，提升本地银行的服务能力；又如管理咨询公司，通过培训、标准化流程等多个方面，提高本地相关行业企业的业务能力。

4. 以引进促监管战略

服务业的监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大部分自然垄断领域都是服务业，这些行业引进大型跨国企业，将带来反垄断政策、有效竞争政策、市场监管政策、技术标准政策、技术管理、法律冲突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在服务业引进外资的过程中，政府应加强知识储备，积极适应国际先进的管理模式，形成协调各方利益、引导市场竞争有序的监管机制。通过与外资的监管磨合过程，完善制度与法律，使其形成一个明确的监管框架。

同时，良好的监管制度又有利于更快地引入外资。Blonigen, B. A. (2005) 指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制度对 FDI 的影响或许更为重要。发展中国家影响 FDI 流入的因素包括：不完善的财产保护；缺乏对市场良好运行所必需的制度也将增加商业运营成本；差的制度将导致差的基础设施。但主要问题是如何对这些因素进行测度。例如，对金融业而言，未来的方向是开放市场，积极引入各种外资，提升我国金融服务业的效率。前提是要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监管框架，形成一个高效有力的监管制度，避免外资引进过程中带来金融业的不稳定。同时，还需要通过必要的规制政策，为国内金融服务机构提供必要的保护。又如医疗卫生行业，应鼓励外资进入，以提高技术水平，满足对高水平医疗卫生的需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对申请程序、过程监管、技术标准、试验标准、救助措施等方面进行完善。

五、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政策建议

我国现有的外资政策，其出发点主要有三个：尽可能多地引进外资，以弥补国内投资的不足；通过引进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模式；通过引进外资，使我国更快地融入国际社会。这三个出发点，决定了我国外资政策是在以引进制造业外资为前提下架构的。而服务业 FDI 不同于制造业的特征，决定了从现在到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需要对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政策进行重新架构。

（一）明确服务业利用外资的目标及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资政策虽多有变动，但是，制订政策的假设并没有发生过变化：我国制造业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等非常落后，需要通过引进外资，带动国内制造业技术升级；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资本缺乏，需要利用外资补充国内资本不足；我国需要通过利用外资打开国际市场的大门，使我国经济更深地融入到国际社会之中。

从服务业利用外资政策看，其政策假设却与前述假设不尽相同。即我国服务业在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落后于国外先进水平，这个问题的确存在，因此需要通过引进外资，提升技术水平。但是，从资本的视角看，现阶段我国并不缺乏资本^①，因此，引进资本不是我国服务业的主要目的。因此，要摒弃我国原有的那种以引进外资数量作为考核指标或引资成绩的陈旧观念，重新梳理服务业利用外资的目的与意义：通过引进外资，产生示范效应与人力资源效应，提升我国服务业技术水平、管理水平、服务能力等。通过引进

^①2012 年，我国对外投资（FDI）达到 840 亿美元，相当于引进外资的 77%。而我国投资率、储蓄率都是全球最高水平。

外资，建立与制造业生产相互补的产业链，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水平，并使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攀。通过引进外资，提高竞争程度，通过竞争促进产业不断发展，提升服务业为我国居民提供优质服务的能力。例如，零售业通过引进外资，提升其服务水平。通过引进外资，使我国在全球服务业市场中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例如，通过引进外资，提升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能力。

（二）针对不同的行业制订不同的引资政策

服务业是以排除法定义的，这造成服务业内部行业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对服务业外资政策，需要精细化操作，尤其要重视各个服务业内部行业、不同商业模式、不同业态之间的引资政策差异化。而现有的政策框架看，在这方面仍存在着较大的缺陷。例如，文化产业是我国正在重点培育的战略性产业。但是，这个产业本身又涉及到民族文化遗产、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新闻传播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因此，对其政策需要进行精细化。一方面，要重视文化产业的外资引进，尤其是通过引资学习国外在文化产业的运营模式、市场开发模式、文化产品开发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对某些具有基础性作用的文化行业，如报纸、期刊的出版、总发行和进口业务等，应进行严格限制。这些方面，都需要制订一个有针对性的政策及监管框架。

服务业外资政策的另一个方面是，要注重前置审批与过程监管的结合。对于制造业而言，外资政策主要是根据产业指导目录进行前置审批，对服务业来说，除了前置审批之外，建立完善的过程监管体系也非常重要。以金融业为例，运营过程中的风险监管比前置审批更为重要。医疗卫生等行业，也莫不如此。

（三）以灵活、透明、动态的政策框架应对复杂的国际 FDI 环境

自 2007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在投资政策方面日益收紧，在推动投资自由化方面的努力日益减少，这导致 2012 年成为 20 多年来，签订国际投资协定（IIA）最少的一年。

从另一方面，新的投资协定都倾向于包括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条款。2012 年的 IIA 都具有可持续发展导向的条款，如职业健康与安全保护、劳动权利与环境，越来越多的投资协定符合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政策框架（Investment Policy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IPFSD））。这些议题都增加了全球投资政策协调的复杂性，并使 2012 年全球投资争议达到了创记录的水平。

与此同时，全球投资区域主义兴起。美国重返亚太并高调推动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全球至少 110 个国家卷入到 22 个区域性谈判之中，这进一步使全球服务业 FDI 的投资环境日益复杂化。

在这种背景下,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政策需要进一步深化、细化与灵活化,以建立一个灵活、透明、动态的政策框架,一方面在操作程序等方面增加透明性,另一方面需要在产业进入限制、投资鼓励等多方面引入更多的灵活性,并根据国际国内环境变化动态修改,从而实现服务业引进外资的多重目标。

参考文献:

- 1.单文静:《中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研究》,首都经贸大学硕士论文 2012 年。
- 2.李勇坚、李蕊、王漾漾:《外商在中国零售业投资的新动向及其对内资零售业经营业绩影响的实证分析》,《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 年第 6 期。
- 3.胡晓鹏:《全球化陷阱:中国现代服务业外资排斥效应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2 年第 11 期。
- 4.鲍洋:《FDI 方式产业分布与金砖国家的资本累积效应》,《改革》2011 年第 10 期。
- 5.Riedl, Aleksandra. "Contrasting the dynamic patterns of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FDI: Evidence from transition economies." Vienna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117, 2008.
- 6.Blonigen, Bruce.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FDI determinants." NBER Working Paper, No.w11299, 2005.
- 7.江小涓:《服务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理论分析》,《经济研究》2008 年第 2 期。
- 8.Fillat-Castejón, Carmen, Joseph F. Francois, and Julia Woerz. "Cross-border trade and FDI in services." WIIW, Working Paper, 50, 2009.
- 9.联合国贸发会议:《2004 年世界投资报告:转向服务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年版。
- 10.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 年世界投资报告:非股权安排》,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 年版。
- 11.Kolstad, Ivar, and Espen Villanger.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ervic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8, 24 (2): 518-533.
- 12.SAUVANT, Karl P. "The transnationalization of service industries." United Nations, NY, 1993.
- 13.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3: Global Value Chains: Investment and Trade for Development, www.unctad.org/wir.
- 14.李勇坚、夏杰长:《我国利用外资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中国日报》(英文) 2012 年 1 月 6 日。

责任编辑:晨 乔

借鉴国际经验 完善我国企业 “走出去”政策

陈金明 汪 平

摘要：本文在介绍、剖析国外企业国际化发展历程和美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在新形势下，在推动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过程中，除了企业自身的努力之外，国家全方位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尤为重要。为此，借鉴国外企业国际化经验，对完善我国企业“走出去”国家战略的政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企业国际化 走出去 政策体系

作者简介：陈金明，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汪 平，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助理研究员、管理学硕士。

一、国外企业国际化的发展历程

从 19 世纪初到 21 世纪，企业国际化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1890 年前，欧洲跨国公司初期阶段

第一批现代跨国公司出现在欧洲。第一家跨国公司始于 1815 年，比利时的撒高克里乐钢铁公司在普鲁士建立了子公司。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由于运费和高额关税的原因，产品难以出口，更多的欧洲企业开始尝试在国外投资设厂，如德国贝叶公司成立于

1863 年，瑞士雀巢公司成立于 1867 年，英国利华公司成立于 1890 年。此外，欧洲人还在拥有石油和矿产原料的国家投资开矿。两次世界大战使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浪潮受到抑制。

（二）1945–1970 年，美国跨国公司大发展阶段

第二次跨国投资热潮从 1945 年持续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由美国公司主导。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经济遭受重创，美国企业获得迅速发展，不但占领本国市场，还大量进入欧洲市场。二战之后，欧洲企业重新获得发展机遇，并逐渐占领了欧洲市场。美国的出口产品，由于关税和运费加大了成本，无法与欧洲当地产品竞争，美国企业被迫开始对欧洲进行投资，建厂就地生产。同时，跨国公司也开始进入拉美和发展中国家，主要利用当地低廉的劳动力，生产商品就地销售。

（三）1970–2000 年，日本和欧洲跨国公司实力上升阶段

第三次跨国投资热潮以欧洲和日本企业的国际化为主要特征，腾飞起步于 1970 年代初，截至于 20 世纪末。二战之后的重建使得欧洲和日本跨国公司获得迅速发展壮大的机会，但母国狭小的疆界限制了它们的发展空间。到 1980 年代，日本和欧洲跨国公司的实力大大上升，甚至已与美国企业并驾齐驱。

（四）2000 年至今，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实力进一步增强，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进程加速阶段

第四次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始于 21 世纪初。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企业国际化进入新的发展周期，发展速度大大加快，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目前，跨国公司的经济总量和出口额分别占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 10% 和全世界出口额的 1/3。此外，跨国公司投入的研发费用占全球民用研究与开发费的 75%–80%，控制着 80% 以上的专利权，60% 以上的国际技术贸易，80% 的国际技术转让。最大的跨国公司的经济规模相当于中等国家的实力，早在 1999 年，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产值（1806 亿美元）超过波兰的国民生产总值 GNP（1608 亿美元），德国奔驰汽车公司的产值（1501 亿美元）相当于印尼的 GNP（1537 亿美元）。总之，随着国际化大生产的发展，跨国公司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和支配能力越来越强。同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跨国公司的数量，过去 15 年的增速已经超过了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

近年来，企业国际化的表现是全球化，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创新的全球化趋势加快。在此条件下，一个国家如果不能自主创新，就无法最大限度地整合全球创新资源，在全

全球化中只能充当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世界工厂”^①。

二、美国企业国际化经营发展情况与政策

（一）美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情况

1. 美国大企业国际化情况

美国跨国公司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美国跨国公司初创期。美国内战结束之后，美国工业企业通过垂直的、水平的合并和兼并，迅速发展成为现代工商企业。为获取原料和寻找市场，开始拓展国际业务，首先在海外建立原料供应基地和销售公司，进而投资建厂，就地生产。二是二战期间，对外投资获得迅猛发展。三是二战之后，美国跨国公司逐渐在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等方面建立了绝对优势。

美国跨国公司的主要特点：

第一，规模大、实力雄厚。二战后，美国跨国公司飞速发展，其规模和实力是其他国家跨国公司无法匹敌。尽管后来西欧和日本的一些跨国公司形成了与美国跨国公司相抗衡的力量，但就总体来看，美国仍不失其跨国公司的霸主地位，在一些重要的工业领域，美国跨国公司依然称雄于世。

第二，技术先进。美国跨国公司始终把技术领先作为其发展海外经营的基础。巨大的研究与开发的资金投入，丰厚的人才资源优势，以及规模经济效益，使美国跨国公司取得了大量的科技成果，完成了数目可观的发明创造，长时间处于技术领先地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在这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第三，与金融系统相融共生。美国跨国公司的发展过程始终伴随着金融系统的大力支持。银行从发行股票、债券、提供信贷、调拨资金，直到充当业务顾问、供给情报、参与投资规则等各方面为跨国公司提供“全面服务”。美国一些著名跨国公司都与银行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随着跨国公司的不断发展，一些大的跨国公司还组建了自己的内部银行，更加迅速而有效地解决了海外经营的资金运行问题。

2. 美国银行业国际化情况

美国银行海外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887-1914年，起步阶段。美国银行的海外分行从1887年的1家增加到1913年的6家。第二阶段，1915-1950年，起飞阶段。两次世界大战给了美国银行巨大的机会，海外分行数量从1913年的6家增加到1950年的95家，主要沿着西欧、中东、南美洲和中美洲的商业中心扩张，具有典型的贸

^①2010年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欧洲中小企业国际化》报告显示，欧洲中小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越高，其创新能力就越强，发展速度也就越快。

易引导特征。第三阶段，1950-1980 年，加速发展阶段。到 1984 年美国有 163 家银行设立海外分行 905 家，国际化银行数量从 1960 年的 8 家发展到 1980 年的 139 家。海外分行总资产占有所有银行总资产的比重从 1960 年代末的 4.3%，提高到 1984 年的 20%。这一期间，美国银行还积极参与组建银团银行。1975 年全球 88 家银团中美国就参加了 32 家，占 40%。这一阶段美国的国际化银行正如美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一样，独占鳌头。第四阶段，1980-2012 年，调整巩固阶段。美国银行的海外扩张进一步加剧。这一阶段的海外发展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海外机构数量通过并购大幅下降，但是资产规模大幅提高，海外资产的集中化趋势明显，主要沿着太平洋地区开展业务，特别是日本、我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

3. 美国小企业国际化情况

美国小企业指的是雇员只有 500 人以下的企业。美国是由千百万个小企业构成的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美国小企业发展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80 年代末得以快速发展，每年新增 100 万家。到目前，全美国共有小企业 2140 多万家，占了全美国企业总数的 99%，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 60%，新增加的就业机会有 67%是由小企业创造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0%。美国小企业经济非常强大，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是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源泉，是促进充分就业、保持美国社会稳定的根本基础。更重要的是，小企业有很强的创新能力，美国有一半以上的创新发明是在小企业实现的。并且小企业对科技进步也有很大的贡献，美国的高技术公司在起步阶段通常都是小企业。

近年来，迅速成长的美国小型或新成立的公司正在重塑美国经济的未来，它们在亚洲、加拿大、拉丁美洲、欧洲和非洲获取了数千亿美元的销售收入。如果美元疲软继续拉动美国出口，加之美联储降低利率，美国小型企业的出口额还将进一步攀升。美国硅谷研究机构 Intuit 最近发布报告称，到 2018 年，一半的美国小型企业将进入全球市场。一些咨询人士、经济学教授和政府官员认为，从美元疲软到全球市场开发程度逐步提高，美国小型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步伐将会越来越快。全球贸易关税大幅下降，市场准入规则大为简化，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大为提高，这些都为美国小型企业打开了国际市场大门。很多移民型小型企业主利用与其母国的文化纽带、互联网和精明的市场战略进入国际市场。据美国风险投资协会（NVCA）和汤姆森金融（Thomson Financial）的调查数据显示，过去 10 年中，增长迅速的美国风投公司向美国、中国、印度及其他国家的企业投入的资金总额达 830 亿美元。

（二）美国政府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政策

1. 美国政府在跨国公司国际化中所起的作用

第一，为跨国公司提供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的保护。1969 年，美国政府专门成立了

一个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为美国私人对外投资承担特种风险和综合风险保险业务。保险范围包括因战争、革命或暴力造成的破坏；因国有化、征用或没收造成的损失；以及因当地货币兑换困难而影响资金周转、利润汇回等风险。

第二，税收鼓励和政府保证。美国税法规定，跨国公司的国外利润，只有汇回国内后才课税，这就直接鼓励了跨国公司利润在国外进行再投资；为减轻跨国公司税赋负担，美国政府还同许多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课税的规定；为便于美国公司在国外取得发明专利，美国同一些国家签订了专利合作协议等。

第三，向跨国公司提供出口信贷。在这方面，美国进出口银行占有重要地位。根据1945年修订的进出口银行法案，其贷款权限和资金额加大了，除了以中长期信用方式发放国外开发项目贷款，出口贷款等业务外，还管理着美国公司需要的外币贷款。其发放贷款，是以服从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为准则的。

第四，以政府援助为契机，带动本国企业向海外扩张。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马歇尔计划”，以援助由于战争破坏亟待复兴的西欧国家。同时，美国要求受援各国购买美国货，取消或放宽对美国投资和商品输出的限制，为美国资本大开绿灯。

第五，利用包括外交手段在内的一切办法，为跨国公司提供帮助。如利用驻外使领馆为跨国公司提供商业情报，利用外交手段保护跨国公司的利益等。美国1984年通过的贸易和关税法还规定，在外国政府的行动对美国公司有歧视性行动的情况下，可采取相应的措施。

2. 美国政府在促进银行国际化经营方面的主要做法

第一，总体来说，美国政府“限内促外”策略对于银行国际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美国政府通过限制跨州经营，鼓励跨境发展，给予银行压力，鼓励它们去海外锻炼提高，美国的文化、自由和竞争意识，促使银行去开拓国际市场，拓展生存空间，占领海外业务高地。

美国跨国公司都以高水平的金融服务为先导和支撑。美国对外投资一般以商业银行为先导，建立了支持企业跨国经营的完整体系。

第二，就具体政策来说，二战前，美国政府“门户开放”政策是银行国际化经营的重要诱因。美国银行追随着美国殖民国旗，向世界各地进行殖民扩张。二战后，美国政府加强对银行海外发展的管理，利用自己实力，取代英国获得了国际金融的控制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为美国银行国际化创造了十分有利的空间。1953年，美国通过《联邦储备法》，允许部分美国银行经联邦储备局批准，可以在国外设立分行并从事跨国银行业务，美国银行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张过程。为了加强银行的国际地位，1970年美国修改了《银行持股公司法》，规定美国银行持股公司可以从事国际活动，1978年美国又

通过了《国际银行法》。从美国政府意图、政策、法规以及这些银行立法，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力图使银行向国际扩张的明确意志。美国银行国际化的成功，与其说是银行自身的努力，还不如说是美国政府的政策规则制订的结果。

第三，美国政治、军事及经济金融政策的日常调整对银行国际化有重要影响。危机带来明显的洗牌效应，一些国家的银行在大危机后大幅度收缩，另外一些国家的银行则乘机扩张。银行国际化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共性就是，银行国际化进程都是受到战争、经济或金融危机的影响而逐渐画上终止符，但是每次浪潮的开端，又基本上从危机或战争的恢复开始。美国政治、军事及经济金融政策的日常调整对世界政治、经济金融宏观环境的影响，是决定银行国际化经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3. 美国政府促进小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主要做法

第一，通过国内立法。从通过反垄断间接保护到直接提供多方面的保护和扶持，优化小企业的外部环境，维护和增强小企业的竞争性地位。早在 1890 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谢尔曼法》，旨在反对垄断，保障公平竞争。随后，相继通过的《克莱顿法》、《米勒-泰丁法》、《塞勒-凯福尔法》等法案，不断完善反托拉斯法。1953 年，美国《小企业法》正式出台，成为保护小企业的基本法。随后，又相继颁布了《机会均等法》、《小企业投资法》、《小企业经济政策法》等法律，旨在更直接和主动地支持小企业发展。

第二，专门设立小企业管理机构。美国设立联邦小企业管理局（SBA），专门负责实施小企业政策，履行对小企业的管理职能。该机构 1953 年成立，1958 年被国会确定为“永久性联邦机构”。

第三，建立小企业出口促进体系。出口促进体系由美国商务部倡导，以美国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TPCC）为组织核心。按照功能划分，TPCC 下设的各功能性机构可分为两类。（1）信息咨询服务网络，主要由以下机构组成：①出口援助中心。该中心的主要功能是为小企业出口商提供目标市场研究、市场需求预测、市场统计资料、贸易保险等方面的多种信息服务。②贸易信息中心。该中心的主要功能是向出口商提供有关政府贸易促进措施计划及获取金融、保险等方面的服务，以引导小企业出口。③商务部全球商业服务网络。该网络覆盖了全美甚至世界大多数区域，向已从事和准备从事商业出口的小企业提供特定区域的市场分析，寻求潜在的贸易伙伴。④具体产业部门的信息服务机构。例如，美国农业部设立了“国外市场农业服务组织”，实施多种措施支持农、林业产品出口，帮助出口商开拓国外市场。（2）融资服务系统，主要由以下服务组成：①小企业管理局的贷款担保。小企业管理局作为小企业的借贷担保人，提供多种形式的借贷担保，担保率最高可达到 90%。美国政府还制定和实施了国际贸易信贷计划（ITL）和出口周转资金贷款计划（EWCP）。根据 ITL，小企业管理局可以为小企业提供 125 万美元的

信贷担保，最长贷款期限可达到 25 年。②美国进出口银行（EX-IMBANK）的服务。主要为美国产品和服务在海外销售提供贷款支持，包括流动资金担保、出口信用保险、商业贷款保险和直接贷款等。该银行制定了小企业特别计划，为出口型小企业提供特别服务，如小企业保险计划、贷款、担保、利息资本化等。③美国私人海外投资公司（OPIC）的服务。该机构主要作用是提供一般商业上无法得到的金融服务，来帮助美国私人企业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投资。该机构对多种新项目、私有化项目及扩建和改造项目提供融资和担保。

第四，鼓励小企业技术创新。美国政府通过增加政府投入等多种方式，鼓励和扶持小企业的科研开发和技术创新，增强国际竞争优势。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制定了有针对性的科技计划，如“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和“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STTR），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事实上，正是借助于美国政府对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强力扶持，小企业迅速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企业。

近年来，美国大力支持企业跨国创新，强化国际科技声音。美国通过在国际组织中占据主要职位、大量派驻工作人员等手段主导国际组织，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美国开展了一系列科技援外行动，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研究支持，把争夺全球创新领先地位作为国家目标。美国总统奥巴马强调要保持美国的世界创新中心地位，《美国创新战略》提出：提升美国创新的基础能力，培养符合 21 世纪知识和技能需要的下一代人才；提升美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在国家优先领域催生重大突破，发动清洁能源革命，加快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先进制造的发展，提高空间能力和开发突破性应用技术。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要对研发税收永久抵免立法，并且加大对创新的政府采购，为新技术提供引导市场，激发创新，以市场带动创新。美国政府通过政府采购，在计算机、半导体、集成电路、航空航天和生物制药等领域，扶持和发展了一批重大战略性技术，并推动了这些公司跨国发展。

三、新形势下推动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具体政策建议

支持“走出去”战略的政策体系，国家制订了许多政策措施。近几年，国务院先后批准下发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商务部（原外经贸部）会同有关部门据此制定了 16 项财税、外汇、信贷配套政策，形成了我国较为完整的对外投资鼓励政策体系。同时，我国还建立了国内由有关行业组织、驻外使领馆经商机构、境外中资企业商会、国内投资主体等共同参与的形式多样的协调机制，加强行业自律，规范经营行为。自 2003 年以来，在经济全球化与国际格局变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开始从国家经济安全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新高度，认识和规划国际化经营战略。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一套促进企业国际化的政策、服务、监管体系和协调机制。但是，这一体系和机制还需要继续完善。

（一）要进一步深化宏观管理部门改革，转变政府职能

第一，精简审批内容，减少审批程序。建议政府改革管理体制，规范行政审批。取消没有后期监管手段、不承担审批责任的前置审批，大幅简化审批程序，合理确定申报材料，避免重复。国家主要通过利率、贷款规模、税率、出口退税等经济杠杆引导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而不是直接干预企业的国际化经营。

第二，改革外贸管理体制。应进一步扩大以企业为基础的经贸组织，创立各种对外经贸公司或代理公司，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可以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同时，也要创办更多工贸结合、技贸结合的公司。为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顺利开展对外贸易与技术交流，要在业务上、征税上按国际惯例与通行做法与别国或缔约国进行合作。

第三，改革外汇管理体制。适度放宽对境外投资用汇的限制，取消管制，放宽外汇审批，简化手续，允许企业开立用于境外投资的资本项目外汇账户，提高用汇和汇出的便利化程度，积极发展外汇市场。

第四，改革税收管理体制。对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实行统一税制；完善出口退税管理；改革关税，主要包括降低关税总水平，力争使名义关税与实际关税基本相符，减少各种不规范的减免税，使关税的减免受到 WTO 规则的制约。

（二）深化境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完善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法律法规体系

第一，要突出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赋予一定条件的优势企业更多的投资自主权，对鼓励类境外投资实行登记备案制，逐步实现对外投资管理由事前审批为主，向加强事后监管转变。各级政府应各司其职，积极为企业对外投资创造良好条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需要，制订境外投资规划，抓紧制定出台境外投资产业政策。

第二，要尽快建立我国境外投资的法规体系，规范管理体制。我国对境外投资的管理一直以国务院各部门颁布的规定为依据，至今还没有统一的境外投资法，而原有的规定大都是以国有企业为目标约束对象，对其他所有制企业没有明确规定，而大量民营企业纷纷绕过国家外汇管制完成资金输出。因此，国家立法机构应针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的趋势，制订境外投资的相关法规，统一和规范对各类性质企业境外投资的管理办法，规范和支持其国际化进程。同时，建议加快建立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法律法规体系，抓紧研究制定出台境外投资、海外投资保险、海外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并制订相应的配套规章制度。

第三，要清理各种与 WTO 规则相违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在市场规则的制定时，对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市场分布、行业结构和经营规模进行统筹考虑，加强宏观协调，避免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盲目竞争。对有条件、有优势、效益显著的国际化企业，要给予法律方面的优先扶持。

（三）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对企业境外投资的监管和安全保障

（1）要对企业国际化运行情况进行有效监控，设立宏观监控分析数据指标体系。（2）要推动建立国内有关行业组织、我驻外使领馆经商机构、境外中资企业商会、国内投资主体等共同参与的形式多样的协调机制，加强行业自律，规范经营行为，且防范恶性竞争，维护我国利益。（3）建立跨国经营安全风险预警系统和应急处置机制，防范系统性风险。加强对重点国家和地区情报信息的收集、评估和发布工作，指导企业有效规避投资风险。（4）提供国际化经营的信息服务。建立以政府服务为基础、中介机构和企业充分参与的信息网络。建立国家“走出去”项目信息库及业务管理信息系统，及时通过网站发布政策、国别调研、项目情况等信息，为企业、政府管理部门和社会公众提供服务。（5）外交工作要为企业对外投资的实施提供服务和保障，把为企业跨国经营服务作为经济外交工作的重点之一。政府应积极与有关国家签订经济合作、投资保护、海关互助合作、避免双重征税、司法协助、领事条约、便利双方人员往来、社会保险、检验检疫等政府间双边协定，扩大和利用双边、多边、区域国际合作机制。

（四）加快完善保险、财税、金融等支持政策措施

第一，深化政策性出口信用体系改革，建立健全涉外投资信贷和保险政策体系，加大支持力度，规范政策性业务，为防范企业国际化遇到的国家风险提供较充分的保障。充分利用区域性金融平台，积极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搭建以财政资金为导向、政策性金融为杠杆、商业性金融为主渠道、资本市场为必要补充的金融支持平台。

第二，设立企业国际化发展基金。现有的财政金融政策主要有：中央外贸发展基金、援外优惠贷款、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对外承包工程保函风险专项资金等，对企业开展各种形式的国际业务起到了良好的支持作用。但因资金有限，企业还不解渴。建议设立“走出去”发展基金，对项目给予优惠贷款或贴息资助。

第三，设立海外投资风险基金。目前，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已经开始对境外投资进行风险承保业务，但由于没有专项资金的支持，该项业务所起到的作用仍十分有限。因此，建议建立“海外投资风险基金”，对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但风险高的海外投资给予适当的资助或保险支持，降低企业风险。

第四，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在避免双重纳税的前提下，区别投资国家、地区 and 行业，分别采取税收抵免、税收饶让、延期纳税、减税、免税和出口返税等不同的政策。对关系我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性项目、重要的区域性合作项目，要给予特殊的政策优惠。

（五）大力发展跨国大型企业集团

美国企业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占领国际市场并在国际竞争中保持强大实力，关键在于

将跨国企业集团的发展作为竞争国际市场的主力军。我国企业集团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特有的优势。今后应从高起点、有重点、分层次、外向型方面，发展大企业集团，使其快速走向国际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兼并，并尝试本地化组建企业集团。对于一些重要的市场，市场份额远比短期利润更为重要^①。

（六）推动建立以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主导的对外投融资配套服务体系

我国对银行走出去采取的政策，更多的是限制而不是鼓励，对银行国际化缺乏足够的支持。对国内市场的过度保护和对国际市场开拓的支持不足，不利于我国银行崛起。我国亟需推动以金融机构为主导的对外投资配套体系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国内金融机构设立和发展境外机构，为企业跨国经营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同时，金融机构还能为企业国际化经营提供客户信息、咨询、管理乃至股权投资等方面的配套服务。

要及早建立以进出口银行为主，对企业国际化经营提供支持的专项金融服务体系，确保企业国际化所必须的信贷规模和优惠利率，加强对出口贷款运行的监控，并配合多元化市场战略，鼓励发展出口生产基地。

（七）构建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服务体系

必须把推动中小企业国际化作为支持重点，加快建立促进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平台。

第一，政府机构要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给予强力支持。此外，应当采取鼓励的态度和政策，使现有社会资源中的更多组织和机构以其专长、信誉和高质量的服务，参与到中小企业国际化的服务体系中。可以考虑将现有的多个涉及中小企业管理的职能部门进行撤并，设立专门统一的、具有综合协调能力的中小企业管理机构，彻底改变对中小企业多头管理的状况，强化中小企业管理机构职能。

第二，要立法固定各项发展促进措施，并配之以相应政策。我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的颁布只是开端，而围绕着促进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各方面的法律和政策，都应尽快到位。要进一步完善各种有关中小企业的法规制度，以明确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发展方向和管理原则。根据当前的立法情况，在已经出台法规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适用于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中小企业促进法、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法等法律。

第三，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一是要建立中小企业优惠融资体系。从我国的具体情况

^①我国的海尔，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通过本地化成功进入了美国市场。这一成功经验告诉我们，立足依赖当地资源，开发与本地需求紧密结合的产品，是防止竞争对手抢占市场份额、保证公司长期利益的有效途径。对我国跨国公司来说，本地化还有利于淡化企业的母国背景，尤其是意识形态差异，进而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取当地政府、非政府组织、媒体以及公众的支持。

出发，政府运用少量的财政资源为政策杠杆，通过商业银行或政策性银行，向中小企业直接提供优惠贷款，是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有效手段。二是建立、完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制度。中央和省（市、区）财政预算都要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三是要积极探索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风险资金投入和退出机制，发挥政府对风险投资的导向作用。

第四，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强化产业导向，积极培育新产业领先型中小企业，突出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扶持。通过相关政策，鼓励中小企业向技术密集型、信息技术型、绿色环保型、资源深加工型方向发展。技术竞争是当今国际竞争的关键，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尽管具备了一定的研发能力，但总体而言，其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还不高，需要政府制定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和措施，提高中小企业的科技研发水平，不断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增强出口竞争力。

（八）构建自主创新政策的国际化理念

第一，兼容性。自主创新政策既是本土政策，也具有国际效应，包容内外资，衔接国内外，对国际规则具有兼容性。在全球化条件下，外资就在本土，本土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因此，自主创新政策不再是单纯的国别政策，同时具有国际意义。每一项自主创新政策都要考虑与国际规则的匹配问题。

第二，公共性。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应该逐渐增加普惠性、社会性的政策。发达国家的创新政策，重视公共领域和市场失灵领域，注意防止损害公平的竞争和垄断。针对小企业设计的支持政策往往不受国际规则的约束，能够有效带动本土企业创新。

第三，市场化。政策导向要符合市场规律和有利于启动市场。一是推动供给的政策，应最大程度地采取税收优惠等间接手段，少数直接资助的项目，也应以企业用户需求为导向，政府配套支持，而不能政府直接去做。二是政策的对象范围应从供给侧扩大到需求侧，通过鼓励私人消费培育市场，带动创新。

第四，法律化。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已经不是个别的局部的问题，而是全局性综合性问题，创新政策也成为高外部性的综合性政策。发达国家把创新政策作为综合政策，通过立法出台。既简明扼要，又可操作、可检查、可追究，能够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我国在很大程度上把创新政策当成专门政策，一般由部门制定、发布。部门间相互独立，缺乏统筹，创新政策与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往往不能协同。按照国际化的理念，要把创新政策作为综合政策加以法律化。

责任编辑：晨 乔

美日发行市政债券为城市化建设融资的经验及启示

陈峥嵘

摘要：本文全面、深入地考察分析了美日发行市政债券为城市化建设融资的实践经验。国际经验表明，市政债券已成为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建设的重要融资工具，在满足城市化建设融资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历史上看，一国的市政债券发行规模与本国的城市化进程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即本国的城市化进程越快，市政债券发行规模越大，反之相反；同时，市政债券的快速发展也有力地推动了本国的城市化进程，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呈现有序互动的良性发展格局。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基本国情，本文就我国推出市政债券、为新型城镇化建设融资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市政债券 城市化建设 融资工具 实践经验 政策建议

作者简介：陈峥嵘，申银万国证券战略规划总部高级经理。

国际经验表明，市政债券已成为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建设的重要融资工具，在满足城市化建设融资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历史上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市政债券的大量发行均与本国的城市化进程紧密相连。发达国家中，市政债券发行量最大的是美国和日本，其次是加拿大和德国。本文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就我国推出市政债券、为新型城镇化建设融资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美国发行市政债券为城市化建设融资的实践经验

美国是市政债券的起源国，也是目前市政债券发行规模最大和最发达的国家。从1812年开始，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就以发行债券的方式为地方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筹集资金。市政债券的诞生是源于19世纪20年代美国纽约州开凿伊利运河需要筹集资金。随着社会公共服务部门和公共项目所需资金日益增加，一般的企业债券、股票和银行贷款等已难以有效满足这一融资需求。市政债券是伴随着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从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是美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城市化建设的大部分资金需要地方政府自筹，在此背景下，市政债券得到蓬勃发展，其发行规模均超过国债，并成为美国州及州以下地方政府筹集公共资金的重要工具。美国市政债券所筹资金主要用于公益性事业，包括公路、桥梁、机场、港口、水坝、隧道、供水设施、供电设施、供气设施、污水处理设施、环境保护设施以及学校、医院、住房建设和经济开发等，很好地满足了公共项目与社会公共服务部门大规模、长期性、低成本的资金需求^①。从表1可以看出，1996-2011年期间，美国城镇化率持续上升，呈现逐年小幅递增的态势，从1996年的77.62%上升至2011年的82.38%，累计上升4.76个百分点，年均上升0.32个百分点；同期除了1999年、2000年和2011年等个别年份外，市政债券发行额基本呈现震荡向上的走势，从1996年的1852亿美元增加至2010年的4331亿美元，累计增长133.86%。该期间美国市政债券发行额与城镇化率的相关系数为0.7950，说明美国市政债券发行规模与本国的城市化进程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即美国的城市化进程越快，市政债券发行规模就越大，反之相反；同时，市政债券的迅速发展也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的城市化进程，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呈现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在美国，公用事业的最主要融资工具是市政债券（其中地方政府市政债券发行量大约为州政府市政债券发行量的1.6倍），占比为90%-95%，联邦政府投资占比仅为5%-10%；水务公用事业领域每年的投资需求约为2300亿美元，其中85%来自市政债券融资，政府财政投资仅占15%。可见，市政债券发行对于推动美国的城市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特别是西部开发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美国市政债券发行总体情况

自1980年以来，美国市政债券发行量持续增长，但1994年较1993年大幅下降44.05%，主要是由于石油危机引起了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政府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造成市政债券发行的利息成本上升，利率风险增大；此后市政债券发行量逐步回升，并

^①袁迪：《美国市政债券发展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金融时报》2012年4月9日。

表 1 1996-2011 年期间美国市政债券发行规模与城镇化率的关系

年份	城镇化率(%)	市政债券发行额(亿美元)
1996	77.62	1852
1997	77.99	2207
1998	78.35	2868
1999	78.72	2275
2000	79.09	2008
2001	79.42	2877
2002	79.75	3575
2003	80.07	3827
2004	80.40	3598
2005	80.73	4082
2006	81.01	3865
2007	81.30	4293
2008	81.58	3906
2009	81.86	4096
2010	82.14	4331
2011	82.38	2947
相关系数	0.7950	

数据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不断增长。根据《美国统计摘要（1999）》的数据显示，1998年美国市政债券发行量为3208亿美元，占美国各类债券发行总量的3.1%，与GDP的比率为3.77%；其中长期市政债券发行量为2797亿美元，占市政债券发行量的87.19%，与GDP的比率为3.29%。1998年底，流通中的市政债券总量为1.5万亿美元，占流通中各类债券总量的11.5%。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政府机构已经控制住了税收规模，政府活动在很大程度上由税收支持转向由政府服务机构的使用者支持，使得收益债券发行量占比上升并超过了一般责任债券发行量占比。根据《美国统计摘要（1999）》的数据计算，1980-1998年期间，美国收益债券年发行规模与一般责任债券年发行规模比值的平均数为2.23倍，中位数为2.02倍，最大值为1985年的4.11倍。从表2可以看出，2003-2012年期间，美国一般责任债券发行规模占比在28.21%-37.82%区间变动，收益债券发行规模占比在61.18%-70.71%区间变动，收益债券年发行规模与一般责任债券年发行规模比值的平均数为1.94倍，中位数为1.79倍，最大值为2008年的2.51倍。由此可以初步估计，美国收益债券年发行规模大约为一般责任债券年发行规模的1.8-2.2倍。

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引起次贷危机爆

表 2 2003-2012 年期间美国两类市政债券发行规模及占比

年份	市政债券发行规模 (亿美元)	一般责任债券发行规模占比 (%)	收益债券发行规模占比 (%)
2003	3827	36.74	62.24
2004	3598	35.88	63.31
2005	4082	35.28	64.28
2006	3865	29.65	69.21
2007	4293	30.33	68.55
2008	3906	28.21	70.71
2009	4096	37.82	61.50
2010	4331	33.92	65.44
2011	2947	35.60	61.18
2012	3789	35.71	61.81

注：一般责任债券与收益债券发行规模占比合计之所以不等于 100%，是因为美国市政债券除这两类基本种类外，还包括少量的衍生市政债券。

数据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发，导致市政债券发行量减少，市场溢价成倍上升，但是之后随着此轮金融危机的进展，市政债券由于其低风险，反而受到投资者的追捧和青睐，使市场需求上升，导致市政债券发行量回升并持续增加，市场溢价大幅回落。这表明此轮金融危机没有改变市政债券发行量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增长态势，其相对安全性得到充分的体现。从市政债券发行量与 GDP 的比率来看，金融危机期间该比率与上世纪 90 年代相比变化较小。

（二）美国市政债券的其他分类

美国市政债券除了按发行主体可以分为一般责任债券和收益债券两类以外，还可以按其他标准进行分类。

1. 按发行方式来划分，美国市政债券可以分为公开发行为和私募发行两种方式，其中公开发行又可细分为竞拍（也称竞标）发行和议价发行两种方式。一般来说，一般责任债券采用竞拍发行方式，收益债券采用议价发行方式。1996-2012 年期间，发行量最大的始终是议价发行方式，其次是竞拍发行方式，这是由于美国收益债券年发行规模远大于一般责任债券年发行规模。从表 3 可以看出，1996-2012 年期间，美国市政债券中议价发行量占比在 72.62%-85.25%区间变动，平均值为 78.56%，中位数为 79.16%；竞拍发行量占比在 13.67%-25.38%区间变动，平均值为 19.78%，中位数为 19.81%；私募发行量占比在 0.44%-3.56%区间变动，平均值为 1.66%，中位数为 1.14%。2012 年美国市政债券中议价发行量占比、竞拍发行量占比、私募发行量占比分别为 77.96%、19.56%和 2.45%。

表 3 1996-2012 年期间美国市政债券按发行方式分类占比

年份	竞拍发行(%)	议价发行(%)	私募发行(%)
1996	25.38	72.62	2.00
1997	21.66	75.35	2.99
1998	22.77	75.10	2.13
1999	23.21	73.23	3.56
2000	24.20	72.71	3.09
2001	21.93	76.99	1.08
2002	20.08	79.16	0.76
2003	19.81	79.17	1.02
2004	19.12	80.07	0.81
2005	18.64	80.92	0.44
2006	18.01	80.85	1.14
2007	16.96	81.90	1.14
2008	13.67	85.25	1.08
2009	14.16	85.18	0.66
2010	16.88	82.48	0.65
2011	20.22	76.59	3.22
2012	19.56	77.96	2.45

数据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2. 按利率种类来划分，美国市政债券可以分为固定利率、可变利率^①和其他利率三种形式。1996-2012 年期间，美国固定利率市政债券发行量占比始终最大，可变利率市政债券发行量占比其次。从表 4 可以看出，1996-2012 年期间，美国固定利率市政债券发行量占比在 67.23%-91.00%区间变动，平均值为 80.19%，中位数为 79.49%；可变利率市政债券发行量占比在 4.91%-31.44%区间变动，平均值为 13.78%，中位数为 13.73%；其他利率市政债券发行量占比在 1.08%-12.81%区间变动，平均值为 6.03%，中位数为 4.99%。

①标售利率证券（Auction Rate Securities，简称 ARS）具备传统浮动利率债券的优点，可以规避因固定利率与浮动利率错配所带来的风险。ARS 的利率每隔一段时间通过市场投标重新设定，反映了该类债券市场的实际情况，而传统的浮动利率债券通常采取盯住某个通用市场利率的方式，反映了总体市场而非该类债券市场的实际情况。ARS 因其灵活的定价机制而得到市场的认可。鉴于其利率随市场变动而变动，且流动性较强。标售利率市政债券（Municipal Auction Rate Securities，简称 MARS）已成为美国市政债券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 MARS 在内的 ARS 规模在 2008 年初达到了 2000 亿美元。2008 年次贷危机爆发，造成一些大投行陷入流动性困境而没有像以前那样参与 ARS 的投标，导致 ARS 市场几乎崩溃。比如，2008 年 2 月 7 日，四大投行花旗、瑞银、摩根斯坦利和美林拒绝参与 ARS 的投标，造成大量 ARS 流标。

2012 年美国固定利率、可变利率、其他利率三种市政债券发行量占比分别为 91.00%、4.91% 和 4.22%。

表 4 1996-2012 年期间美国市政债券按利率种类分类占比

年份	固定利率(%)	可变利率(%)	其他利率(%)
1996	85.58	11.72	2.70
1997	82.74	13.73	3.53
1998	86.96	10.15	2.89
1999	81.93	13.45	4.62
2000	73.11	20.37	6.57
2001	79.49	15.12	5.39
2002	76.81	14.97	8.22
2003	75.46	13.04	11.50
2004	72.48	14.67	12.81
2005	75.01	15.75	9.24
2006	74.62	15.45	10.01
2007	74.59	14.74	10.67
2008	67.23	31.44	1.08
2009	88.43	10.45	1.15
2010	90.51	6.58	2.91
2011	87.28	7.74	4.99
2012	91.00	4.91	4.22

数据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三）美国市政债券与州及州以下地方政府债务的若干重要比率

1. 美国长期市政债券的两个重要比率。根据《美国统计摘要（1999）》的数据显示，美国市政债券余额占整个政府债务体系中的比重为 20%左右，联邦政府债务余额占比为 80%左右；长期市政债券发行规模与当年 GDP 的比率在 2%-4%之间，与当年州及州以下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的比率保持在 10%以上。从表 5 可以看出，2004-2010 年期间，美国长期市政债券发行额与 GDP 的比率在 2.56%-3.04%之间，平均值为 2.69%，中位数为 2.64%；长期市政债券发行额与州及州以下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的比率在 12.43%-17.60%之间，平均值为 13.80%，中位数为 12.80%。

2. 美国州及州以下地方政府的负债比率、债务率和偿债率。从表 6 可以看出，2004-2010 年期间，美国州及州以下地方政府负债比率在 16.48%-19.51%之间，平均值为 17.63%，中位数为 17.14%；州及州以下地方政府债务率在 78.26%-128.15%之间，平均值为 90.85%，中位数为 82.45%；州及州以下地方政府偿债率（剔除异常值）在 6.30%-12.18%之间，平均值为 9.44%，中位数为 9.53%。

表 5 2004-2010 年期间美国长期市政债券的两个重要比率

年份	长期市政债券发行额与 GDP 的 比率(%)	长期市政债券发行额与州及州以下地方政府 可支配财力的比率(%)
2004	3.04	14.78
2005	2.56	12.80
2006	2.56	12.49
2007	2.72	12.43
2008	2.61	14.04
2009	2.64	17.60
2010	2.72	12.44

数据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表 6 2004-2010 年期间美国州及州以下地方政府的负债比率、债务率和偿债率

年份	州及州以下地方政府 负债比率(%)	州及州以下地方政府 债务率(%)	州及州以下地方政府 偿债率(%)
2004	16.68	81.17	-24.22
2005	16.52	82.45	8.48
2006	16.48	80.54	7.97
2007	17.14	78.26	6.30
2008	17.86	96.17	11.13
2009	19.21	128.15	12.18
2010	19.51	89.21	10.57

注：(1) 州及州以下地方政府负债比率=某年州及州以下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当年GDP；(2) 州及州以下地方政府债务率=某年州及州以下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当年州及州以下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其中州及州以下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包括州及州以下地方政府本级财政收入和联邦政府的转移支付收入，下同；(3) 州及州以下地方政府偿债率=某年市政债券还本付息额/当年州及州以下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

数据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美国长期以来的实践经验表明，市政债券与州及州以下地方政府债务的这些重要比率数值处于安全区域，是相对适当的，非常值得我国借鉴和参照。

(四) 美国一般责任债券的偿债资金来源

在美国，财产税由州及州以下地方财政自行归集和使用，有利于激励州及州以下地方政府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公共设施，增加公共服务供给。财产税是美国州及州以下地方政府的主要税种，能够为一般责任债券提供可靠、稳定的偿债资金来源。从表 7 可以看出，1996-2010 年期间，美国州及州以下地方政府财产税年均增幅为 5.48%，累计

增长 1.11 倍，呈现逐年持续、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财产税占州及州以下地方政府税收的比重在 28.56%-34.79%之间，平均值为 30.75%，中位数为 30.4%；州及州以下地方政府财产税与一般责任债券发行规模的相关系数为 0.7881，说明两者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

表 7 1996-2010 年期间美国州及州以下地方政府财产税与一般责任债券的关系

年份	州及州以下地方政府 财产税(亿美元)	一般责任债券发行规模 (亿美元)	财产税占州及州以下地方 政府税收的比重(%)
1996	2094.40	644	30.40
1997	2188.77	722	30.05
1998	2301.50	935	29.74
1999	2401.07	708	29.43
2000	2491.78	663	28.56
2001	2636.89	1014	28.85
2002	2791.91	1254	30.85
2003	2966.83	1406	31.60
2004	3182.42	1291	31.50
2005	3359.81	1440	30.57
2006	3591.09	1146	30.04
2007	3895.73	1302	30.36
2008	4089.72	1102	30.73
2009	4318.96	1549	33.77
2010	4416.61	1469	34.79
相关系数	0.7881		

数据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五）此轮金融危机时期的美国市政债券市场改革

此轮金融危机的破坏性作用倒逼美国金融监管机构重新审视包括市政债券在内的整个金融制度，引发了美国市政债券市场改革，制定出台了《美国复兴和再投资法》（即 ARRA 法）和《华尔街金融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即 Dodd-Frank 法）。

金融危机的特殊性和系统破坏性使得美国联邦政府采取市政债券产品创新来作为一种应对策略。根据 2009 年 2 月 17 日通过的《美国复兴和再投资法》第 1531 款，美国各市政主体将发行一种新的市政债券即“建设美国债券”（Build America Bonds，简称 BAB），筹措资金用于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及创造就业机会。BAB 属于应税市政债券。与通常的金融产品创新相比，BAB 的产品创新有以下两个特点：（1）通常的金融产品创新是为了便于市场微观主体管理金融风险，而推出 BAB 的目的则是帮助美国各级地方政府筹措资金以渡过金融危机；（2）通常的金融产品创新是由市场微观主体设计和运作，一般与政府没有直接关系，但 BAB 则是由政府设计其运作机制并介入其中。具体来说，美国

联邦政府为市政债券发行提供补贴，以降低市政债券发行成本，帮助各级地方政府筹措资金。联邦政府的补贴方式主要有两种：补贴 BAB 持有者所缴利息收入所得税的部分；补贴 BAB 发行人利息支出的部分。相应地，采取这两种补贴方式发行的市政债券分别称为税收抵减 BAB（Tax Credit BAB）和直接支付 BAB（Direct Payment BAB）^①。从表 8 可以看出，自 2009 年 4 月开始 BAB 正式发行，到 2010 年底，共发行了总面值为 1814 亿美元的 BAB；2010 年 BAB 发行额占长期市政债券发行额的比重为 27.05%，较上年上升 7.3 个百分点。从 BAB 的分类构成看，2010 年一般责任债券发行额为 433 亿美元，占比为 36.95%，较上年下降 6.8 个百分点；收益债券发行额为 739 亿美元，占比为 63.05%，较上年上升 6.8 个百分点；收益债券发行额与一般责任债券发行额的比值为 1.7 倍，较上年增加 0.4。

表 8 建设美国债券（BAB）发行额及其占比与分类构成

年份	建设美国债券发行额及其占比		建设美国债券中的一般责任债券		建设美国债券中的收益债券	
	发行额 (亿美元)	占长期市政债券 发行额的比重(%)	发行额 (亿美元)	占比 (%)	发行额 (亿美元)	占比 (%)
2009 年 4 月至 12 月	642	19.80	281	43.77	361	56.23
2010 年	1172	27.05	433	36.95	739	63.05

数据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2010 年 7 月 21 日通过的 Dodd-Frank 法对市政债券的政府监管和自律监管制度实行了改革。比如，加强 SEC 对市政债券发行人、咨询者和投资者等各市场参与主体的监管，将投行等相关机构纳入市政债券规则制定委员会（MSRB）的自律监管对象，加强 MSRB 对市政债券咨询者的自律监管等。1975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1975 年证券法修正案》，该法案指示 SEC 成立一个由 15 个成员组成的市政债券规则制定委员会（MSRB），它是从事规范市政债券市场上投行、经纪商、交易商和自营银行行为的独立的自律监管机构。MSRB 提出监管办法后，需要先广泛征求市政债券行业和其他关联方的意见，并参考业内人士的意见对监管办法进行修改。监管办法的最终审批权不是由 MSRB 而是由 SEC 行使。制定出的监管办法既不由 SEC 也不由 MSRB 具体实施，而是由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NASD）中监管市政债券交易商的部门及自营银行的有关监管机构具体实施。

可见，美国市政债券市场改革的目的旨在增强市政债券运作的透明度，促进市政债券规范、稳健运作，更好地维护市政债券投资者和发行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市政债券市

^①于晨光：《金融危机中的美国市政债券市场》，《金融时报》2011 年 12 月 12 日。

场效率，以重振美国经济，并促使其持续、健康发展。

二、日本发行地方公债为城市化建设融资的实践经验

在上世纪 50-70 年代期间，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大大推动了城市化进程，该时期地方公债也大量发行。统计数据显示，日本 2005 财年地方政府面向当地居民发行的地方公债为 3444 亿日元，到 2005 财年结束，有 89 个地方政府独立发行了地方公债。在日本，地方公债用于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投资占相关设施建设总投资的 20%-40%。日本地方公债发行由中央政府集中审批，这点与美国采取的注册备案制不同。中央政府根据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结合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审批每个地方政府每年或每个项目发行地方公债的额度。

从表 9 可以看出，1970-2000 年期间，日本城市化率呈现逐年微幅递增的态势，从 1970 年的 72.07% 上升至 2000 年的 78.68%，累计上升 6.61 个百分点，年均上升 0.22 个百分点；2000-2010 年期间，城市化率呈现逐年小幅上升的态势，从 2000 年的 78.68% 上升至 2010 年的 90.71%，累计上升 12.03 个百分点，年均上升 1.2 个百分点。1970-2010 年期间，日本地方政府长期债券余额持续增长，特别是 1990 年后加速增长，从 1970 年的 29743 亿日元增加至 2010 年的 1996966 亿日元，累计增长高达 66.14 倍。该期间日本地方政府长期债券余额与城市化率的相关系数为 0.8504，说明日本地方政府长期债券与本国的城市化进程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即日本的城市化进程越快，地方政府长期债券余额就越大，反之相反；同时，地方政府长期债券的迅速发展也有力地推动了日本的城市化进程，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呈现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

表 9 1970-2010 年期间日本地方政府长期债券余额与城市化率的关系

年份	城市化率(%)	地方政府长期债券余额(亿日元)
1970	72.07	29743
1975	75.91	140078
1980	76.19	390831
1985	76.74	572015
1990	77.37	670459
1995	78.05	1247593
2000	78.68	1813806
2005	86.30	2014167
2010	90.71	1996966
相关系数	0.8504	

数据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三、国际经验给我国带来的有益启示

以上国际经验足以表明，市政债券发行规模与本国的城市化进程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即本国的城市化进程越快，市政债券发行规模就越大，反之相反；同时，市政债券的快速发展也有力地推动了本国的城市化进程，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呈现有序互动的良性发展格局。

从配套的制度环境来看，各国市政债券具有一些共同点。一是财政体制较为成熟，各级地方政府间的财权与事权划分合理、界定清晰，两者相匹配、相对应，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比较规范和透明；二是政府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力规划，根据偿债能力制定合理的市政债券发行计划，以防范和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降低市政债券违约率；三是建立并完善信用评级制度、风险预警和监控系统、债券担保制度、偿债机制等，强化市场约束，加强市场监管，提高市政债券运作的透明度，减少投资者与发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四、我国推出市政债券、为新型城镇化建设融资的政策建议

我们认为，国外发行市政债券为城市化建设融资的实践经验值得我国认真借鉴和学习，在此基础上，应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就我国推出市政债券、为新型城镇化建设融资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1. 加快立法，加强法制建设，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从长远看，建议提请全国人大重新审议修订《预算法》修正草案，如果现在时机尚不成熟，可以考虑由国务院依据《预算法》尽快制定并出台一些特别规定，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这样，可以赋予地方政府自主发债的法律权力，明确地方政府作为独立民事主体自主发债的法律地位，以便为地方政府自主发债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有力的法律保障，从而扫清法律障碍。同时，加快立法，加紧制定有关市政债券的专门法规。随着财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建议制定《市政债券法》、《市政债券发行监管条例》和《市政债券发行试行办法》，明确规定市政债券的发行主体、发行方式、发行定价、利率、期限、担保机制、信用评级、募集资金投向、偿债机制、投资者、信息披露和税收优惠政策等。比如，应将市政债券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受经常性预算平衡和严格的会计准则的制约，使地方政府的负债比率、债务率和偿债率均保持安全水平；应明确规定市政债券的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满足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等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市政工程和社会公共服务部门等社会公益性项目建设需要，严禁用于“吃饭财政”及弥补地方政府经常性支出的不足，不能用于竞争性领域建设项目，更不能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样板工程”；应建立合理的偿债机制，设立专门的偿债基

金，以地方政府税收或特定公共项目收入作为市政债券的可靠和稳定的偿债资金来源。此外，建议制定有关政策措施，使市政债券的发行范围限于本地区，将市政债券发行与包括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收入在内的整体财政政策统筹安排，以避免加剧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基本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及社会福利水平的分化。

2. 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建立市场化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强化市场对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监督和约束，提高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透明度。具体来说：对地方政府发债宜“疏”不宜“堵”，疏导与规范并举，引导地方政府走“正门”发债，让地方政府举债融资逐渐阳光化和规范化，提高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规范化程度，建立市场化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加强地方政府长期债务管理，严格控制地方政府举债规模，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或准公共品的能力；允许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发行规范的市政债券，以创新金融产品和融资手段，丰富债务融资工具，开辟新的城镇化建设长期资金来源渠道，拓宽市场化的城镇化建设融资渠道，构建多元化的城镇化建设融资服务体系与适应城镇化建设的可持续融资机制，完善金融服务模式，更好地满足新型城镇化建设多样化融资服务的新需求；改变目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格局，调整和优化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结构，增加其直接融资比重，降低其融资成本，提高其融资效率，以有效发挥市政债券的融资功能，强化市场对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监督和约束，避免地方政府借道其他途径曲线融资的现象；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增强信息披露的有效性，提高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透明度，利用市场机制对市政债券进行风险度量、评估和定价，以强化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督，全面掌握地方政府债务情况，增强发行人的自我管理风险能力，有效控制和降低地方政府举债融资风险，提高信用风险管理效率。

3. 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实现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全口径管理和全面动态监控。2010年以来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英国债务危机、爱尔兰债务危机和日本债务危机已充分说明，完善的公共债务管理制度有利于有效防范和控制政府举债融资风险。为此，中央政府应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和市政债券资金预决算管理制度，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地方政府的举债权限、举债方式、举债规模、募集资金用途、偿债机制、偿债资金安排、债务的会计核算和统计报告制度、监管机构等内容，界定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范围和种类，抓紧研究制定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尤其是高风险地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实行严格的举债规模控制（市政债券与地方政府债务的若干重要比率可以参照美国的有关数值，这样的举债规模是相对安全和适当的），防止地方政府过度举债，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地方政府债务变动情况，实现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全口径管理和全面动态监控。应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综合治理、标本兼治，中央财政应建立有效的激励

机制，引导和督促地方政府妥善处理和积极化解存量债务，严格落实偿债责任，加快建立偿债准备金制度，以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应尽快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预警、度量、评估和监控机制，在合理确定政府性债务统计口径的基础上，建立一整套科学合理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指标体系，健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体系，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制度，以有效控制和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切实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

4. 严格执行财经纪律，构建地方政府的财政信用，强化地方财政预算约束，提高地方财政预算执行的透明度。这是建立市场化地方政府发债机制的有力保障，已被国外的大量实践经验所证明。比如，美国的财政体系实行联邦财政、州财政和地方财政三级管理体制，三级财政各有其相对独立的财政税收制度和专门法，各自编制、审批和执行本级预算，市政债券发行规模受到地方财政预算的严格监督和约束。为此，应进一步完善我国地方公共财政预算，建立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逐步将地方政府债务收支分类纳入地方本级财政预算管理，并由同级人大审查批准地方本级财政预算及其执行情况。应严肃财经纪律，构建地方政府的财政信用，健全地方财政预算体系，完善地方财政预算管理制度，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加强预算监督，充分发挥预算监督的职能作用，以强化地方财政预算约束，提高地方财政预算执行的透明度，促使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显性化，从而抑制地方政府过度发债的冲动。应进一步研究提出全口径预算管理的口径和范围，推进地方政府会计制度改革，尽快编制和公布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研究编制三至五年期滚动预算。

5. 继续深化税制改革，探索开征房产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为一般责任债券提供可靠、稳定的偿债资金来源。国际经验表明，财产性税收^①往往由地方财政自行归集和使用，有利于激励地方政府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公共设施，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比如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都将房产税作为地方主要税种。为此，我国应当继续深化税制改革，加快研究建立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适应的地方税制体系^②，根据收益原则，以城市基础设施改善带来的财产增值为基本税源，探索开征房产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优化地方税收收入结构，以支撑地方综合财力，替代当前饱受诟病的“土地财政”，并与市政债券相结合，为一般责任债券提供可靠、稳定的偿债资金来源。其中，以房产税为主的财产税是相对适宜的地方主体税种。2011 年 1 月，上海和重庆率先开展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根据财政部公布的《2011 年全国财政决算》的统计数据显示，

①在考察房产税征收额时税收征得率至关重要。

②根据我国现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地方固定收入中与城镇化建设有关的税种包括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等。

2011 年房产税实现收入 1102.39 亿元, 同比增长 23.3%, 增速较 2010 年大幅上升 12.1 个百分点; 房产税收入占地方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 2.7%, 占比与 2010 年持平。根据财政部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2012 年房产税实现收入 1372.49 亿元, 同比增长 24.5%^①, 增速较 2011 年又上升 1.2 个百分点, 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这意味着目前房产税收入占比还偏低, 也表明未来房产税收入的增长空间广阔, 增长潜力很大。国家发改委《关于 2013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 要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2013 年 5 月 24 日, 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在扩大房产税试点上要有具体动作, 这表明今年房产税试点扩围值得期待。预计新一轮房产税试点将在较大范围内铺开, 可能会有更多的城市纳入试点范围, 今年下半年将是试点扩围的关键时期。随着对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建设的强化, 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存量房评估系统等相关配套系统的建设正在加速, 房产税试点扩围有望驶入“快车道”。未来随着各方面条件逐步具备, 时机逐步成熟, 应当稳妥、审慎地推进房产税, 并丰富财产税税种, 扩大财产税税基, 增加财产税收入, 以此作为一般责任债券的主要偿债资金来源。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2012 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http://www.pbc.gov.cn/>, 2013 年 2 月 6 日。
2. 本报两会报道组: 《多渠道构建城镇化投融资体系》, 《上海证券报》2013 年 3 月 7 日。
3. 李万峰: 《新形势下城镇化投融资存在的问题与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时报》2013 年 2 月 5 日。
4. 黄卫挺: 《警惕城镇化背后的地方政府融资风险》, 《金融投资报》2013 年 1 月 7 日。
5. 徐策: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需创新投融资渠道》, 《中国证券报》2012 年 11 月 23 日。
6. 刘斯斯: 《城镇化巨量融资需求考验》, 《中国投资》2012 年第 9 期。
7. 李文龙等: 《金融应在新型城镇化中大有作为》, 《金融时报》2013 年 3 月 7 日。
8. 李鹤鸣: 《城镇化=制度配套+金融服务+生态布局》, 《南方都市报》2013 年 3 月 6 日。
9. 罗克关: 《市政债券有戏吗? 》, 《证券时报》2013 年 2 月 18 日。
10. 袁迪: 《美国市政债券发展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金融时报》2012 年 4 月 9 日。
11. 陈珊: 《化“堵”为“疏” 城镇化呼唤市政债券》, 《中国证券报》2011 年 4 月 28 日。
12. 徐林: 《将城投债券规范发展成为适合中国国情的市政债券》, 《上海证券报》2010 年 10 月 11 日。
13. 王军: 《适时考虑让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 《上海证券报》2010 年 6 月 7 日。
14. 杨萍: 《我国发展市政债券市场的条件和前景》, 《中国投资》2008 年第 12 期。

责任编辑: 晨 乔

^①财政部税政司: 《2012 年税收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分析》, <http://www.mof.gov.cn/>, 2013 年 1 月 23 日。

· 产业发展 ·

全球第三方供应链革命和中国的实践

王子先 邓 娜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专业化分工与供应链整合日趋深化，全球第三方供应链应运而生，深刻影响着各国全球资源整合和优势要素聚集能力，成为决定国际竞争力的新制高点。深圳供应链管理公司借鉴日本、香港企业的经验，实现了技术和管理模式的双重创新，构筑整合国内外资源的商务平台，成为我国企业转型升级的排头兵。要建立健全有针对性的战略规划和产业政策，以全球供应链整合服务商为目标，把支持我国第三方供应链管理服务行业发展作为推动产业和外贸转型升级的新抓手，培育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

关键词：第三方供应链 服务外包 全球资源整合 外贸转型升级

作者简介：王子先，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巡视员；

邓 娜，商务部综合司、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专业化分工与供应链整合日趋深化，全球第三方供应链应运而生并日益发展壮大。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再是单个企业或产业的竞争，而是供应链的竞争。当前，我国进入产业和企业转型升级关键期，以生产性服务业升级创新带动工业化和整体产业结构优化，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占领国际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是推动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转型，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的重要课题。这其中，大力拓展第三方专业化供应链服务平台，是新形势下创造新的国际竞争优势、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利器。

一、全球第三方供应链的兴起及其革命性意义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全球生产要素重组和产业转移掀起新高潮。生产要素全球优化配置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催生出服务外包、合同制造、模块化生产等新的生产方式和服务模式，也直接促成了全球价值链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延展细化和深度裂解。随着服务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服务不断从传统制造中分离出来并成为专业化的第三方服务业，这是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带动了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的不断升级，第三方供应链管理行业作为业务及管理流程整合的外包集成模式和全球资源整合平台应运而生。

（一）全球第三方供应链的兴起

供应链最早来源于彼得·德鲁克提出的“经济链”，后经由迈克尔·波特发展成为“价值链”，最终演变为“供应链”。通常认为，供应链是围绕核心企业，通过对信息流、商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从采购原材料、制成中间产品及最终产品，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是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模式。供应链管理 1985 年由美国知名学者波特教授提出，指在满足一定的客户服务水平的条件下，为了使整个供应链系统成本达到最小而把供应商、制造商、仓库、配送中心和渠道商等有效地组织在一起，来进行的产品制造、转运、分销及销售的管理方法。

1. 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形成。任何一个具体产业的价值活动，均可粗略地划分为技术与资本密集环节（包括研发设计、高级原材料生产、复杂零部件生产等）、劳动密集环节（简单零部件生产、产品组装等）和信息与管理密集环节（如市场营销、管理运营、品牌运作、专业服务、金融服务、物流管理等），其中资本密集环节和信息与管理密集环节是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下，价值链各个环节的可分解性、中间品（服务）的可贸易性以及要素配置的分散化程度日趋提高，同时生产国际化日益推进，全球生产服务网络扩大，由此也形成了全球价值链，覆盖了产品或服务生产活动的全部主体。

联合国工发组织在《2002/2003 年度工业发展报告》中指出：“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和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它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并通过自动化的业务流程和供应商、合作伙伴以及客户的链接，以支持机构的能力和效率。”

经济全球化下价值链延展细化和深度分解，不仅是推动当今国际分工格局的主因，

也是众多跨国公司引入和实施供应链管理思想的基础动力。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进行产品研发、物料采购、加工制造和产品分销，才导致供应链管理思想不断向无数企业管理实践渗透，并促成世界范围内供应链管理新潮流和第三方供应链的兴起。

2. 第三方供应链与服务外包的发展。从当今服务全球化的背景看，供应链管理服务模式与全球服务外包迅猛发展相伴随。新世纪前后，随着全球经济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以及与信息网络经济、知识经济的互动，服务业国际分工全面深化，大量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第三方专业化服务业。在欧美发达国家工业化后期，普遍出现了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专业化和外包化趋势，制造业升级越来越依靠生产性服务业的推动与融合。特别是随着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科研设计、通讯、金融保险、商务服务等日益向第三方专业化服务方向升级，在制造业投入中的比重也不断上升。

在此背景下，跨国公司开始专注于核心业务，服务外包蓬勃发展，国际离岸外包异军突起，而供应链管理服务则为安全高效的服务外包提供了重要保障。曾经高度自给自足的垂直一体化企业经营模式迅速解体，研发、设计、制造、物流、分销等组成企业运转的基本功能，逐步转移到外部专于此项的企业来做，有限资源逐步集中到企业的核心能力上，供应链服务外包应运而生，由此供应链也由“内生型”向专业化第三方服务业转型，成为新兴业态和商业模式。

在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参与了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出现了产业内分工及贸易的快速发展，并逐步发展成低附加值制成品出口大国和重要的服务外包供应国。我国的第三方供应链管理企业也从最初为沿海加工企业代理通关退税等业务逐步升级而来，随着企业生产专业化和分工垂直化需要，逐步增加了融资与采购业务，又由于熟悉国内营销渠道，进而成为国外公司进入国内市场的配送商和分销商，建立“四流合一”的供应链服务平台，从而在某些地方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第三方供应链管理行业。

（二）IBM 向服务化和相对独立混合型供应链转型案例

IBM 是制造业服务化和跨国公司全球生产服务网络体系深化的一个缩影。1911 年 IBM 创立于美国，前期主要业务为生产商用打字机，后转为生产文字处理机，然后到生产计算机和有关服务。1993 年起 IBM 开始由以生产为中心的硬件制造商向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提供商转型，最终确定了 IBM 现在的商业模式，成为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和业务解决方案公司。

为了实现由全球网络制造向网络服务转变，IBM 不惜出售了一批对公司尚有利润贡献

的品牌产品，如 2004 年 IBM 果断将 PC 部门出售给我国的联想集团；与之同时，为了提升公司的专业服务水准，IBM 还收购了专业咨询服务公司，加快由制造向服务的转型升级。由此，IBM 实现了向 IT 全面解决方案服务供应商的转型，其中关键之处是 IBM 花近 10 年多时间重构了自己的供应链体系，IBM 前任 CEO 彭明盛的“蓝色革命”推开序幕，建立了全球供应链能力，为全球客户提供解决方案，又顺应潮流开创性地实施全球资源整合战略。为此，2006 年 IBM 将全球采购总部从美国迁往我国深圳，2008 年在北京成立 IBM 首个全球供应链创新中心。

经过近 10 年的努力，IBM 的服务化转型取得了成功，成为全球资源整合战略的领军者，跨国服务网络也成为 IBM 公司持续发展的战略支撑。IBM 实现了全球价值链的优化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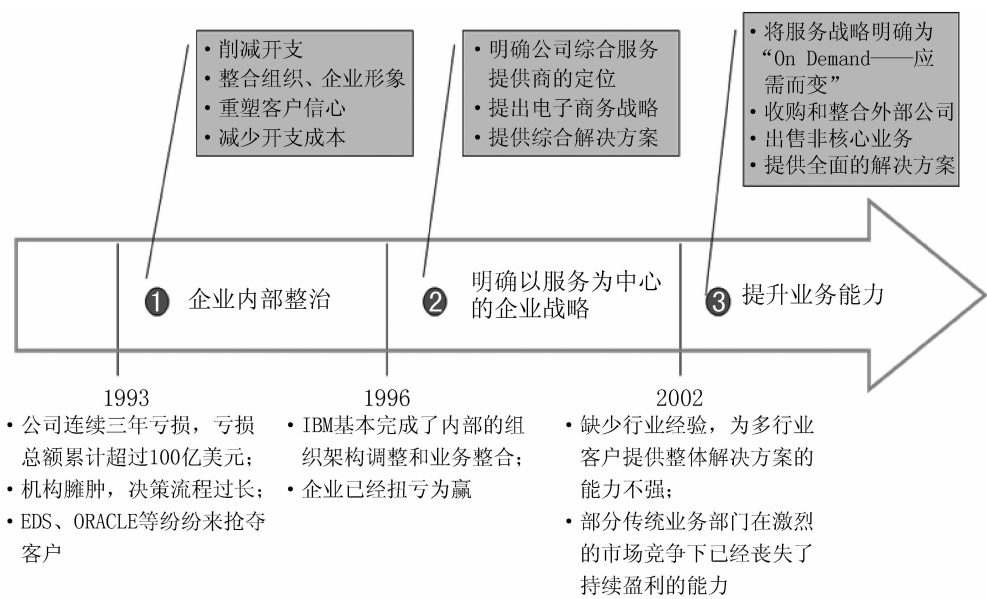


图 1 IBM 10 年转型之路所经历的三个阶段

咨询方面	软件方面	硬件方面
• 2002年，收购了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的咨询部门，此举给IBM公司增加约50亿美元的收入，并带来了3万名为垂直行业富有丰富经验的咨询师队伍。	• 1995年，收购了Lotus Development，并将其整合成IBM现有的五大软件之一； • 2002年，收购软件工具发展商瑞理软件公司，此举使得IBM公司能提供完整的软件开发环境； • 2004年，收购提供服务器和存储设备管理软件的坎德尔公司，加强了IBM公司Tivoli系统管理工具的组合。	• 2002年，出售了连年亏损的硬盘部门； • 2004年，出售了缺乏行业竞争能力的PC部门； - 通过两次出售，使得IBM能够将资源集中于核心业务，专注于核心业务的能力提升。

图 2 IBM 在主要业务领域的收购与出售行动

构和供应链及商业模式的重大创新，重组了管理及业务流程，成为为多行业客户提供 IT 解决方案的服务外包公司，其供应链体系日益成为分离于各分支公司的相对独立体系，并与外部第三方供应链广泛合作，共同致力于全球价值链治理，由自我服务型向混合型转型，第三方色彩越来越浓。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IBM 实现 1036 亿美元的营业收入，税前利润达到 167 亿美元，主要由服务部门实现。

（三）革命性意义

全球供应链管理由自我服务向第三方专业化转型，是一次新的供应链革命，是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服务革命及管理革命共同推动的结果，不仅从根本上改变着世界各国服务业发展模式，而且日益深刻影响着各国经济、产业、技术、管理模式，影响着各国全球资源整合和优势要素聚集能力，成为决定国际竞争力的新制高点。其革命性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从宏观上看，它是决定各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中地位的关键支点，尤其对新兴市场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第二，从微观上看，全球第三方供应链实现了经营管理全过程的创新，重塑了核心竞争力：一是经营理念创新：强化全球化视野，确立以全球资源应对全球的理念，提升整合利用全球资源的能力。正所谓，“跨国企业已如黄昏落日，世界步入全球整合时代”。二是经营战略创新：专注于运用现代技术和管理方法，整合行业供应链各环节资源，培育基于供应链服务的核心竞争力，提供物流、商流、信息流和资金流一站式服务，特别是虚拟生产的产品整合，为采购商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强化产业组织和辐射带动功能。三是商业模式创新：供应链公司在充分利用先进信息技术基础上，打造了一站式服务的商业平台，实现了商业模式的重大创新。四是平台创新：以信息流为核心，结合商流、物流、资金流，实现系统、数据、物联网的广泛整合，以信息化支撑平台化建设，即制造服务化（研发设计+加工外包+品牌营销）、服务组建化（服务电子化）、商务平台化（整合资源、提升效率）、业务外包化（整合外部资源的信息平台）。五是供应链金融创新：供应链融资以平台担保方式解决供应链公司资产负债率高的问题，实现动产质押和订单融资，为供应链上的中小企业代垫资金、代退税，其实质是银行通过供应链平台控制中小企业，实现小额贷款风险控制。

第三，从全球化角度看，第三方专业化供应链的兴起与充分应用，有利于提升产业和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水平。可以更好实现与供应商、渠道商、制造商、客户及消费者的互利共赢，并形成战略联盟关系，促进开放式创新，也有利于提升全球话语权、定价权和影响力。

二、我国第三方供应链实践：深圳先行探索和重大创新

随着同业竞争的日益激烈和国际上第三方供应链服务平台的兴起，我国一些地方传统的外贸公司、物流企业及出口加工企业逐步引入第三方供应链管理，如深圳、上海、浙江和福建等地，实现了业务的转型升级。其中，深圳由于毗邻香港的优势，目前集中了全国 80% 以上的供应链公司，是全国供应链管理行业的领军者，探索发展出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兴业态，不仅引领贸易物流产业转型升级进程，而且不断辐射广大国内中小制造业企业，大力发展在岸服务外包，带动国内产业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在全国有较强的代表性。

（一）深圳第三方供应链公司的主要特点

供应链公司拿到采购商订单后，为其提供从供应链上游的原料采购、组织生产、物流运输、进出口通关，到下游的分销执行等一系列外包服务，实现了从传统的部分环节代理服务向全部环节“打包外包”的全程供应链服务转变，类似于工程建设领域的“交钥匙工程”。

第一，业务规模迅速壮大。据深圳市工商部门统计，深圳现有实际从事供应链管理业务的公司 50 家左右，其中真正具有平台化、多功能服务特征的供应链企业 10 多家，每家企业服务着几百到几千家企业。2011 年 10 多家平台化供应链公司进出口额约占到深圳进出口总额的 12%-15%。2010 年在建行深圳分行国际结算量超过 1 亿美元的供应链企业达 16 家，合计 79.65 亿美元，占分行国际结算总量的 7.8%。2013 年 6 月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推出的 2013 年中国对外贸易 500 强企业中，有多家深圳供应链公司。

第二，涌现出一批创新型龙头企业，如怡亚通、年富实业、朗华、一达通、飞马国际等。其中怡亚通、飞马国际已实现中小板上市。深圳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第一家上市供应链企业，2012 年业务量达到 360 亿元，营业收入 74.8 亿元，全国进出口 200 强企业（2000-2005）之一，2010 年在深圳缴纳 19.5 亿元关税，全国达到 30 亿元。

第三，业务覆盖辐射范围不断向全国扩展。2012 年底，怡亚通公司拥有 80 多家分支机构，全球员工 3169 人，在深圳、上海、香港建立结算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覆盖全国约 380 个城市的深度分销与分销执行平台。

第四，供应链服务链条不断拓展，产业组织与辐射带动功能逐步强化。怡亚通公司现在已建立起涉及 IT、家电、快速消费品、粮油、汽车后市场（汽车售后服务）等领域的供应链服务平台体系，为 40 多家世界 500 强企业和 400 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提供供应链服务，企业平台上至少集纳了全球数千亿元资金，受到平台辐射的企业不下 2 万家。

第五，供应链服务与电子商务融合互动，促进新兴业态的成长。深圳市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建立了国内第一家面向中小企业的进出口外包服务平台，通过互联网一站式为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通关、物流、金融等进出口环节服务，为客户解决外贸环节“最后一公里”问题，2012 年末客户达到 1 万家；2010 年 11 月一达通加入阿里巴巴，形成了从“找外贸”到“做外贸”一站式服务链条。

（二）基本运营模式

供应链公司的商业平台及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为原材料供应商、物流供应商、信息供应商、资金供应商、生产制造企业等供应链上下游的所有参与者提供一个对接平台，使其致力于核心业务的强化，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它承接了产品或服务生产和运动过程中的代理采购、库存管理、虚拟生产（委托外包生产）、分销执行和物流运输、进出口通关、融资、税收等各种外包业务，并通过资源整合和再次外包来实现，形成全程供应链管理运作模式，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表 1 供应链管理“四流合一”的主要功能与内涵

类别	主要功能 / 内涵	供应链管理能够提供的服务项目
商流	货物在由供应者向需求者转移时,货物与其等价物的交换和货物所有权的转移	参与市场调研、作出需求预测、谈判撮合、作为交易对手参与货物的买卖交易
资金流	随着商品实物及其所有权的转移而伴随发生的资金往来	商业信用放大、融通仓、代垫税款、代开信用证、外汇支付便利
物流	货物从供应者到最终用户的全程实体形态的流动	运输、仓储、包装、装卸、分拣、供应商库存管理, 通关保税、集货、其他增值服务
信息流	信息流是物流、资金流、商流的流动影像,分为信息采集、传递和加工处理	条码管理、在途查询、数据报送、供应链管理系统开发

伴随着供应链管理行业的发展壮大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其业务模式不断创新：一是采购执行，即供应链公司建立集商务服务、物流服务、资金结算服务、信息处理服务为一体的采购服务平台，为客户提供采购计划、订单管理、库存管理、运输配送、仓储管理、融资结算等一系列采购环节所需的各种服务；二是分销执行，即供应链公司凭借其分销服务平台，为客户提供分销计划、订单管理、库存管理、运输配送、仓储管理、资金垫付及结算、信息管理等一系列分销环节所需的各种服务；三是虚拟生产，即供应链公司接受客户委托外包加工生产，提供由客户委托采购原材料、生产、配送成品到最终使用者的全面性服务，形成一个完整的接单、组织研发设计、采购、生产、配送的完整生产过程，完全虚拟；四是安全库存管理，即供应链公司购买核心企业的部分产品，依据核心企业以往配送货物的要求及历史数据，保存一定的货物库存，对核心企业的配送

指令更快地加以响应，提高效率；五是供应链融资，即供应链公司在为客户做代理业务的过程中，基于对客户了解及行业状况，对客户未能按时支付给上游供应商的款项，依据客户要求，临时给予垫付资金服务。

（三）第三方供应链服务平台的重大创新及意义

我国第三方供应链服务公司发展成整合国内外资源的商务平台，不仅引领传统外贸、物流、流通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也对整体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管理创新、流程革命、技术创新，特别是制造业升级有全方位意义。所谓“一流企业做平台，二流企业做产品，三流企业做加工”，切中了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要害。

第一，促进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全国 4000 万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第三方供应链管理服务公司在为供应商和客户提供传统中介服务的同时，还以代理商的身份在国际贸易中提供包装、运输、售后服务、品牌推广等一系列增值服务，有利于构建与制造业相匹配的全球营销网络，实现制造业品牌的孵化和推广，加快我国制造业由价值链低端向高端延伸。

第二，打造全球资源整合服务平台，提升全球化运营水平。培育我国的全球资源整合服务平台，既是与跨国公司形成供应链体系战略联盟的手段，更是适应全球产业、技术、管理革命大潮、提升全球化运营水平，聚集全球优势要素的必然之选。

第三，推动服务贸易开放与创新。当前，全球产业重心呈现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趋势，商品价值实现的关键和利润增值空间日益转向产业价值链两端的服务环节，国际竞争手段也由传统的价格竞争向由金融、技术、运输、通讯、信息等服务构成的非价格竞争转移。第三方供应链独特的商业模式可以紧密结合终端市场需求，有效整合贸易衔接的各个环节，强化中间服务，推动我国服务贸易领域开放和创新。

第四，打造新兴的高端服务外包模式。供应链管理行业是从传统制造业内部供应链中分离和升级而来的，逐步实现了从传统的部分环节代理服务向全部环节“打包外包”的全程供应链管理服务转变，并逐步成为专业化的第三方高端服务业，将对我国发展国际国内服务外包产生关键引领作用。

第五，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重组产业链，提升国际市场话语权。通过打造供应链平台，实现从“微笑曲线”的低端制造环节向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 6 个高端环节延伸，提升出口产品供应链的整体竞争力。实施国家产业价值链战略，通过供应链平台建设延伸产业链高端服务环节，打造天津、上海、港深穗等重点供应链节点和国际贸易中心，促使我国逐步发展成全球采购中心和世界供应链平台中的“枢纽港”。

三、全球第三方供应链的国际比较和主要特点

(一) 国际经验

根据供应链上核心企业类型的不同、涉及的外包服务的多少，全球第三方供应链可以分为不同类型，其中香港、美国、日本、新加坡的模式比较典型。

1. 香港。将供应链管理思想作为一种商业模式来塑造，起源于香港利丰集团，借助香港贸易、金融中心地位逐步形成了利丰模式。深圳众多供应链管理商业模式的拓展和供应链管理行业的演进路径深受利丰集团影响。利丰集团从单一贸易代理商转型为以供应链管理运作的现代跨国贸易集团，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传统采购代理商向地区性采购代理商转变；二是从地区性采购代理商向生产计划的管理者和实施者转变；三是向从交付生产计划战略向分解价值链、分散生产的供应链管理模式转变。利丰不仅为供应商和客户提供中介服务，还不断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整合研发设计、产品生产、物流分销等整个供应链和价值链环节，为客户提供整个出口贸易供应链内各种增值的多元化服务组合。目前，利丰的客户有 1000 多家世界知名企业，没有自己的工厂和工人，却管理着遍及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1.5 万家工厂和 2.7 万多员工为其服务的网络，掌控了 2/3 的产品价值链环节，成为全球价值链的掌控者。

2. 美国。美国是现代供应链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源地之一。随着企业间相互依存及协作程度的不断提高，美国跨国公司为提高全球竞争力，最大可能减少商品和服务的成本，积极建立供应链管理模式。目前，美国供应链管理企业总的来说有两大类模式：一是为自身进行供应链管理的企业，如沃尔玛（零售商主导模式）、戴尔电脑（生产企业直销模式）、NIKE（品牌管理模式）等大型跨国公司；二是为其他企业提供供应链管理服务的企业，如 IBM、威特（WAITEX）、UPS 公司等。纽约已经成为全球供应链枢纽，第三方供应链主体云集，竞争优势突出，还成为其国际贸易中心的关键支撑，改变了其国际贸易中心地位一度不振的局面。

3. 日本。日本综合商社是外贸型供应链管理企业的代表，以贸易为主体提供中介服务，向供应链上下游充分延伸，成为供应链的主导者和组织者。此外，通过在贸易中建立起全球商业网络，开展对外投资和各种中介咨询服务，实施更加严密的供应链管理。综合商社作为中小企业开展进出口贸易的窗口，还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信息服务，保持生产企业对商社的依赖关系，通过股权投资与相关企业形成稳固的利益共同体。

4. 新加坡。新加坡的供应链管理行业起步于 20 世纪 70 年代，逐步成为全球重要的供应链管理基地和运营中心。新加坡拥有高效灵活的物流、采购、运输和通信基础设施，发达的金融、电子商务和服务体系，以及产品开发、工艺设计、制造、营销、配送和技

术服务整个价值链方面的高素质专业人才。跨国公司在新加坡经历了制造业投资，整合上下游服务体系，建立设计、制造、销售及配送的低成本运营基地三个阶段。目前，第三方供应链管理被广泛应用于多个行业，具备从研发到产品设计与生产，到国际销售“一条龙”作业的整体商务开发能力，也成为其国际贸易中心和金融理财中心重要支撑。

（二）全球第三方供应链运营模式主要特点

伴随世界经济的服务化转型，全球第三方供应链迅速发展，跨国公司供应链模式也日益由内部控制向相对独立的混合型第三方专业化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特点：

第一，跨国公司的核心主导。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凭借技术优势、品牌优势与规模优势，成为所在产业链的集成者和操控者。一个大型跨国公司，在业内实际上就是一个超级的全球供应链条。目前，发达国家 80% 的企业在国际贸易中采取“供应链”运营模式。

第二，价值链条的全球布局。产品设计、零部件采购、产品生产组装及销售等增值环节不再局限于某一国家，而是涉及多个国家。以耐克为例，它没有自己的工厂，却有全球性的供应商，并将管理小组派驻到各供应商进行管理指导。

第三，业务流程的协同合作。制造商与供应商、经销商、零售商的协同作业，具体到国际贸易业务，涉及供应商、分销商、港口运营商、海关经纪人、转运人和运输公司等流程。供应链运营商通过强制推行共同标准与准则，消除相互间的摩擦，实现协同合作。

第四，流程外包的动态优化。发达国家经过充分的工业化，在产业链上游的设计、研发、技术与下游的品牌、营销、物流两端形成了核心优势，把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逐步外包出去，由发展中国家来承接。跨国公司其间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不断优化业务流程，从制造环节外包发展到服务环节外包。

第五，信息系统的快速反应。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与电子商务的迅速崛起，供应链运营商作为整个供应链体系的信息交换与处理中心，通过对信息的整合处理，形成原材料和产成品的需求信息，并及时传递给供应商、物流服务提供商等。

第六，物流体系的有效管理。供应链运营商同时也是物流服务提供者，为客户提供完整的物流服务解决方案，让产品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准时到达客户手中。

全球第三方供应链的兴起和发展，为我国提供了很多可供参考的经验与启示。

四、我国第三方供应链进一步创新升级的方向及建议

我国第三方供应链发展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和问题，其创新升级任务十分艰巨。

（一）创新升级的主要方向

我国第三方供应链管理服务行业应确立全球供应链整合服务商的发展目标，进一步

在实现经营管理与国际接轨、打造全球化双向服务平台、拓展深度供应链服务链条、介入第三方专业化、精细化高端服务业等关键环节取得重要突破，尽快向国际一流供应链服务商和外包商转型。

第一，实施差异化经营模式，打造核心竞争力。目前，深圳供应链管理行业总体处于自发无序竞争状态，几家供应链龙头企业年业务量超过 300 亿元，且只有保持 30% 以上的业务增幅才能实现“薄利多销”、支持企业继续运营。行业大分化、大重组、大洗牌在所难免，必须及早谋划差异化经营模式，发展高增值业务，打造核心竞争力，提高行业集中度。

第二，拓展深度增值型服务。供应链管理行业将呈现专业化、精细化发展趋势，即发展“深度供应链”，进一步拓展供应链深度的未来发展方向，包括财务一体化、供应链金融、制造业流程重组解决方案、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解决方案、管理咨询及培训、人力资源管理、外销市场拓展解决方案、IT 和网络平台解决方案、全球资源整合高端平台等，逐步实现向规模化、成熟化服务平台转型。

第三，对接第三方专业化服务。努力实现与第三方专业化服务供应商的对接，占据国际竞争制高点，通过延长服务链把价值链延伸到各个环节，特别是管理咨询、人力资源开发、金融财务、专业服务，甚至参股投资高附加值服务供应商，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成为跨国公司服务外包网络的重要节点，全面重塑全球资源整合和价值链治理的核心能力，提升我国供应链行业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第四，帮助中小制造企业重组业务及管理流程。通过促进第三方供应链服务平台的蓬勃发展，把通关、物流、管理、财务、研发、设计、信息等服务环节进行外包，重组企业、管理与业务流程，推动全国 4000 万中小企业打造核心竞争力，引领其转型升级。

第五，提升国际化水平，实现与国际市场及客户的无缝对接。在整合国内经销商、渠道商和生产制造商的同时，更重视整合全球资源，与国际知名品牌及渠道商合作，获取国际市场更多的一手客户，实现渠道扁平化，最终形成以覆盖一线的零售商、品牌商和高端客户为主导的市场网络，实现供应链网络与国际化销售网络的整合。

我国制造业将逐步告别低成本时代，行业和企业大分化、大洗牌在所难免；未来服务全球化和新一轮国际产业大重组，也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优化重组产业链提供了宝贵机遇。应致力于把有实力的供应链公司打造成发展服务外包、整合利用全球资源、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国际化平台。

（二）政策建议

我国第三方供应链进入大发展时期，亟需建立健全有针对性的战略规划和产业政策，扶持行业实现长期有序健康发展。

第一，提升对第三方供应链革命全方位意义的认识，加快研究制定我国发展第三方

专业化供应链的战略规划。

第二，确定第三方供应链作为新兴服务业、商业模式创新和全球资源整合先锋的“三合一”集成式创新的定位，将供应链公司纳入到现有的外贸企业转型升级、服务外包企业、技术与管理模式创新型企业等政策支持体系内，并不断建立健全相应的产业政策和公共服务体系。

第三，改善政策和营商环境，解决企业运作中的政策难题。对有诚信的供应链公司在通关、报税、外汇、融资等方面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给予更多灵活性；在供应链公司申请相关特殊行业经营资质方面给予便利，或可引用被代理公司的资质开展供应链服务；给予一定的办公仓储用地补助、银行融资贴息、人力资源扶持、物流税收减免等政策。

第四，将发展第三方供应链行业作为推动产业和外贸转型升级的新抓手。支持各类生产企业利用第三方供应链服务平台优化重组产业链，提升核心竞争力，控制成本，提高效率；着力扶持第三方供应链外贸服务新业态，强化“中国服务”，打造以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新优势。

5. 支持深圳等地打造国际离岸贸易中心。支持深圳先行先试，先行出台地方法律法规和政策开展大胆探索，打造全球供应链管理服务中心，开创向服务经济转型新局面。

6. 扶持行业龙头，培育中国的埃森哲。支持平台公司为内迁的制造业提供外贸、物流、金融等高端配套服务，实现实体企业与供应链公司共赢发展，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核心和配套企业聚集，形成配套齐全的产业链或生态链，加快向全球整合型服务供应商升级，打造一流的服务外包跨国公司；同时，完善高端配套服务，扶持行业生态链做大做强，实现实体企业与供应链公司的共赢发展。

7. 加强国际合作，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开展对外合作，借鉴全球先进的供应链运营模式，综合提升我国外包、渠道、品牌、标准、物流、电子商务等领域的水平，加快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创造国际竞争新优势。

参考文献：

- 1.王子先主编：《深圳市供应链管理行业发展报告（2012）》，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
- 2.王洛林：《全球化：服务外包与中国的政策选择》，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 3.隆国强：《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升级新战略——基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分析》，2012年2月。
- 4.商务部轻工商会：《全球供应链运营模式对提升我国外贸核心竞争力的启示及思考》，2012年。
- 5.周国辉：《小世界——全球整合重塑中国商业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8月版。
- 6.雷昊等编著：《全球价值链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
- 7.石良平等著：《供应链整合与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中国海关出版社2012年3月版。

责任编辑：刘英奎

· 产业发展 ·

摆脱固守静态比较优势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王岳平

摘要：我国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但相对固化在劳动密集型分工部门和劳动密集型环节的状况，也使我国经济呈现出难以持续的困境。培育产业动态比较优势涉及到人力资本、技术能力、营销能力、产业组织和制度保障等方面，应针对不同部门类型的不同发展阶段，制定不同的政策。

关键词：比较优势 国际分工 贸易条件 产业政策

作者简介：王岳平，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同时也是比较优势不断变化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一国原有比较优势减弱，新的比较优势形成与强化。这就决定了产业政策的重心不应是恪守现有的比较优势，而必须着眼于未来，培育动态比较优势，实现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升级，否则很容易导致分工锁定和国际分工地位低下。过去一段时期，我国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缓解了就业压力。但是，相对固化在劳动密集型分工部门和劳动密集型环节，也使得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呈现出难以持续的困境。

一、我国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特征分析

（一）分享了全球化利益，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并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年均增长 9.9% 的骄人业绩，2010 年与 1978 年相比，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 36339 万人，年均增长 4.5%。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我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分享全球化利益分不开的。在此期间，货物出口增长了 160.8 倍，年均增长 17.2%，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 GDP 增长的贡献达到 4.4%；2010 年出口依存度（出口额与 GDP 比值）达到 26.7%。

（二）贸易结构高度化名义上提高较快，而实际上不足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出口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数量增长来实现的，出口结构也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固化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能源消耗比较多的加工制造环节的特征，表现为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名义上提高较快，而实际上不足。

贸易结构高度化名义上提高较快，主要是出口结构实现了从过去以纺织服装为主向以机电产品为主的转变。2010 年商品出口总额中机电产品占 60%，高新技术产品占到 31%。根据 Rodrik 研究，我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复杂程度与人均收入比我国高 3 倍的国家相当。Schott 认为，我国和 OECD 国家出口商品的相似程度高于相近发展水平的国家 27%~39%^①。这也使得以传统标准来衡量，我国产业结构朝着高度化方向演变。按现价计算，制造业在 GDP 中的比重由 2000 年的 36%，提高到 2007 年的 47%；在制造业内部，交通运输设备、机械、电子等高加工度行业和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上述比重均大大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

然而，上述结构高度化只是名义上的或部门比例上的，而从实际技术含量、实现效益和机会成本等角度来看，呈现出固化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劳动密集型环节的特点，实际高度化与名义高度化呈现出明显的背离。我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外贸增长所付出的代价也很大，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国内基本上都是采用 OECD 的行业分类结果，将其定义的高技术、中技术、低技术产业移植到国内。根据这一分类，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呈现上升的趋势^②。然而，简单套用这一分类方法显然不能反映当前全球化过程中，

^①Rodrik, Dani. “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 NBER Working Paper, No.11947, 2006. Schott, Peter K. “The relative sophistication of Chinese exports.” NBER Working Paper, No.12173, 2006. Xu, Bin. “Measure the technology content of China’s exports.” www.rieb.kone-u.ac.jp/academic/apts/pdf/Bin_XU.pdf, 2006. 引自王平、钱学峰：《从贸易条件改善看技术进步的产业政策导向》，《中国工业经济》2007 年第 3 期。

^②郭克莎等：《走向世界的中国制造业》，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24 页。

国际分工从产业间、部门间分工向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转变的趋势。我国高技术产品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提高，但主要集中在高技术产品中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环节类产品，其占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的 90% 以上，按实际水平不过是中度劳动技术密集型行业，而需要高端专业技能、复杂技术和供应网络的产品所占比重下降^①；中技术产品中，主要是生产环节易于分解的机电产品的比重稳步提高，而可以反映一国技术深度的自动化产品的比重却在下降^②。表 1 所示的进出口价格比较表明，技术含量越高的产品，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与进口的差距越大。所谓技术密集型产品，如机床，也不过是承担光机生产和利用进口数控系统组装而已，这就决定了其附加值差距悬殊。这一特征使得我国在产业结构名义高度化之下，实际分享贸易高速增长的利益有限。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等所谓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总资产贡献率和销售收入利润率，甚至低于纺织、服装行业。

表 1 中国进出口产品价格比较

产品	单位	出口价格	进口价格	进口 / 出口
金属加工机床	美元 / 台	218	87838	402.93
船舶	万美元 / 艘	1.53	57	37.25
汽车	美元 / 辆	13374	36661	2.74
钢材	美元 / 吨	905	1104	1.22
电话	美元 / 台	58	69	1.19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0 年》数据计算。

二、价格贸易条件持续恶化，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被严重高估

在理论上，人们通常用贸易条件来分析贸易增长背后的交换利益，包括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收入贸易条件指数和要素贸易条件指数。其中，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是一定时期内一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之比。收入贸易条件指数是一定时期内出口数量指数与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的乘积。要素贸易条件指数是一定时期内一国出口商品生产部门要素生产率指数与同期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的乘积。价格贸易条件指数表示一国每出口一单位商品可以交换获得多少单位的进口商品；收入贸易条件指数表示一国用出口支付进口的能力；要素贸易条件指数是考虑了生产率上升对产品价格下降的支撑作用

①最典型的如计算机制造行业，在 OECD 国家就是 R&D/销售收入及工程技术人员与研发人员比重超过 5% 的高技术产业，在我国绝大多数承担的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环节，属于中度劳动技术密集型行业。

②王岳平：《“十二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及政策研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 2009 年度重点课题报告。

以后的贸易条件。绝大多数研究认为，尽管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而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但我们的研究发现，所谓收入贸易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被严重高估，而要素贸易条件得到改善是误判。我国出口收入增长完全依靠出口数量的扩张，出口价格的下降并没有被生产率上升所弥补。

（一） 价格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单位出口产品对进口产品的相对购买能力大幅度下降

尽管立足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能够提高效率和国际竞争能力，促进增长，但如前所述，在国际分工中经常存在不平等交换，影响发展中国家国民福利提高。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近乎完全竞争，甚至是过度竞争，而发达国家含有技术创新的产品在国际市场处于垄断地位。这种不对称会导致国与国之间竞争和交换的不平等，使得发展中国家尽管参与国际分工水平得到提高，但其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状况没有改变，不过是随着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产品的变化，从过去的初级产品，延伸到制成品而已。我国也是如此，尽管出口商品中制成品比重达到 95%，但 2009 年与 1980 年相比，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 32.1%。也就是说，2009 年我国单位价值的出口产品对进口品的购买能力只相当于 1980 年 67.9%（见表 2）。专题研究还表明，出口增长和收入贸易条件增长越快的行业，其价格贸易条件下降幅度越大，我国工业行业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与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年均变动速度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

表 2 我国贸易条件指数变化表

	价格贸易条件	出口数量指数	收入贸易条件
1980	100.0	100.0	100.0
1985	78.8	185.7	146.4
1990	86.9	371.4	322.9
1995	86.8	814.3	706.8
1998	94.2	1014.3	955.5
1999	88.7	1100.0	975.3
2001	86.9	1557.1	1353.5
2005	73.6	4300.0	3164.9
2007	68.4	6557.1	4483.6
2009	67.9	6257.1	4246.8

数据来源：UNCTAD HANDBOOK OF STATISTICS。

（二） 名义上的收入贸易条件快速增长，而实际上被严重高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的高速增长是依靠数量扩张实现的，似乎是通过“薄利多销”而使得国民福利增加了。但是，上述收入贸易条件中的“收入”是出口额，而不是

国民收入。在出口额转换成国民收入时，要有两方面的减扣：一是要减扣中间投入（包括能源、原材料消耗，甚至生态环境影响等）；二是要减扣外资所得。这通常被以往研究贸易条件的学者所忽视。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都很大，使得我国实际收入贸易条件被大大高估。

1. 减扣中间消耗因素以后的收入贸易条件指数明显缩水。根据联合国统计数据，1995-2007 年间^①，我国出口价格指数为 812.9（以 1995 年为 100），收入贸易条件指数为 600.8（以 1995 年为 100）。但是，由于上述数据中外贸收入是出口额，而不是增加值，其中包括了中间消耗。根据我国投入产出表数据，1995 年产业中间消耗率为 62.02%，2007 年上升到 67.51%。据此对出口价格指数和收入贸易条件指数进行修正，修正后的出口价值指数为 695.4，收入贸易条件指数为 542.6。也就是说，考虑到中间消耗上升因素以后，1995-2007 年间的出口收入由名义增长 712.9，下调为按增加值增长 595.4，收入贸易条件指数由 634.3 下调为 542.6。

2. 外资在出口中的高比重使得收入贸易条件被高估。我国收入贸易条件改善被高估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外资企业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较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计算，2007 年“三资企业”占全部出口额的 55.4%，而 1995 年仅为 31.0%。根据“三资企业”比重变化，对出口价格指数和收入贸易条件指数进行修正，修正后的出口价值指数为 525.5，收入贸易条件指数为 410.0。也就是说，扣除“三资企业”在出口中比重上升因素以后，1995-2007 年间的内资企业出口收入增长 425.5%，收入贸易条件指数比修正前的 634.3 减少了 224.3。如果考虑到“三资企业”并不全都是外方所得，外资资本所占份额为 22.7%，但外方对企业的控制和所得不但与出资比例有关，还与技术控制、销售渠道控制有关，假定外方所得占 50%以后，那么根据国内所得对出口价格指数和收入贸易条件指数进行修正，修正后的出口增长为 595.6，收入贸易条件指数为 542.4。

综合中间消耗率上升和外资因素，修正后的收入贸易条件指数为 350.8，只相当于原来名义收入贸易条件的 58%（其中，中间消耗率上升和外资影响力程度相当）。如果考虑到对土地、资源、工资等要素成本的低估和环境软约束，以及外资企业的价格转移等因素，国民福利流失的幅度则要大得多，而国民所得远远低于出口收入所表现出来增幅。在 28 个制造行业中，修正后的收入贸易条件低于名义收入贸易条件 80%的行业多达 22 个，其中以机电产品为主的中度技术劳动密集型行业，收入贸易条件下调幅度最大。

（三）要素贸易条件被误判，生产率上升并不能弥补出口价格下降

严格来说，价格贸易条件下降，虽然降低了对进口产品的购买能力，但如果由于生

^①由于投入产出数据的原因，我们这里侧重分析 1995-2007 年之间的变化。

产率提高、出口产品价格下降，也有可能使得出口规模扩大，出现薄利多销而带来出口总收入的上升和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因此，关键要看出口产品价格下降是生产率提高带来成本降低的结果，还是不平等竞争的结果，即要看要素贸易条件是恶化还是改善。如果生产率提高使得成本率下降的幅度高于价格的降幅时，要素贸易条件得到改善，便能获得更大利益；但当价格下降的幅度超过了成本下降的幅度时，要素贸易条件恶化，贸易利益就会受损。但在具体实证分析时，国内外学者现有测算的要素贸易条件（本文称之为“名义要素贸易条件”）都是采用劳动生产率来代替要素生产率或成本变动率指标。根据这一方法，我国名义要素生产贸易条件是显著上升的。然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装备水平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并不能反映总体成本的变动^①。计算表明，1996-2007 年间，我国以劳动生产率为基础计算的名义要素贸易条件得到较大改善，增长了 2.94 倍，年均增长 13.28%；但以总成本率变动为基础计算的实际要素贸易条件却恶化了 52%，年均下降 6.47%（见表 3）。分行业来看，而且几乎所有行业以成本效益衡量的实际贸易条件都显著低于以生产率衡量的要素贸易条件。可以说，居高的名义要素贸易条件掩盖了生产成本快速上升、实际要素贸易条件恶化的事实。

表 3 我国工业名义要素贸易条件和实际贸易条件比较

名义要素贸易条件(1996 年为 1)				实际要素贸易条件(1996 年为 1)			
1997	2002	2007	增长率(%)	1997	2002	2007	增长率(%)
1.54	2.71	3.94	13.28	1.08	0.77	0.48	-6.47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有关贸易数据和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投入产出表》相应年份数据计算。

三、固化分工模式带来比较突出的问题

我国出口增长并没有像经典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所描述的那样，比较优势部门的出口在海外市场获取更高的价格和利益，而是由于固化静态比较优势和过度依赖价格竞争，使得我国出口商品海外价格甚至低于国内，以至于遭致很多国家对我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的诉讼；也使得出口企业利润微薄，工人收入增加缓慢，还加剧了资源环境矛盾、成本上升等多重压力。这表明恪守既有比较优势、单纯依靠价格竞争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一）出口企业效益差，工人收入增长缓慢

固化比较优势虽然带来了名义上的出口额和就业的增长，但也使得工人收入增长缓

^①最简单的例子是搬运工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如果在使用简单人力车时为 1，那么在使用重型装卸车以后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到 100。这并不能表明，单位货物的运输成本能够下降到原来的 1/100，货运价格更不能下降到原来的 1/100，因为其中虽然人力资本有所提高，但资本的贡献起到了绝对作用。

慢。在全球分工中，我国主要集中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依靠廉价要素驱动经济增长和以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形成了技术进步对降低成本的路径依赖，决定了收入水平增长空间有限。很多企业通过压低工资等要素成本来保持竞争力，使得东部地区外来民工工资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得到提高^①。

下面的公式推导表明，成本变动率取决于增加值率变动与工资率变动，而与劳动生产率并没有简单的线性关系。

$$\text{总成本率} = \frac{\text{总成本}}{\text{总产值}} = \frac{\text{中间费用} + \text{工资总额}}{\text{总产值}} = 1 - \text{增加值率} + \text{工资率}$$

$$\text{总成本率} = \frac{(\text{单位产量中间消耗率} + \text{单位产量工资率}) \times \text{总产量}}{\text{产品价格} \times \text{总产量}} = \frac{\text{实物量中间消耗率} + \text{实物量工资率}}{\text{产品价格}}$$

从上式可以看出，要降低总成本率可以有三个途径：一是提高产品附加值和价格，降低成本所占比重；二是降低中间消耗率（提高增加值率）；三是降低工资率。我国实际情况如何？首先，我国出口商品很多出口价格低于国内，没有出现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降低总成本率。也就是说，我国出口企业基于价格竞争的战略，加上市场势力很弱，产生了对降低要素投入成本和降低工资率的路径依赖，而不是设法提高出口产品价格、增加附加值。第二，1992-2007 年间，我国中间投入使用率虽然经历过了一个阶段的下降，但总体来看是有所提高，从 1997 年的 0.6212，提高到 2007 年的 0.675；制造业从 0.7239 提高到 0.786。第三，根据上式，由于产品价格下降、中间消耗率上升，因此，要降低成本率就只可能是通过降低单位产量的工资率来实现。当然，降低单位产量的工资率，并不等于降低工人工资，可以通过提高装备水平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事实上，我国也正是按照这一路径来实现的，即呈现出明显的资本深化、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工资率下降的特点^②。这就使得我国陷入这样一种两难困境，即提高竞争力要求降低工资率以降低成本，而提高收入有可能导致总成本的上升，企业效益下降。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我国尽管出口增速很快，但企业效益很差、工人收入增长缓慢。数据表明，我国出口率越高的行业，其利润率越低。如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 2007 年，出口率在 60% 以上

①虽然近几年各级政府出台政策提高最低工资，但这还只是近几年的事情。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广州市人大代表李耀明提交议案，要求重视为农民工涨工资的问题。李耀明说“近 10 年来，农民工工资基本上没有涨多少，而支出却增长不少，扣除基本生活费用后，已所剩无几。”而近几年各地提高最低工资，加上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和人民币升值，出口企业则普遍反映难以承受。

②如按现价计算，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人均固定资产净值从 1997 年的 5.6 万元，提高到 2007 年的 15.8 万元；劳动生产率从 1997 年的 2.27 万元/人，提高 2007 年的 6.1 万元/人。但与此同时，总产出中劳动报酬所占比重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全部经济从 1997 年的 0.2079 下降到 2007 年的 0.1344，制造业从 1997 年的 0.1155 下降到 2007 年的 0.0692。

的行业，其销售收入利润率只有 3.6%，出口率在 40%~60%之间的行业为 4.8%，出口率在 20%~40%之间的行业为 5.5%，出口率在 20%以下的制造行业为 6.7%。从行业来看，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业虽然取代纺织服装成为出口主导，但其总资产贡献率和销售收入利润率却低于纺织、服装行业^①。

（二）贸易摩擦增加，贸易环境严峻

固化既有比较优势，采取“薄利多销”的方式，依靠降低价格来扩大市场占有率和出口规模，一方面是价格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对外贸易的增长完全靠数量增加来弥补；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制造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承担分工的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凸显，也使得我国的出口贸易成为众矢之的，贸易摩擦显著增加，许多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对华反倾销，我国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国际贸易环境。我国遭遇国外贸易救济调查数量已经连续 16 年列全球第一，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上贸易保护倾向加强，针对我国的贸易摩擦进一步增多。但凡反倾销、反补贴被判成立，则我国企业几乎被迫退出该国市场^②。

（三）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突出，可持续发展压力增大

相对于产业链两端的高端环节，一般加工制造环节具有能源、资源消耗比较多、环境污染比较重的特点。因而，固化在一般加工制造环节参与国际分工，进一步加重了我国的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在能源、资源方面，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除了煤炭等少数矿种外，多数大宗矿物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比较高。而国际市场供给却由少数几家公司垄断，即使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处于缓慢恢复过程之中，但出于对我国等新兴国家进口的预期，跨国公司和国际炒家利用垄断和炒作，石油和铁矿石等价格仍呈现快速拉升的态势。过高的能源、原材料价格已经成为我国工业化发展的沉重负担。

在环境方面，虽然大力推进节能减排，但环境问题并没有多大改善。地表水污染严重。农村环境问题日益加重，饮水安全存在一定隐患，呈现出污染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态势。近两年来，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这一问题仍比较突出。

（四）成本快速上升，面临产业转移的压力

在国内外能源、原材料价格和国内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同时，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 4 位代码数据计算。

^②如 2010 年 8 月 12 日，美商务部对我国输美钻管反倾销初步裁决结果如下：宝钢实际倾销税率 2.66%；适用应诉企业山西风雷钻具、江苏曙光华阳钻具、江阴朗博特钻杆的平均税率 104.33%；强制应诉企业德玛斯特倾销税率为 206%，适用于其他未应诉涉案企业的税率为 429.29%。

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水平快速提高，正成为我国出口市场的强力竞争者。同时，因劳动条件较差、工资过低引起的社会冲突正在增加。2010 年深圳富士康“几连跳”事件和佛山本田工人罢工要求加薪等事件，就是这些矛盾冲突的典型代表。与此同时，国际上以保护环境、劳动条件和劳动权益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责任标准（SA8000）正在得到强化。这表明廉价劳动时代已不再适合我国当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我国单纯依靠价格竞争的廉价生产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总的来看，固化比较优势和强化成本价格竞争模式，不但导致企业效益差、收入增长缓慢，加剧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也使得依靠差异化、服务化等非价格竞争的活动大幅度减少，研发、设计、营销、品牌等具有服务特征的高附加值环节缺失，反过来也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纺织、服装等行业的调研表明，那些在研发、设计及产品差异化等方面走在前面的明星企业，则在国际竞争中显现出更强的适应性^①。

四、政策建议

我国正处于由中低收入国家向中上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比较优势因素也显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主要特征是人口数量优势正在逐步减弱，而人口素质、人力资本优势逐步增强；资本积累能力和市场规模优势显著提高，技术能力也明显上升。同时，经营管理和投资管理能力、基础设施等软性比较优势也不断增强。适应比较优势因素变化，培育产业动态比较优势是转变发展方式、摆脱分工锁定，实现价值链提升的必然要求。培育产业动态比较优势不等于培养动态比较优势产业，还包括体现动态比较优势要素升级的环节。它涉及到人力资本、技术能力、营销能力、产业组织和制度保障等方面。同时，产业政策是一个综合性的政策，而不是单纯的贸易政策。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战略也不应该简单地在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之间进行选择，而应针对不同部门类型的不同发展阶段，制定不同的政策。在产业政策制定过程中，还应注意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的方向性、动态比较优势培育方式等问题。

（一）适应竞争重心变化和成本上升的要求，着力培育人力资本和技术能力等后天优势

随着我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未来竞争重点必将由以成本价格和生产率为中心向以质量、服务、品牌和响应速度为中心转变，由以低价格竞争为主向追求更高价值转变。

^①如山东即墨红领集团采取收缩战略，强化优势产品，以高品质、差别化、个性化及量身定制以提高产品附加值，以自有品牌打入美国市场，呈现出较强的竞争实力。

政策重心也应该与此相适应，清理各地方招商引资政策，改变竞相降低要素价格的政策优惠，着力培育技术能力、人力资本、营销能力和品牌化能力、网络化能力等后天优势。

第一，把促进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落到实处。这是培育和提升动态比较优势的重要依托。重点突出发挥企业和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的积极性，推进产学研合作体系建设。打破行业、地区、所有制及军用民用的界限，发挥全社会的技术优势，实现科技与经济、科研与生产的紧密结合。同时，积极引导自主开发企业充分利用国际人才和技术资源。鼓励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提高资源效率的机会，通过与国际技术机构开展技术合作、到发达国家设立研发机构和实验室等方式，引进、消化、吸收更高档次的技术和开发更前沿技术，开展面向国际市场的适应性开发、海外市场认证，构建全球研发体系。

第二，注重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方向性，着力支持功能升级。着眼于功能升级对改善我国市场势力和贸易条件的积极作用，把新产品研发、价值链提升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作为科技投入支持的重点。

第三，高度重视共用技术研究和公共平台的建设。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和国家科学基金对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研究开发活动的支持力度，针对重点产业领域，整合国内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科技资源，成立专门机构，组建专门队伍，重建产业共性技术创新平台，积极开展共用技术研究，提高产业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水平，为企业自主研发产品提供基础服务。

第四，强化对人力资本培育的针对性。人力资本是培育新的动态优势的重中之重。应创新教育及培训机制，鼓励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建立高级技术人才培养基地，促进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联合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实现教育资源共享。着眼于关键环节，增强对研发、设计、营销、供应链管理、金融服务、咨询等专业人才培育，引进国外成熟的培训体系和教育资源。积极支持企业从国外引进高层次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特别是各专业紧缺人才。加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下岗职工、转业职工的职业培训，尤其是强化对失地农民的培训支持。同时，要改善合法经营的职业企业家、领军型企业形成的环境。

（二）营造有利于人力资本、知识产权等软性要素积累和形成非价格竞争的体制机制与政策环境

过去，我国建立起了适应以要素投入驱动和成本价格竞争的体制机制，有力地促进了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经济增长，但这一体制机制对未来追求以品牌、质量和服务竞争形成明显制约。创新体制机制，应从改变考核机制，强化对知识产权、人力资本的保护等方面着手。

第一，通过改变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考核机制，健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改善企业外部环境等多种措施，鼓励和促进企业之间的竞争由成本价格竞争向质量、差异化、品牌和响应速度等非价格竞争转变。

第二，强化对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从战略的高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建立有利于人力资本、知识产权等软性要素积累和形成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这是提升比较优势的基本要求。企业应强化申请专利、保护创新成果的意识，国家应加大对海外知识产权注册的支持力度。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促进技术成果流通。健全科技成果等无形资产的评估体系和融资方式。

第三，建立健全征信体系，强化全社会的信用意识。加大对失信企业的惩罚力度，提高其失信成本。加强服务，对信誉良好的名牌产品实行出口免验并为其提供便捷通关。

（三）增加产业政策的多样性，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进行分类指导

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别之间的分工已由产业之间和行业之间的分工，向行业内、产品内分工演变。培育产业动态比较优势，并不是简单的产业调整或扶持，还应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角度，培育体现动态比较优势要素的价值链环节。

第一，针对既有比较优势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价格竞争已十分惨烈，而部分企业的创新能力也在逐步提高，应重点支持这类行业提高研发设计水平，培育品牌，促进由成本价格竞争向以产品多样化和设计、服务、品牌等差别化竞争和功能提升为主的转变，缓解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恶化。同时，应把建立海外营销网络，作为提升该类行业国际竞争地位的重要方面，在融资、通关等方面进行政策支持。

第二，对于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产业——正在或即将成为我国出口的重点行业，应在促进其提高生产率、降低出口的交易成本、支持开拓海外市场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其中，通信设备、电子、电器机械等行业已经成为出口的主导，政策重心是支持研发设计和关键设备、关键部件的国内生产，提高国际分工层级；普通机械、专业机械，以及钢铁、化纤等行业有国际竞争能力进一步提高的潜力，前者主要是强化研发、设计和关键部件等环节，后者应在提高环境标准、强化节能减排的前提下，支持其提高产品档次和“走出去”。

第三，对于一直是比较劣势而地位重要的行业，如医药制造、高端装备以及关键部件、关键设备、关键材料等，则应以适度的市场保护和投入支持为重点，并着力提高开发设计水平，强化供应链管理，着力提升分工层级；支持高新技术行业 and 关键环节的战略性进入和提高国际竞争能力，以打破海外垄断，形成有利于我国国民福利的市场结构，改善贸易条件。对石油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应通过强

化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档次和质量，强化节能减排，提高其国际竞争能力。

（四）加强品牌建设，建立培育自主品牌支持体系

第一，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加强自主品牌建设。鼓励企业依靠科技进步，加强质量管理，争创名牌，走名牌兴企的道路。帮助企业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标准化体系和计量检测体系，支持企业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第二，完善法规，加强政策引导和扶持，开展“国家品牌工程”。完善中国名牌产品评价机制。鼓励各地政府加强组织领导，制订名牌发展和培育规划；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社会中介组织在实施名牌战略中的作用，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

第三，努力营造有利于自主品牌成长发展的环境。加大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和保护自主知识产权的力度，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强舆论宣传，增强全社会品牌意识，努力营造有利于品牌成长的环境。通过政府采购、贴息和信贷支持等方式，支持自主品牌企业成长壮大。在合资合作以及合资企业对国内企业和品牌的并购过程中，要防止外资企业恶意收购。

第四，建立和强化海外融资支持体系，支持企业联合在海外主销市场建立物流中心、分销中心等营销网络。

（五）提高产业转换能力，降低产业转换成本

我国正进入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时期，产业政策应着力降低结构转换成本，重点针对资产的专用性、劳动技能培育的时间要求和专业性，以及市场渠道建立的长期性等，降低产业结构转换的高成本。一方面，提高环境准入标准和技术准入标准，加速淘汰落后能力。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政府和企业达成共识的产能过剩行业，政府可以在促进重组、债务减免、再就业培训、淘汰设备补贴等方面加以支持。

（六）着力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提高我国企业市场势力

从提高国民福利的角度，既要解决制造行业过度竞争和集中度不够的问题，也要解决一些服务行业的垄断性问题，实施“内外有别”的方针，促进有效竞争。对外，要尽量打破跨国公司的垄断，实施战略性进入，提高产业集中度，努力形成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能力；对内，要促进形成经济规模和适度竞争。

第一，要推进服务行业的改革攻坚，加快银行、保险、铁路、民航、邮政、电信等领域的改革开放步伐，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都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并放宽股权比例限制。

第二，通过集中化、集团化，提高我国市场势力。对于钢铁、石化、汽车、船舶等

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行业，推进跨地区兼并重组，促进规模化、提高产业集中度，培育我国自己的跨国公司和“航空母舰”。对于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重点推进大中小企业在研发、生产、市场和人才培养上建立战略联盟，形成合力。培育和壮大一批具有总体设计、成套能力和系统服务功能的大型企业集团。

第三，营造集群创新环境，打造面向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服务平台，引导、培育围绕集群主导产品的专业化市场，促成一大批专业分工明确、特色突出、技术能力和配套能力强的中小企业发展壮大。

第四，强化行业协会的协调能力和企业自律，规范市场行为，阻止恶性竞争。促进各种中介组织的发展，在协调市场行为、组织反倾销、反补贴以及应诉等行动中，充分发挥中介组织的特殊作用。

第五，严格对外资并购的审核，要防止跨国公司对我国制造业排头兵企业和服务业关键领域的控制。行业排头兵企业是决定一个国家市场势力，保持与跨国公司进行竞争，形成比较有利的市场结构的重要力量。因此，在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的同时，应从产业安全的角度，防止跨国公司对我国排头兵企业和服务业关键领域的控制。

（七）注重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和区域政策之间的协调

第一，外贸政策重心要切实从以推进出口增长为主，向以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为主。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产品在国际市场，尤其是在一些国家的市场上占有很高比重，继续通过价格竞争的方式提高市场份额，很容易导致贸易摩擦，也与我国转变发展方式不相符。在出口结构调整、企业转型过程中，面临出口速度减缓、部分企业效益下降的趋势，应尽量减少为了缓解上述矛盾而出台与转变发展方式相反的出口退税、延缓要素价格正常化等政策。

第二，针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比较优势，实施差异化竞争战略。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应顺应贸易条件改善的方向，扩大出口规模，为我国正在形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自主品牌产品提供市场；同时，扩大那些中间要素密集型行业进入这些国家市场。探索通过国家层面的合作，建立海外经贸合作区，推进我国比较优势衰退的产业进行转移。对发达国家出口，应着力改变产品结构，增加出口种类，培育自主品牌，改变单纯依靠价格竞争的状况。

第三，顺应产品生命周期规律，利用区域发展差异，促进产业转移，延长产业生命周期。我国区域差异很大，随着发达地区的比较优势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其原有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类型虽然在本地区失去了竞争力，但为欠发达地区提供了产业转移的基础。一方面，应该出台政策防止落后生产能力转移；另一方面，应该鼓励发达地区外

移企业采用先进或适宜的技术，与欠发达地区实际情况有机结合，提高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延长产品生命周期。但物流成本高、产业基础薄弱、配套能力差是制约中西部地区承接转移的重要障碍，为此，政府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公路建设的投入，降低公路收费标准，减少收费站点，调整不合理的收费期限。同时，要培育中西部地区产业配套能力，强化承接产业转移的基础。

第四，注重培育方式，减少贸易摩擦。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培育新的优势产业，各级政府往往以补贴或其他手段进行支持，但也给未来企业面对国际竞争带来了隐患，再加上企业以价格竞争为主的战略，使得我国不但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而且也正在成为反补贴重灾区。培育我国动态比较优势，应研究与 WTO 规则相适应的政策支持方式，重点支持专业教育培训、研发、平台建设、共性技术研发支持、网络建设、专利申请补助等功能性政策。对产业化的支持应由直接支持向间接支持转变，比如，加大研究与开发的支持力度，对专利和其他软技术购买进行补贴，支持产学研合作，组建开发联合体或技术联盟，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和孵化器等。对那些具有可诉性和不可诉性双重特点的补贴，如对环保设备、技术进步的鼓励政策，应该强化其中的不可诉内容；对非绿灯补贴范围的补贴形式，将“明文政策”补贴改为一事一议的事实上的补贴。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生产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的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成为必然。但在继续推进人民币升值之前，应先理顺国内的各种要素价格，让各种要素价格体现其应有的价值。否则，在人民币升值到位以后，再提高要素价格，将严重威胁我国产业竞争力。要清理完善招商引资政策，完善要素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加快理顺要素市场价格，让土地、能源、环境等要素反映正常成本，尤其应使工人工资和福利保持在具有扩大再生产能力的水平。

参考文献：

1. 钱学锋、陆丽娟、黄云湖、陈勇兵：《中国的贸易条件真的持续恶化了吗？——基于种类变化的再估计》，《管理世界》2010 年第 7 期。
2. 胡靖、郭玉琴：《质疑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假说》，《经济管理》2009 年第 10 期。
3. 李荣林：《动态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 年版。
4. 耿伟：《内生比较优势演进的理论与实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8 年版。
5. [美] 克鲁格曼等著：《国际贸易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 [英] 拉法尔·卡普林斯基：《夹缝中的全球化》，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年版。
7. 李向阳主编：《世界经济前沿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
8. 柳卸林：《技术创新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3 年版。
9. [美] 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8 年版。

(下转第 120 页)

· 理论前沿 ·

全球化中的新科技变革

刘琦岩

摘要：全球化可分长短两个周期尺度。科学革命的全球化是长周期的，技术变革或革命正成为短周期全球化中的焦点。科技发展及其与外部的关联有着相对稳定的特点。科技通过创造新的人工世界、提升人的控制力、与资本深度结合等方面，改变其影响经济社会变革的模式。科技、研发和创新三个概念相互关联又源自不同的视角。关注科技创新同时也要关注科技创新所带来的颠覆性、破坏性结果。面对全球科技变革所带来的新挑战，人们可在升级观念、构建新体制机制、开发建设创新载体、发挥科技共时性作用、提高谋划和推动创新能力等方面做好准备。

关键词：全球化 科技变革 创新

作者简介：刘琦岩，中国科学技术部办公厅调研室副主任。

人们常常在长周期和短周期两个尺度上论及全球化。长周期的全球化是指一个生产方式或相应社会形态的生成并在全世界蔓延，如农业的全球化、工业的全球化等，这是指一个历史过程的全球性演变。短周期的全球化是指一项技术变革、一项业务或一个议题、甚至可以是一个产品、一个运动的全球化，如金融的全球化、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化、一款新产品的全球营销等等，本质上是指全球联系的格局或机制。一般而言，长短周期的全球化过程，两者之间相互嵌套、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其因果逻辑如“鸡与蛋”关系一样，谁先谁后、谁决定谁一时无法分清。但总体格局上是长周期影响短周期，如许

多专家学者指出，人类尚处在工业化的长周期进程之中或者在后工业化阶段。短的周期也可引发或延伸为长的周期，如应对气候变化正在酝酿新的低碳经济模式，网络技术及电子信息产品所提供的新交往模式正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催生新的行为方式。

连续的美欧金融危机给上一轮某些议题的全球化划上了一个分号，同时开启了新一轮新议题全球化的帷幕。新一轮全球化已无法是上一轮议题全部内容的延续，有些新内容正成为新的全球性议题。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新科技变革以及它将要带来的种种影响。

一、科学、技术和全球化中的科技变革

任何议题的全球化总可还原为某个新思想或新生事物的产生、传播及全球性迁移演变，即一种创新的生成和创新成果的蔓延。在第一次科学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凝结着新思想、新知识、新方法的新技术、新产品，加之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转移，成为近代历史全球化展示的主要场景。这时候全球化的动力主要来自新事物自身不可阻挡的力量。工业化过程并没有从先前农业经济发达或技术领先的国家产生，可一经产生便在一国之内催生了新的市场、引发了新的经济格局。不过对于众多的创新事物，人们在关注其全球化、享受其全球化、推动其全球化的过程中，常常容易忽略其生成和蔓延过程中最开始的关键几步。人们关于科技革命、工业（产业）革命的发展史已有很多研究，一些研究显示，越是对科技和工业（产业）革命过程溯源，越是发现其早期脉络越发细小，一些很不经意的小变化就产出了日后带来革命影响的“蝴蝶效应”。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的知识谱系始终是与时俱进，不断变革。在早期历史中，是神话、巫术发挥着主导作用，接着是经学、经验类的知识发挥着主导作用。现代科学技术自第一次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后开始形成体系，只是在上个世纪的发展中其主导作用才越来越显著。越是接近当代，科技变革对经济社会文化的基础性、引领性、主导性作用越发突出，同时科技变革本身的内容、形态和节奏往往成为下一段历史进程的晴雨表和风向标。

科技是科学和技术的统称。科学和技术分开讲与统在一起说意味并不完全一样。科学体系是命题性知识的汇总，讲究认知性、归真性和正当性；技术体系是指令性知识的集成，讲求的是实现、编码和操控。由于当代科学和技术两大体系深度嵌套、全面融合、互为前提、相予动力，于是在善于筐式综合思维的中国文化语境下，人们很快习惯于以科技来统称。把科学和技术割裂开来显然与它们自身发展规律和历史潮流相悖，但漠视、模糊两者的差异也会从文化思想深层到经济社会应用层面带来系列的问题。如当下凯文·

凯利有一本书《What does technology want?》，国人译成《科技想要什么》很能体现了中国人对科学和技术特有的、倾向化的认知。对科学和技术不加区分所带来的后果，是人们往往会以技术的解释替代科学的认知、以技术的工具理性替代科学的理性精神、以技术的优势和差距替代整个科学技术的优势和差距。但真正须理性关注和反思的是科学上的弱势与差距、科学理性的生成和运用。

科学和技术两者的发展变革都受内在动力机制和外部环境影响，都有着连续性和间歇性。在间歇发展阶段，自然有断裂、有巨变，自然就有大的变革或革命。科学观念、理论的变革是长周期的；在短周期里更多的是技术变革议题。科学和技术革命的本质，我们暂且以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的范式变革为基本描述，那么，科学革命的重要标志是基本观念和相应理论范式及实践的更迭。技术革命若以范式的观点看也应如此（但其中不仅是指基本观点和理论，也包括基本操控方式方法、手段工具的更迭）。但范式理论有一个特点，科技概念的尺度越大，涉及的因素越多，变革或革命的过程也就越多、节奏也越快。就是说，若只谈物理学革命、生物学革命与论及科学革命、技术革命，结论自然会不同。到了经济学领域，有个专家们爱用的概念“技术—经济”范式，它所涵及的因素就更多了，按现在的技术和产业变动的节奏，几乎谁都可以主张，有若干产业的技术—经济范式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人们对长周期的事情更情愿拿望远镜去看，对短周期的事情则用显微镜来观察，结果自然也会不同。

经济社会背景下的技术革命与文化思想背景下科学革命有着不同路径。技术革命更多地表现为一些暂时不被注意的技术革新有意无意地汇集在一个经济社会所注目的突破点上。从技术到产业的变革总是体现在细节上的演变，一个领域不经意的技术革新，在另一个领域往往就会引发革命性的变革。如，内燃机相对蒸汽机而言是革命性的变革，而火花塞技术对内燃机的发明是关键之关键；火花塞技术原理早于内燃机一百年前随着电现象的实验室再现人们就知道了，并且还初步用于大气探测监测。技术变革经常地汇集起来，就带来难以计数的技术及产业变革或大大小小的革命：蒸汽机革命、内燃机革命、电动机革命、种子革命、化肥革命、高分子化合物革命、原子能革命、激光革命、电子管革命、晶体管革命、集成电路革命、工程塑料革命、碳纤维革命、网络革命、移动革命等等。所以，大家对历史上发生的科技和工业（产业）革命，除第一次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工业（产业）革命少有争议之外，第二次、第三次等等技术和产业变革在内容及范围上都有争议。在今天的媒体语言里，大家谈到的技术变革或革命往往是指新技术新产品产生了不可逆的技术替代效应或颠覆性的市场结构效果，如 U 盘（闪存技术）对硬盘（磁存储技术）、光盘（光存储技术）的替代；触摸屏对键盘和鼠标的替代、疫苗对药物的替代，诸如此类等等。在市场情景里谈革命和在历史脉络里谈革命终

究不同。

由于当代科学在基本观念和理论上较长时期尚无实质的突破（如科技史家所描述的，“科学的沉寂”已达60多年），当今大家谈论的科技变革或革命实质上是指技术意义上的变革或革命。如上所述，在中国语境下科学和技术是不区分的，我们就顺着叫下去，即新科技变革或革命。现在的技术变革或科技变革一大重要特征表现为由连续的小变革与间歇的大变革组合而成。按照很多人的估计，现在又到了间歇的大变革阶段。

尽管科学技术的知识体系及其与社会的关联存在着种种变化，甚至显著的大变化，但静观其变，还是能看出一些比较稳定的特点。

（1）从科学和技术知识系统内看，一是基于相对论和量子论的宇宙物质时空观、结构观、动力观和基于复杂生命系统的遗传、进化的生命观、生态观基本没变；二是科学和技术的知识系统以基础问题为方向、以前沿突破为引领的创新模式基本没变；三是科技知识体系超量、有序发展的模式基本没变；四是科技发展中领军人物、关键人才的核心作用基本没变。

（2）从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外部关联上看，一是科技创新加速发展甚至直接商用化、社会化的趋势基本没变；二是科技创新全球化持续进展的态势基本没变；三是科技在经济社会增量发展中的先导甚至主导作用基本没变；四是科技创新持续对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辐射、渗透作用基本没变；五是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多变量影响科技发展的格局基本没变。

从对历史的多层面分析中，大家还深刻认识到，科技革命不仅取决于科技自身的变化，还在很大层面上取决于社会选择和建构，就是说，科技变革或革命还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受科学和技术共同体认可、科技向社会的传播模式、社会对科技的需求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相对于科技史上大的变革时期，现在不是科技平淡了、革命性的创新少了，但在人们更高的期望下，指望连续产出全球意义、革命意义的创新也是不现实的。的确，牛顿的数学论文、达尔文关于进化论的论著、爱因斯坦关于激光的预言等等都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但让每篇科技论文都产生革命性后果，这决不符合科技和创新的规律。历史给我们的警戒是，一旦人们意识科技革命即将到来时，实际上促成科技变革的知识革新、技术突破、市场应用等过程或早已发生了。所以，科技变革不是被期待的结果，而是谁参与、谁建构、谁获得。“李约瑟之问”——近代科技及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其答案之一就是：中国当时没有出现参与或建构这次工业革命的创新者群体。需要提醒的是，不论是科技革命还是工业（产业）革命，其产生和形成声势还需要特定的制度及文化环境。

二、科技变革影响经济社会的新维度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科技越发显现出强大的、无可比拟的经济社会功能。科技创新与变革不断催生新兴产业发展和形成新的经济形态，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日益重要。随着新科技、新产品的出现，全球贸易和投资结构也跟着转变，从而全球竞争格局、国家财富获取积累的方式也跟着转变。在全球议题的形成和解决方面，本土的科技实力、创新能力是其主导权、话语权和制定博弈规则的基石。总之，科技创新在创造需求、改善民生、促进就业、保障安全、全球治理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彰显，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交往方式。

过去科技创新与变革影响经济社会是间接、慢热式的。如科学革命，首先是改变了人类的知识体系，通过教育和科学传播，科学渐近地改变人对自然、生产、社会的认知，然后再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技术变革方面，技术—产业的创新逻辑是：新知识导致新技术、新技术带来新产品、新产品衍生新产业、新产业促成新经济。科技社会化的逻辑是：先科技共同体内部，然后再是影响科技体系外部；先直接地影响一小部分人，然后间接地影响一大部分人。在过去，新科学和技术对社会文化的改变更是一个漫长过程。到现在，科学也不能说全方位地战胜了宗教和迷信。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人们首先认识到机械技术、热力技术的革命性力量；再经过电力技术、化工技术、无线电技术、核能技术、激光技术、网络技术推动和示范，人们越发意识到由基础科学引领的技术变革，正成为人类历史新的引导力量。加上多次经济危机的考验、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比拼，世界性话题的热议，科技创新与变革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在人们的注视中变成了直接的和快启动的。

科技今天带给人类的最直接、最深刻的影响是它正在创设新的人工世界，亦即新的生态及新的生命存续过程，并把新的人工世界作为人类本质新的成份。试管婴儿技术已向地球输送数百万新生命。到不久的将来，合成生命与人造子宫成为现实并规模化运作时，人类将全方位地开始人工世界的时代。与大的地质和生态周期相比，人工自然的历史还是太短了；但人类在较短的时间里，恰恰以科技的创造在改变着人和自然的关系。

科技带给人类另一直接的后果是大大提升了人类的控制力，并将其作为人类遗产在传承和繁衍。凯文·凯利用了两句话很好地概括了这趋势：“二十世纪的核心事件，就是对物质的颠覆”、“二十一世纪的核心事件，是对信息的颠覆”。前一句话是乔治·吉尔德说的，后一句是他引申的。从控制物质到控制信息，从控制有形到控制无形，凡是有新物质的地方就会有科技，凡是有信息的地方也会有科技。科技的渗透性真正实现了无孔不入。

近代以来，至少有两大力量改变了全球历史进程：科技与资本。近代欧洲主导的全球化其核心议题就是使（西方的）科技无处不在、资本无处不在。在过去，科技和资本

是两个各自独立发展的体系。在第一次工业（产业）革命后两者开始结合，后来的产业革命就是两者结合演绎的结果。到上世纪后期，科技拓展了资本的的内涵和范围，充实了财富性、扩大了流动性、增强了融合性、赋予了更大的渗透性和辐射性。科技与资本的结合已成为当代社会新的平台式动力。可以设想未来新的科技变革将是科技与资本更大范围、更深度的结合。“五四”以来中国一直在补科技知识、技能的课；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开始补关于资本知识、资本化过程以及相应的商业知识、技能的课。当年关于新科技革命的大讨论让我们以新的视角重新认识了科技、资本以及两者的结合。时至今日，全球范围内知识与资本结合的方式、内容又在发生新的变化。这正是任何关注和分析全球化需要认真研判的事项。

今天的科技更是以直接影响个体的方式在影响着当代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和文化。全球化是今天任何事务、任何组织、任何个人无法回避的历史边界条件。因为相当一些影响生存和发展的资源从数量、规模、品类、内容、质量基本上要靠全球化的机制供给保障。考查当代个体的参照系，人们正在聚焦一个 5C 维度框架，即：国家（country）、城市（city）、企业或职业组织（company or corporation）、集群（cluster）、社区（community）。5C 分别给个体提供生存标签、生存平台、生存路径、生存脉络和生存文化。人们谈论全球化的议题，往往集中在上述 5C 的全球化。现在人们更多地议论硅谷的全球化，因为这里包含了上述 5C 全球化所有的方面。当前信息化、资本化与全球化融合在一起，为科技的全球化构建了很多新的条件和载体，越来越多的人已生活或工作在科技繁盛、创新密集的国家、城市、企业、集群或社区中。在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力量构成方面，人们也会更多、更直接地感受到国家资本的力量、企业资本的力量（如跨国公司、企业网络）、城市资本的力量（诸如产业之都、金融之都、时尚之都、科技之都、文化创意之都，总是那几个中心在引领潮流、配置资源），以及正在兴起的集群资本或社区资本的力量。当前的网络社会形态、全球村或全球社区正是由集群或社区资本力量塑造的。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水平的提高，未来社会中，科技知识、科技设施将成为一种标配，但创新的素质和能力将成为真正决定性的力量。而具备创新的素质和能力的创新者——他 / 她 / 它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或组织——才是真正的决定性因素。

三、科技、研发与创新相互交织又不相同的全球化

科技、研发、创新是三个高度相关又经常融合在一起的概念。每一个概念自身又是复合性概念，在描述和概括社会实践时视角又有所不同和侧重。科技侧重的是知识方法体系和社会建制，研发侧重的是目标设定和资源组织，创新则侧重从创意到产品的总体整合和过程实现。同样谈及科技的全球化、研发的全球化及创新的全球化，人们也是有着不同的侧重点。

当前，科技的全球化体现在信息化对科技知识方法传播的推动、合作研究全球性议题、共建和开展大科学工程、扩大科技外交和国家间科技合作等。研发的全球化主要是指跨国公司主导的研发全球化进一步深入，跨国企业间技术联盟、离岸研发外包业务持续扩大，小微企业或研发机构基于互联网虚拟平台协作研究加速发展。创新的全球化主要是指跨国企业的产品 and 市场创新，它们从创意的获取到创新产品市场实现越来越多地依赖全球资源和全球同步的并行化组织过程。在科技全球化进程中，科技外交、国际科技合作、国际科技组织的价值日益凸显。在研发全球化、创新全球化的进程中，目前主要是指市场意义或企业层级的全球化，因而也主要是由有实力的跨国公司、创新网络掌控着全球化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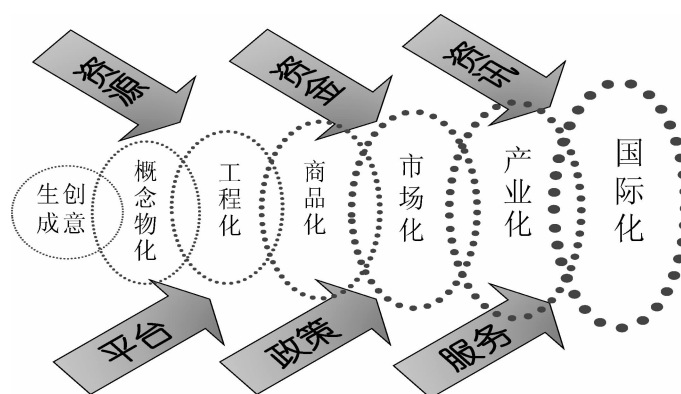


图 1 创新过程的主要阶段和节点

如上图所示，任何一个创新过程一般可分为创意生成、概念物化、工程化、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几个关键的节点。过去，跨国企业的创新过程从创意到市场化基本上是内部化的，而今是从创意的获取到产业化的每个节点都可视情况放到企业外部及全球范围里进行；过去，从一个产品创意到产业化国际化实现要走很长的路、花很长的时间，现在苹果公司开发 iPhone、iPad 的事例给人们的启示是这个过程可压缩到足够短，而且还能在全球择取最好的创新平台、研发团队共同参与。即使大家熟知的医药领域的研发，过去研发周期较长总是困扰着投资决策，现在由于研发外包和创新全球化也较理想地缩短了产品进入市场的周期。跨国企业正充分利用全球市场和科技的资源进行创新，这是上一轮研发全球化的结果，也是新一轮创新全球化的起点。

科技浪潮此起彼伏，由科技创新带来的经济波动在所难免。全球范围内的研发之争、创新之战是全球化时代产业经济、创新经济的典型特点之一。领先企业、先导领域、支柱产业的更替更迭已成为当代经济周期性的因素。这里笔者想引述一下，技术经济史上的卡尔维德定律及创新竞争中的克里斯坦森命题。卡尔维德法则核心意思是说：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保持技术创新的显著优势长达两代或三代甚至更长的时间。克里斯坦森命题

则提出：竞争充分的市场中，再好的企业若只重复常规性、持续性的技术创新都难逃被颠覆性技术创新者打败的命运。而且随着人们对科技创新活动认识的深化，现在大大小小的企业都在主动谋划颠覆性创新策略，人们正迎来一个颠覆性创新大规模到来的时代。这两个规律意在提醒人们，熊彼德的“创造性破坏”之魔咒随时会发生历史性作用，人们必须对科技创新进程中的企业治理、国家治理以及全球治理给予重新关注和研究。这两个规律还提醒人们，创新过程、创新体系极为复杂，人们对创新规律探索和研究还在初级过程中。两个规律都源自历史现象的经验总结，深层机理众说纷纭。但无论如何，首先要成为创新者，才能把握住创新所带来的机会。

四、全球化中的新科技变革与我们的对策

一进入 21 世纪，新一轮科技革命或变革就成为科技媒体、未来学者、智库专家们一直热议的话题。几乎每年都有各种版本的“几大革命性技术”、“若干革命性创新”等文章充斥报刊或网站。在有的文献里，我们还能体会到专家的偏好，一些倡导者喜欢此类技术变革，同时缄口其他方面的技术变革（如里夫金在其《第三次工业革命》书中就避而不谈大家共认的生物技术变革）。对于技术变革甚至革命，人们不仅能作回溯分析，还能进行前瞻预测。受托夫勒影响，未来学者关于未来的描述、预测往往以能大谈特谈技术、产业、经济社会的显著变化，甚至革命性变化为模版。尽管如此，很多技术变革的最终出现及其创新后果还是让大家意想不到。

着眼于全球科技创新态势，围绕新时期科学发展主题、转变发展方式主线的总体要求，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中国必然而又现实的选择。十八大报告提出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这对各类创新主体认识创新、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都提出了新的战略要求。笔者认为，我们可从五方面下手应对。

第一，面向全球化升级科技观、创新观。人们应从全球视角，以及推动、参与科技变革或革命挑战的要求出发，重新评价对当代科技、研发、创新有关理论及实践的认知，以“广谱、宽带、全频”的理念来认知及评价当代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体系，以及从知识到产品或服务的各种创新活动。同时还要以同样的理念来看待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的联系，适时进行丰富和升级，倡导以人为本、原创优先、应用引领、开放共享的科技观、创新观，树立并完善与新科技观、创新观相适应的企业观、资本观、市场观、发展观等等。

第二，构建能充分发挥科技在经济社会增量创新中积极作用的体制机制。前文提到，科技在经济社会增量发展中的先导甚至主导作用基本没变，这一结论是相对于后工业化社会而言的。对处于工业化进程和深入发展中的中国而言，我们还需要加快构建能充分发挥科技在经济社会增量创新中积极作用的体制机制。科技是经济社会增量创新中最为

活跃成份，创新是一个经济社会以增量引导和升级存量的基本过程。在创新型国家里，对科技、研发的投入都被视为对未来的增量投资。所以，一个创新驱动的社会不是科技资源或研发投入如何围着经济热点转，而是经济和社会资本要围绕科技创新端来转。旧的全球化是发达国家的知识技术跟着资本和金融走，跨国企业投资成为主要带动因素和动力，新的全球化将是资本和金融跟着科技创新走，创新载体、创新人才是主要的平台和动力。我们应密切关注科技全球化与资本全球化结合的过程，特别要关注由科技变革如何影响甚至引导资本流动和资源配置。

第三，开发建设多类型的创新载体。政策总是鼓励人人创新创业，但政策制定者必须关注并知晓一个严酷的事实，即最终成功的创新者总是少数，甚至极少数，创新者很难挑选、很难常规化培养。创新者什么样？他／她们会在哪里冒出来？与其关注这类问题还不如关注创新者更愿意在哪里发挥作用？创新者的引领功能如何有效发挥出来？为此，积极构建和发展适应创新者栖息和发挥其作用的创新型企业、城市、集群和社区等系列创新载体至关重要。如能像硅谷那样，自发地形成创新者的栖息地，这会让人称羡。如有必要，还可着眼于全球，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综合体（technopolis），它可以是孵化器、科技城、科技园区、大学、科研组织或科技企业集群，但核心在于它能提供的创新机制和环境。不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革命，总是在寻找最适宜的地方率先发生。

第四，有效而正当地发挥科技共时性在全球治理方面的作用。科学理论和知识的普遍性、技术及产品标准化、传播的信息化、网络化是当代科技共时性的重要内容，也是科技为社会共时性提供的重要资源和渠道。全球化与信息化的相互促进，信息化带来的全球协作，加上科技日益增强的辐射性、渗透性，使科技作用于社会的共时性因素增多、共时性效果增强。特别是在一个日益碎片化社会中，社会治理、社会整合更是绕不开科技、信息化这类共时性方法与手段。发挥好科技共时性作用，一个民族、一个区域会更好地融入全球化进程，并在这一过程中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出应有的影响力和塑造力。

第五，提升谋划和推动创新的功力。中国的企业和大学、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在过去的创新中已表现出应有的竞争力，但从整体上我们还确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短板或瓶颈。我们在谋划和实施创新方面都要下功夫学习、追赶和超越。从谋划创新要求上看，需要提高三个方面的能力：一是面向不断变动的市场或产业格局对重大创新机会的识别、捕捉能力；二是面向日益复杂的科技发展态势对技术路径的选择能力；三是面向在竞争中生成的产业格局对重大创新技术或产品体系的架构能力。从推动创新要求上看，也需要提高至少三个方面的能力：一是在竞争和流动中对创新要素或资源的获取能力；二是面向开放创新对研发流程、商业化流程创造性的组织能力；三是根据竞争与合作需要对核心知识产权运用能力。

在比较经济发展史、当代科技史、近现代中国历史时，人们常感慨中华民族数次与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失之交臂，错失许多机会，还似乎担心新一轮科技革命再次把国人甩掉。有变化就总是有机遇。上头班车是机遇，上末班车也是机遇。无论怎样，对于新的科技变革而言，大家都是观望者，又都想成为参与者。科技变革的很多云彩似乎已然飘在空中，哪片有雨？下在哪里？答案重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知道，为什么总是有很多云彩围着山系、水系、雨林在下雨？答案就是一个：生态使然。第一次工业革命不是同时发生在整个英国，而是先从当时英国几个新产业集聚地或集群起步的。这启发我们，打造一个持续产生、推动和参与科技变革、科技创新的生态更为重要。

参考文献：

- 1.[美] 乔尔·莫基尔：《雅典娜的礼物——知识经济的历史起源》，段异兵、唐乐译，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 2.[英] 约翰·齐曼主编：《技术创新进化论》，孙喜杰、曾国屏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 3.[美] 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陈允明、王克仁、李华山译，中国建筑出版社 2009 年版。
- 4.[美] 凯文·凯利：《失控》，东西文库译，新星出版社 2010 年版。
- 5.[美] 凯文·凯利：《科技想要什么》，熊祥译，中信出版社 2011 年版。
- 6.杜君立：《历史的细节》，上海三联书店 2013 年版。
- 7.[英] 詹姆斯·伯克：《圆——历史、技术、科学与文化的 50 次论回》，梁焰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 8.[美] 哈罗德·埃文斯、盖尔·巴克兰、戴维·列菲：《美国创新史》，倪波、蒲定东、高华斌、玉书译，中信出版社 2011 年版。
- 9.[秘鲁] 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王晓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 10.[美] 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张体伟、孙豫伟译，中信出版社 2012 年版。
- 11.[英] 彼得·马什：《新工业革命》，赛迪研究院专家组译，中信出版社 2013 年版。
- 12.[德]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否思社会学》，刘琦岩、叶萌芽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年版。
- 13.[英] 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 14.[美] 查尔斯·P. 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 1500—1990》，高祖贵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 15.[美] 哈尔·海尔曼：《技术领域的名家之争》，刘淑华、郭威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 16.[美]《从当前看未来（The Future is Now）》专刊，《外交政策》2011 年，http://www.foreign-policy.com/the_future_issue。
- 17.[法]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工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概况》，杨人楩、陈希秦、吴绪译，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

-
- 18.[美]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创新者的窘境》,胡建桥译,中信出版社 2010 年版。
- 19.[美]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加]迈克尔·雷纳:《创新者的解答》,李瑜偲、林伟、郑欢译,中信出版社 2010 年版。
- 20.Deane, Phyllis M. 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21.Gibson, David V., George Kometsky, and Raymond W. Smilor, eds. The technopolis phenomenon: Smart cities, fast systems, global networks. Rowman & Littlefield, 1992.
- 22.刘琦岩:《迎接颠覆性创新群集到来的挑战》,《科技日报》2012 年 7 月 16 日。

责任编辑:李蕊

(上接第 109 页)

- 10.世界经济编辑部:《荣获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11.石京译:《世界银行国别报告——南朝鲜工业的过渡性转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2 年版。
- 12.世界银行政策调研报告:《东亚奇迹》,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5 年版。
- 13.小宫隆太郎等编:《日本的产业政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8 年版。
- 14.王如忠:《贫困化增长:贸易条件变动中的疑问》,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 15.王岳平:《“十二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对策研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报告,2010 年。
- 16.王新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中的利益分配》,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5 年版。
- 17.魏后凯:《市场竞争、经济绩效与产业集中》,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3 年版。
- 18.章元等:《战略性贸易理论的发展与局限》,《经济学动态》2002 年第 2 期。
- 19.Redding, Stephen.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he welfare effects of trade.”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99, 51 (1): 15–39.
- 20.Ruffin, Roy J. “Comparative advantage under uncertain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74, 4 (3): 261–273.
- 21.DiPietro, William R., and Emmanuel Anoruo. “Creativity, innovation, and export performance.”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06, 28 (2): 133–139.
- 22.Greenwald, Bruce, and Joseph E. Stiglitz. “Helping infant economies grow: Foundations of trade polic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New Development in Macroeconomics, vol.96, 2006.
- 23.Grossman, Gene M., and Elhanan Helpman.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long-run growt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0, 80 (4): 796–815.
- 24.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责任编辑:刘英奎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

高尚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智库发展迅速。一些国际研究表明，在全世界智库分布中，中国排名第三，有 429 个智库。但从国际比较看，中国智库建设相对滞后，从数量看，美国有 1823 个智库，中国的智库只有美国的 23.5%；从质量看，中国智库国际排名还很落后。因此，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

一、用改革的理念办好智库，以创新的精神做好研究

这是能否建设好新型智库的首要问题。过去，中国的一些研究机构主要为政府主管部门服务，独立思考、独立研究较少。1990 年 10 月，我建议由海南省和国家体改委共同筹建一个改革研究院。其任务，一是加强改革研究，二是培训改革干部。一定要用改革的办法建院，改变老体制的做法。为什么建议在海南办改革研究院，而不在其他省市？一是海南是中国最大的特区，思想解放；二是受到国外智库的启发，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兰德公司就曾告诉我，远离首都华盛顿可以保持独立性，减少行政干预。

1991 年 11 月 1 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改院）正式成立。解放思想，用创新的精神做好研究，是建设新型智库的重要条件。中改院最基本的职能，是提出改革建议、影响改革决策、形成改革共识。新体制、新机制，造就了智库研究能力的独特优势。中改院建院 22 年来，向中央有关部门提交的改革建议报告 140 多份，发表论文 1500 多篇，出版的改革研究编著 200 多部，举办了 140 多起培训班，为改革研究和改革实践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

二、探索有活力的智库建设的组织形式

目前，中国的许多智库隶属于政府机关、国有企业，主要为主管部门服务，缺乏外部市场竞争压力，经济上主要是吃“皇粮”。民间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创新力量之一，对国家战略和政策的创新具有独特的作用。随着中国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化，建立民间智库的意义越来越重要。中改院在建立之初，实现财政差额管理，80 个编制中有 30 人可以吃

“皇粮”。半年以后，中改院就向海南省政府提出“事业机构，企业化管理”的改革方案，主动退出财政事业编制，不要财政拨款。中改院从此走上了“不吃皇粮、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我积累、自求发展”之路。这不仅为国家节省了经费，而且激发了智库的活力。

三、在参与国际合作中提高中国智库的学术水平

参与国际合作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在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中改院把国际化作为重要战略任务之一，20 多年来共举办了 77 次国际研讨会，参加人员有国际机构代表、外国官员和专家学者，中方的官员、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参加研讨会的国内外著名学者、政府官员近 4 万人次。通过国际研讨会，加强了学术交流，促进了相互了解，也加深了友谊。

四、政府如何引导、支持智库？

中国的智库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国家领导人已认识到智库建设的重要性。但如何引导、支持智库建设还要落到实处，特别是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中如何发挥智库的作用？过去 30 多年来，平均每 10 年中央做出一项重要改革的决定，从 2003 年到现在，又是 10 个年头，正是中央做出新的改革决定的时候了。

关于中央文件起草方式的改革，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

一是如何进一步发挥智库的作用？中国已建立了不少智库，它们将在改革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参谋作用。为此，建议中央选择四五个智库，限期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可以用购买服务的方式调动智库的积极性，让各智库之间开展竞争，以提高智库的学术水平；起草小组和智库两条腿走路，可以丰富中央文件的内容。

二是如何进一步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在互联网时代，利用好现代信息工具，又做好保密的情况下，建议设立一个专门的电子邮箱或者网站，广大党员、干部可以通过这个电子邮箱或网站为改革献计献策，使中央文件起草的过程也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参与的过程，也成为形成共识的过程。

习总书记最近强调：“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个理念应落实到改革发展的全过程。越南的改革也许对我们有所启示。越南的改革起步晚，但步子大，如今他们的作法值得我们注意。越共在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时，提前两个月就把十大报告发给全民讨论。今年越南要修改宪法，以民主的现代化的文明社会作为核心理念，开门征求全党、全国人民的意见。目前共收集 2600 万条意见和建议，大大激发了人们的改革激情。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责任编辑：李蕊

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智库的责任

卢中原

全球经济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的治理结构也在经历相应调整。这些变化对世界各国的各类智库都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看其能否顺应新形势，用高质量的思想产品满足思想市场的需求，为世界的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的正能量。如果说对政府智库的要求是质量、公正性和影响力的话，那么对政府智库研究人员的要求就应当是学养、敏锐和建设性，以更加开放的胸怀、更加广阔的眼界来观察世界、观察中国，并且提出有见地的看法。

一、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结构变革的主要表现

第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当中的份额在上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加大。2000-2009年，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24%上升到33%，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6%。而发达经济体的比重和贡献则相应下降。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第二，目前，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特别表现在多国集团的构成在发生变化。比如说，20国集团（G20）正在代替7国集团（G7）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和平台在扩大。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尽管不会一帆风顺，但是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日趋活跃，必然推动原有多国集团的重组，多国集团当中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作用也会逐步增强。

第三，国际经济组织中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在提升。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发达国家的投票权比重让渡给发展中国家15个百分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得到相应提高，虽然其中每个国家的提高幅度还比较小，但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

第四，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越来越蓬勃发展。例如，东盟10+1，即东盟10国加中国的货物自由贸易已经开始了，今后还可能发展到投资、旅游和服务贸易的更加便利化。现在，这一区域内商品的自由化贸易只是第一步，将来中国和东盟在区域内的合作不断深化，可能使生产要素的流动更加活跃。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了相互间的合作。当然竞争也是客观存在的。比如说，过去我们面临的是国与国之间的

竞争，现在可能是区域合作体之间的竞争。这也会对世界经济的治理格局带来新的影响。

二、世界经济的治理格局变革对智库提出的要求

第一，把独立性和包容性更好地结合在一起。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的智库都在标榜自己的独立性。对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来说，独立性就是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历史、国情，同时又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的道路。这就需要坚持自己历史文化的特性，这是国家层面的独立性。智库的独立性，就是要公正、客观、科学、冷静，多角度地观察世界、观察自己。

第二，在这样一个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朗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本身也有很多自己的利益诉求。虽然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阶段和面临的机遇、挑战等方面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但是，在发展的道路、利益空间、历史文化理念等方面又有许许多多的不同。因此包容性是指，我们要互相倾听、互相吸取，要有包容的心态和胸怀。同时，我们也希望发达国家能够更多地倾听发展中国家的理念、呼声和诉求，这也需要包容。

第三，要做到现实性和前瞻性的统一。现实性主要是指，中国要更加冷静地看待自己发展的阶段、真正具有的实力，不要高估自己。同样，也不要妄自菲薄，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行。我们知道，发达国家仍然有自己突出的优势，在科技、文化，还有一些理念、治理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方面，有丰富的、也比较成功的经验，我们需要虚心学习。我所说的现实性，意味着要尊重现实，不过高地估计自己，也不低估自己；同样也不要过低地估计发达国家在这轮国际金融危机当中受到的冲击，以及他们复苏的活力。

此外，智库还要有前瞻性。根据观察世界的长远眼光、博大的胸怀以及开阔的视野，看到发展的前景怎么样，追求的人类美好的东西是什么。例如，在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和欧盟 2020 年发展战略当中，有许多共同的理念和目标，包括绿色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智能型发展等等。这些共同的追求符合本国和世界发展的趋势和长远利益。我们的智库要有这种前瞻性，通过研究成果，为自己的国家和各国未来更好地发展而作出应有贡献。

最后，努力做到批判性和建设性的统一。我们要持一种冷静、科学的批判精神，对世界经济秩序现存的不合理的方面，以及本国不合理的体制、政策作出分析，决不回避矛盾和掩盖问题。同时，也要更多地着眼于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和方案，毫不留情地揭露问题和矛盾，决不应点到为止。有责任感的智库应当提出更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使这些问题和矛盾能够得到解决，最终使本国、本地区人民，以及世界各国人民从中得到福祉，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责任编辑：刘英奎

ABSTRACTS

(1) Pro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Economy and Trade

Li Deshui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countries of the world stay together and cooperate closely with each other, and then the world economy has shown signs of improvement. However, the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carrying heavy debt burdens to do so, which makes the world economy still intricate and complex. Nevertheless, this crisis leaves us many important inspirations.

(2) Achieve Steady Growth through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Mode and Expansion of Domestic Demand

Zheng Xinli

We should take the report of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as the guideline for analyzing and grasping the present economic situation, and as the base for unifying understandings of the economic situation; aiming at institutional defects that hinder development, we should speed up reforms to unleash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then support sustained and healthy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a long period in future; lead bank loans and social funds to investment fields that beneficial to promote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by implementing a proactive fiscal policy, in particular, conduct fields like construction of intercity high-speed rails and urban railway systems and new-type rural community building as key themes of investment.

(3) Recognition of Business Cycles

Lin Zhaomu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resent economic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aw of business cycles, linking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together. Taking the economic situ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 into consideration, this paper observes and analyzes economic issues from the objective processes of business cycles, which makes my judgment of business cycles more proactive and my policy suggestions more strategic.

(4) Forging an Updated Version of Chinese Economy Becomes a Major Strategic Choice

Wang Yiming

It's indeed a major strategic choice to forge an updated version of Chinese economy for maintaining the present steady economic growth. The fundamental way out for forging an updated version of Chinese economy lies in deepening reforms to unleash further reform dividends and strengthening the innovative vitality. Urbanization is where the greatest potential of domestic demands in our country lies, and should be the strategic priority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pdated version of Chinese economy.

(5) Grasp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scientifically and Widen Opening-up actively

Huo Jianguo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with economie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being in unbalanced recovery at pres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becoming increasingly highlighted, the world economy's shocks and adjustment in the medium-to-long term get inevitable. Facing the complex and chang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ituation and internal conflicts, our country should continue promoting market-oriented reforms of key areas, persevere in reform and opening up, unleash the growth potential by deepening reform, and establish a fair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by widening open-up.

(6) Strategic Thinking on How to Attract FDI in Chinese Service Sector

Li Yongjian

FDI in Chinese service sector exceeded that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gain in 2012. Based on the analysi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FDI in Chinese service sector,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ndency of FDI in global service sector,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adjustment orientation of FDI in China and raises some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 The paper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the current FDI policy in China is mainly based on the industrial constructure wit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playing a leading role and does not fit in with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ituation. So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flexible transparent dynamic policy framework for attracting FDI in Chinese service sector according to individual in-

dustry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ground of making clear the objectives and importance for attracting FDI in Chinese service sector.

(7) Research on the Perfection of Policy System of Chinese Enterprises "Going out" from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Experience of the Worldwide Enterprises

Chen Jinming & Wang Ping

Through overall introduction and deep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es of foreign and the United States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development experien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view that, in the new situ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addition to the efforts of their own, full range of supports of political, economic, diplomatic policie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erefore, drawing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experience of the worldwide enterprises to perfect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going out" policy syst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ational strategy.

(8)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from Issuance of Municipal Bonds for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Financing in America and Japan

Chen Zhengrong

This paper thoroughly and deeply analyses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from issuance of municipal bonds for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financing in America and Japan.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municipal bond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financing instrument in developed and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and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financing. Historically, there is a high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municipal bond issue size and urbanization in a certain country, in other words, the faster the urbanization, the larger municipal bond issuance, meanwhil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unicipal bonds also promotes a country's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Municipal bonds and urbanization promote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 which leads to benign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orderly interaction. This paper makes target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municipal bonds and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financing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lso combined with China's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9) Revolution of the Global Third Party Supply Chain and Practice in China

Wang Zixian & Deng N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deepening of specialization and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global third party supply chain was born as the new commanding height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By reference to Japan and Hong Kong enterprises experience, Shenzh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ompanies build business platform of integra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ources, and become the vanguard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enterprises in our country. We should establish a strategic plan and an industrial policy,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our third party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d service industry and cultivate new advantages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China.

(10) No Longer Stick to Stat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Wang Yueping

Our country exerts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participates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which promotes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one situation,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is relatively consolidated in labor intensive sectors and labor intensive links, makes the economy of our country become unsustainable. Cultivating industrial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volves many factors, such as human capital, technical capacity, marketing capability,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Hence, we should make different policies in accordance with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of different sectors.

(11) New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s in Globalization

Liu Qiyao

Globalization can be described as long or short cycles.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its globalization are in a long cycle, while technological change or revolution is becoming the focus of a short cycle globalization. S&T development and their context in society have some steady traits. Through creation of a new artificial world, improving people's control-force, deep combining with capital, S&T now changes its mode of impacting on economy and society. S&T, R&D and innovation are interrelated and their globalization involves different perspectives. We focus attention t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o that can bring about disruptive and destructive results. After upgrading concepts, building new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developing and constructing innovation vector,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of planning and promoting innovation, then we can be ready to face new challenges that are brought about by global technological changes.

Editor: Xie Yunliang